

~~中國最高領袖~~

石 介 蔣



③

中國最高領袖

蔣  
介  
石

中國最高領袖 蔣介石

第三冊

第二十一章

- 一：民國廿一年的上海抗戰……二：對蔣委員長無稽的詆毀……三：第五軍的勇蹟……四：眞理的顯示……五：連續的小接觸……六：馮玉祥再度活躍……七：叛變者即遭戡平……八：福建的叛變……九：十九路軍的叛變……一〇：蔣委員長的神速行動……一一：二星期內戡平的閩變……一二：蔣夫人的昭著工作……一三：南方的肇事者……一四：中央政府與省政府的權力

三六九

第二十二章

- 一：蔣委員長夫婦連續不斷的航空旅行……二：蔣委員長夫婦在西北……三：巡視十省……四：空前的行程……五：處處受到熱烈的歡迎……六：蔣委員長歡迎教會合作……七：飛往中國中部及西南各省……八：貴州的新設施……九：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撤職……一〇：昆

三八五

明迎蔣……一一：飛向四川之成都……一二：四川徹底改革……一三：蔣夫人褒揚航空事業

## 第二十三章

一：汪精衛遇刺未成……二：蔣氏任國府主席……三：中常會的變動……四：學生運動的復興……五：蔣委員長改革政訓工作的計劃……六：緊張的對日關係……七：接見日方通迅員……八：無禮的日本少將……九：多田的著名小冊子……一〇：『非蔣介石與國民黨演蛋不可』

四〇三

## 第二十四章

一：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二：蔣委員長的重要演說……三：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闡釋……四：殷如耕背國附逆……五：華北自治運動……六：日本幕後的陰謀……七：廣田三原則……八：好鬥的日本軍部……九：東京的軍事叛變……一〇：日本在華北的走私行動……一一：半獨立的西南

四一九

## 第二十五章

一：西南再度作梗……二：假意的抗日軍事行動……三：爆發反中央政府的運動……四：南方的軍隊活動……五：湘省的廣西軍……六：蔣委員長告誡陳濟棠……七：政府軍隊加警備

四三三



- ……八：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
- 九：反叛陳濟棠……
- 一〇：蔣委員長演說……
- 一一：中央決意肅清叛逆

## 第二十六章

- 一：陳濟棠免職……
- 二：西南政治分會撤消……
- 三：陳濟棠逃往香港……
- 四：粵省綏靖主任余漢謀……
- 五：廣西將領的問題……
- 六：蔣委員長的豪俠心和寬大性……
- 七：沒有領袖慾……
- 八：日本的新要求……
- 九：中國的反要求……
- 一〇：蔣委員長對周越的明白表示……
- 一：中國的強硬態度陷日本於進退維谷之困境

## 第二十七章

- 一：蔣委員長國慶日致詞……
- 二：中國不再是一個不統一的國家……
- 三：共產主義的禍患……
- 四：目前不是一個真正的威脅……
- 五：中國在建設方面的進步……
- 六：農民負擔的減輕……
- 七：陸空交通的改良……
- 八：蔣委員長和北方領袖的會議……
- 九：蔣委員長五十生辰……
- 一〇：全國空前的慶祝……
- 一一：獻機祝壽……
- 一二：五十生辰感言……
- 一三：對於蔣母的衷忱的讚揚

## 第二十八章

- 一：中日的交涉……
- 二：中國的崛強的態度……
- 三：拒絕日本的備忘錄……
- 四：川越承認主

- 張的改變……五：對中國新認識的必要……六：侵犯綏遠……七：關東軍援助雜色軍隊……  
 八：蔣委員長在太原……九：中國軍隊克復百靈廟和大廟……一〇：日本飛機的活躍……一  
 一：雜色軍隊的反正……一二：日本遭受大打擊……一三：德日反共協定……一四：中國的  
 反應

## 第二十九章

四九九

- 一：蔣委員長和東北軍……二：拒絕部屬的勸諫……三：清晨的事變……四：蔣委員長的暫  
 時躲避……五：蔣委員長被劫持於西安……六：叛軍的八項主張……七：政府採取緊急行動  
 ……八：全國的驚惶憤怒……九：張學良的革職以及討伐軍的出動……一〇：端納飛西安……  
 ……一一：蔣鼎文被派赴南京……一二：衝突的中止……一三：日本對西安事變的態度

## 第三十章

五二一

- 一：宋子文出面談判……二：日方態度之批判……三：全國的惶慮……四：蔣夫人飛往西安  
 ……五：延長停戰……六：楊虎城的恐懼……七：事變的解決……八：蔣委員長波釋……  
 九：全國表示慶祝……一〇：張學良到南京……一一：蔣委員長發表聲明……一二：他對於  
 親場的觀察……一三：蔣委員長辭職不准……一四：張學良受軍事裁判……一五：陝變的幾  
 個教訓

## 第二十一章

- 一：民國廿一年的上海抗戰……………二：對蔣委員長無稽的譏諷……………三：第五軍的勇蹟……………
- 四：道理的顯示……………五：連續的小接觸……………六：馮玉祥再度活躍……………七：叛變者即遭  
嚴平……………八：福的叛亂……………九：十九路軍的叛逆……………一〇：蔣委員長的神速行動……………
- 一一：二星期內戲劇的閃變……………一二：蔣夫人的昭著工作……………一三：南方的肇事者……………
- 一五：中央政府與省政府的權力

國民黨內部的罅隙，雖在汪精衛就任行政院院長後得以彌補，但蔣委員長本人除了由各個委員會聘為委員外，在政府內仍未公然擔任任何職務，但是當民國廿一年一月廿八日傍晚，日本海軍陸戰隊毫無理由地攻擊上海閘北區時，他因為忠於黨國，便不再保持他漠不關心的旁觀態度了。

當中日軍隊爭奪淞滬滿目的閘北區時，國內外對於十九路軍抵抗侵略的英勇戰蹟，都非常注目。但當戰事開始時，由於十九路軍防區的接近租界，將另外一支軍隊參與此次戰鬥的事實，全部遮蔽

了。這軍隊的英名，因此雖不及十九路軍的顯著，事實上，他們的戰蹟是遠在十九路軍以上的。

此次戰事結束後，蔣委員長堅決地拒絕宣佈政府與他本人在戰時所作的專蹟，因為他極不願由此而減損十九路軍的光榮。及至民國廿三年，他方始應允將上海抗戰幕後的事蹟公開。試想他的朋友在從事勸說並克復其不願的心緒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環境？

上海抗戰時，指揮十九路軍而榮膺『民族英雄』頭銜的蔡廷鍇將軍，於戰事結束後，即與福建的叛徒互相勾結，及至叛軍被南京政府擊潰，蔡氏遂向國外出亡。他在美國時，曾多方誣陷蔣委員長，謂當其抵抗日軍時，蔣氏曾陰謀摧毀他的軍隊，並謂南京政府非惟不曾派遣一兵一卒，援助抗日，且將主要軍需予以扣留不發等等。

蔣委員長在這種『含冤莫白』的情況下，靜默了二年，其後，始允把這次戰事的真實情形，加以記錄，而公開發表。上海抗戰的時候，抵禦日軍的，並不單是十九路軍，而是蔣委員長親自訓練的第五軍內八十七與八十八最精銳的兩師。他們的戰蹟遠在十九路軍之上，這二師殉國的官兵竟達全數三分之一之多。

當那個兵力消耗的時代，蔣委員長每天都與防守閩北的將領蔣光鼐及蔡廷鍇互相接觸。雖然當時南方已強逼他辭去職務，並壓迫他立刻備妥護照，放洋出國，而他仍舊非常關心時事。但是他既已辭

職，便無權再發令支配軍隊，因此凡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只有應用他『個人的力量。』他鑒於當前的危機，力請允許他將所有的軍事智識和經驗貢獻國家，而盡其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責任。他不顧所遭的挫折，他懇切地籲請政府及十九路軍將領允許他到前線，參與軍事。並謂：除非他親往前線，中國若要支持這次戰事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一般反對他的人，一面由於嫉忌，一面又恐其在政治上從此轉強，便淡然無動地拒絕了這個熱誠的要求。

蔣委員長既堅持要赴前線，他受到一次恫嚇，謂前線將士並不歡迎他去，假使他堅持不聽，那麼十九路軍將有與第五軍衝突的可能。情勢雖然如此，蔣委員長仍鄭重地指令第五軍將領，盡力援助十九路軍，他在發往第五軍的電報上就說：『十九路軍之光榮。亦即中國之光榮，應不惜任何犧牲，予以支持。』

蔣委員長既不能親赴前線，祇得用電報向蔣光鼐及蔡廷鍇指示一切。最先是勸示他們在相當時間內，暫不採取攻勢。並謂援軍立刻可以抵達上海。其次是鄭重指出瀏河一線防守太疏，去駐一兵一卒，如日軍在該地登陸，將無以應付，勸示應至少配備兩團兵力以資衛守，當時蔣蔡兩氏及其他將領曾聯署電覆，表示同意，願遵其勸告從事進行。

但是他們雖說接受了蔣委員長的勸告，而事實上在瀏河仍舊不駐重隊，以致日軍在該處登陸時，

不出蔣委員長的預料，竟未曾遭到抵抗，當時蔣光鼐與蔡廷鍇不得政府的允准，立刻自作主張地命令十九路軍放棄原有陣地，向後撤退，而最不幸的，是在撤退的時候，他們並不將這行動照會第五軍將領，因之第五軍在茫然不知的形勢下，仍徹夜作戰，致顯露了側面的弱點，結果大部官兵慘遭了犧牲。

軍事既經失敗，輿論因此非常譁躁，電報像雪片似的自各地飛向蔣委員長，責問他爲什麼不派兵增援。這些發報的人，顯然已經忘却蔣委員長當時已被逼辭去了本兼各職，而不能以其個人的能力來做他要做的事情了。

事實上，蔣委員長當時確曾設法派兵向上海增援的，他希望上海方面的將領能接受他的勸告，並依照實行，而援兵也曾確實地在指定的時間內開抵上海附近。不過蔣光鼐與蔡廷鍇二人已在兩天前自作主張地撤退了他的軍隊，而使陣地穩固作戰奮勇的第五軍遭到了浩大的災禍了。

這些不可否認的事實，對蔡氏的諛詞是最完善的答覆。在上海抗戰國軍敗退時，蔣委員長左右確悉實情的人物，都堅請蔣委員長將這內情發表，但遭到了他嚴詞的拒絕。同時防守上海的蔣蔡兩將，本謂擬在將來向民衆宣示這次戰爭的真實情形的，在戰事結束後，却靜默不言了。即使他們有話要說，那亦不過抱怨幾樁與蔣委員長毫無關係的事，或者祇能實說政府當局確曾用全力接濟他們而



當滿洲局勢緊張而上海戰事激烈的時候，潛伏中區各地的中國共產黨，利用了這個機會，恢復了他們的活動。而有一時，安徽蚌埠，湖北漢口及平漢鐵路沿線各地，都曾遭受威脅。共黨的形勢既已如此嚴重，顯然祇有蔣委員長方可予以壓制了，因此汪精衛以及其他國民黨人員竭力籲請蔣委員長放棄退休的思想，立刻出主中樞。因鑒於當前的危機，蔣委員長乃應請復回國民政府任職。於民國廿一年五月六日遂軍被推任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全國國民軍總司令。由於共黨的再度活躍，他決定親自主持剿共的軍事。遂於六月九日抵達江西贛嶺，立刻在當地召開一次軍事會議。及至六月底，蔣委員長首途晉漢。激烈的剿共軍事乃繼之而也。結果，湖北河南安徽的共黨全遭驅逐，其位於湖北南交界處的根據地金家寨與新集兩地，亦被國軍佔領。

蔣委員長除了剿共的軍事外，尚有許多事件，使他焦慮。其一是汪精衛與張學良間的問題。因在八月六日，汪精衛突然提出辭職，同時並發表了一篇詆毀張學良的宣言，對他在滿洲的潰敗，痛加攻擊。汪氏的辭呈提出後，各部部长亦繼起辭職，因此引起了極大的慌亂，而蔣委員長對此尤覺不安。因為他在政治上常常需要一個才識豐富的人，能使他對黨方常保接觸，並向國內外各層人士解釋

國民政府的政策。他於是決定了一個根本的辦法，以使南京政府各個政治人物覺悟，乃於八月九日表示：如汪氏不再打消辭意，他本人當即繼起辭職。同時張學良亦請辭北平綏靖主任職務，一時南京仍被騷亂的空氣所籠罩。蔣委員長便在八月十四日電致汪精衛保證華北的事務當依其主張謀取解決。最後則決定由蔣委員長兼任張學良在華北的職務。此時方將此次糾紛結束。

汪精衛的辭呈，因此未被批准而僅准其告假離京療病。至八月廿三日政府要員除鐵道部長顧孟餘外，全部打消辭意。汪氏遷居上海療養。其後蔣委員長曾派張群代表其個人向汪氏致意，同行者尚有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唐有壬，兩氏力請其返京視事，上海市長吳鐵城亦受命共同勸說，但汪氏因病體確未復元，遂於十月廿二日放洋赴歐，從事療養，而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的職務。

至於華北中日間的形勢，在十一十二兩月間仍甚緊張，及至民國廿二年之初，日本於該年元旦，竟發動了更激烈的侵略行動，日軍以守城華軍開鎗挑釁為藉口，對山海關邊作猛烈的轟擊，將城區佔領，並將城內奮勇作戰的守兵一營逐出。其後，更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侵入熱河，由於該省主席湯玉麟的懦弱無用，日軍乃如入無人之境，輕易地將該省佔領。此外，日機更對毫無抵抗的熱河各城市狂施轟炸，大部平民因此悉遭慘斃。

日軍在華北的暴行，激起了中國國民的憤怒。廣東方面的政客準備乘此群情憤激的時候，開始實行其擾擾國民政府的計劃。一月十七日西南執行委員會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聯署向國民政府通電，質問當軸對日的態度。他們陷譚當局——或竟陷譚蔣委員長——日有秘密協定。因此此項譚詞，被政府當局憤然加以駁斥。

及至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協定』簽立，中日雙方衝突，亦即停息。南方政客因此又重言此點，肆意攻擊，並謂協定內，尚有秘密條款，未經公佈等等。而北方馮玉祥亦通告全國，自任爲人民抗日軍總司令，但表示此舉僅在保衛察哈爾，否認係反對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於七月間在哈爾濱附近的海龍寺設立了一個軍官訓練營。計劃從事下級軍官在困難情形中，處理人事的訓練，爲進行江西剿共軍事時作一準備。他在主持這件重要工作的時候，在哈爾濱曾與政府各領袖舉行過一次會議，席上關於馮氏的行動，及對日的關係等問題，都曾詳加討論。因此馮氏不會發動任何軍事運動，但是暗中仍受南方一不滿政府一諸人的援助。結果蔣委員長與由歐登河歸來復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於十月廿八日聯署向馮玉祥發出了一通電報。

這電報的內容，頗值得加以記載。內謂南京當局已決定不簽任何割讓國土或助長侵略的條約。但假使被迫過此限度時，則不惜準備戰爭。中國將盡力保持國內的和平與國際的安寧。此外並謂馮玉祥

目前所造成的危險情勢，不能加以漠視。因此政府當局要求馮玉祥立刻回京，否則至少應停止其華北的行動。蓋此項行動，不僅影響察哈爾一省，即全國的安全亦將遭其破壞。並示政府當局的地位不能隨勢變化或任意退讓的，其後復請馮玉祥顧及黨方面的困難及全國窘急的形勢，出而共濟時艱，政府亦將與其合作，此外，並謂由於危機的急迫，共黨的充斥，政府不得不任辱負重，力謀國內的和平與統一等等。

但是這通稱謂馮氏『忠義愛國』的電報，不幸地不曾產生什麼效果，政府因此開始自河北派兵回察哈爾移動。軍隊的進行非常迅速，及抵八月之初，國軍與馮軍一部在察哈爾的宣化附近，發生衝突。後者並非正規軍隊，組織全無，配備簡陋，所以一經接觸，立刻被逼後退。數小時後，馮氏只得遣其使者，向北平當局表示，願暫接受政府的條件。遂在八月六日宣佈下野退休。

馮氏退休後，其部將方振武，假借馮氏的名義，又發動了一次叛變。他在宣佈其準備一舉手推翻蔣委員長的大言後，開始在河北察哈爾邊境，遣兵向北平進攻。政府軍當即出而迎擊，幾次接觸後，叛軍不支，遂被逐回內地，政府軍乘勝進擊，至十月初旬，方氏軍隊全部被圍而繳出鎗械。這華北最後一次曇花一現的叛變，於是即告戡平。

至民國廿二年秋，南京政府遭到了一次更嚴重的威脅。這是後來所稱的『閩變』，由一般失意軍人如陳銘樞、蔡廷鍇、李濟琛及蔣光鼐所發動。這次政變的主要動機，實由於陳銘樞被免廣東省主席職位而蔣李蔡等亦都失去地位後缺乏金錢所致。

這次行動的開始是在民國廿二年十一月的下旬。當時他們在福州集合了一次民衆大會。發表宣言一致反抗政府。並引誘廣東陳濟棠援助此次叛變，但未得陳氏同意。叛軍的兵力即是上海抗戰的十九路軍各師。這一路軍隊，在上海戰爭後，一部分曾加改編，而補入一部年青的新兵其後即被遣往福建，在福建西部山林裏從事剿共的間斷戰事。共軍對此『頗負時譽』的軍隊，並不因之表示畏懼，反之曾數度加以重創。十九路軍的幹部因此紀律非常不良，而由於福州方面，對他們各將領的影響，遂被他們利用而叛變了。

蔣委員長對於此次新起的威脅，並不躊躇。他在福州民衆大會舉行後三日內，即將軍隊向南移動。因為他對叛軍的行動，曾諍戒過一時，所以對此次事件並非毫不準備的。他即對十九路軍發出了一個簡括的警告。跟他們於一星期內肅清新福建『政府』，而皈依南京，否則他表不惜『玉石俱焚』。

福建的叛軍領袖，採用了華北軍人同樣的狡猾手段，揭起了『抗日救國』的旗幟，以作煙幕。其

實他們早已有投降日本的嫌疑了，他們現在利用這個政策企圖一面攻擊國民黨，一面攫奪政權。但是十九路軍的光榮已經被人忘却，因此他們的忠奸與成敗的問題，亦已不復爲人關心，事實上這個軍隊由於本身道德紀律的喪失，早已爲中國內外所唾棄了。

十九路軍由於紀律的腐敗，乃形成了這次騷擾一時的事件。各地的電報都向福州飛去，表示福建的一般政客固可與其『新政府』爲所欲爲，但十九路軍必須置身局外，不爲牽入漩渦。華北所發出的電報內有一段說：『勇敢的十九路軍士兵們：以你們過去的光榮偉蹟，現在怎會被陳銘樞等不可救免的叛徒所煽惑，以致作了他們的爪牙？試問你們在大衆面前將怎樣辯白你們的行動？你們怎樣對得起孫總理？你們又怎樣對得起你們共同抗日而致旬難的同志們？』

陳銘樞不顧大衆輿論的反對，召開了一次『全國國民代表緊急會議』，自任執行委員會主席由蔡廷鍇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陳友仁任外交部長，許儒清任財政部長，張伯樞任教育部長，黃琪翔任陸軍部長。此外又產生了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十九路軍亦改稱人民革命軍；此外更宣佈了排斥國民黨的宣言，並主張聯俄聯共。總而言之，一般福建叛徒僅忙於建設他們私人的小中國而已。

當時，十九路軍內部擁護陳及反陳的兩派，常常發生論爭，而福建的福州廈門一帶不在他們勢力範圍以內的人民，事實上對這些叛徒非常怨恨，因爲他們知道，這次叛亂顯然將使他們更受苦難的。至



於軍隊的本身對於這次反對南京的行動，亦非出於自願。

至十一月終的時候，蔣委員長下令對福建總攻擊，南京部隊開始分三路進逼該省。第一路從浙江南進，攻擊福建北部。中路從江西東進，第三路則進擊江西福建邊界，清除共黨盤踞的荒野多山的區域，以截斷紅軍對福建的應援，而使國民黨軍可以專力對付十九路軍。蔣委員長因此使飛往福建西部分部親自指揮這次戰事。

十四路軍向福建推進很快，形成了一個箭頭形勢，直抵閩江。十九路軍因此後退極速，福州形勢也即非常混亂，短期以後，乃不得不將該城放棄，向南方撤退。政府方面的陸戰部隊，從戰艦上登陸後，便跟踪追擊。在福州城內叛軍全數退出後，即將該城佔領。十九路軍經此打擊，已無機再行重編，在幾天之內，即被逐至福建南部。最後，南京部隊二師在廈門登陸，而十四路軍亦乘勝進抵泉州，叛亂遂確告平定。

這次戰事進行的時候，政府方面強勁的空軍證明了它的價值。在溫州及甌水（處州）二地，當時都建有臨時的飛機場。轟炸機即由這兩個根據地飛向叛軍陣地及其司令部投彈轟炸。這樣連續的轟炸，對叛軍的士氣起了很大的影響，因此便促成了他們最後的崩潰。

真實的戰鬥其實祇有兩個星期，在此二星期終了的日子，十九路軍已被全部擊散，而各個分散的

部分也都爲政府部隊包圍，其大半祇得向中央政府投降。戰後，這些軍隊即被南京當局整個改編成了第七路軍，而十九路軍因此便成了歷史上的名稱了。這次規模龐大的叛亂平定後，國內外對蔣戴平叛亂行動的神速都非常驚異。至於組織福州獨立「政府」的一般人物，大部被處了放逐的刑罰。但他們的軍隊在福州退却時，曾向當地銀行大肆搶劫，所以他們早已將私囊填滿了。

但是公正地說一句，這久經沙場的十九路軍，並非存心參加叛亂而反對政府。事實上許多下級幹部在戰鬥的時候，都是向政府投誠的。當時蔣夫人曾協助他們向政府謀取合作的方案。她的這一次行動當時不曾普遍地傳出，因爲在戰事未結束前，這消息是嚴守秘密的。在戰爭開始時，她即從浙江西南部的處州（麗水）——蔣委員長的司令部亦設該地——乘機飛向福建北部的建陽。機抵建陽降落後，她便代表蔣委員長接見了十九路軍的密使，簽定了投降的條件。十九軍高級軍官譚啓秀亦在其內。蔣委員長因爲確知該軍內有許多將領對此次叛亂都甚不願，所以他決定將其下級軍官加以改編，予以感化，使其效忠政府。

蔣夫人的任務是成功了。譚啓秀便率部重歸政府，受其統制。而當時從剿匪軍事的愷興邦師長，亦因不滿叛變的行動而向南京投誠，同時與蔣委員長經常保持接觸。到十二月時，他接受了政府正式的任命。因此十九路軍各師師長，乃循其舊例，都率部歸順中央了。

政府當局自福建的軍事順利地結束後，便將其注意力轉向盤踞中區的共黨與民族復興的問題。同時在民國廿三年全年內，政府仍繼續致力改善與南方將領間的關係。至於政府與南方的爭點，是在於南方將領反對國民黨會議的召集。因為依照國民黨的規定，黨員必須每隔兩年集會一次，所以第五次全國國民黨代表大會，規定在廿二年的十一月間予以召開。因關係的關係，這次會議延至廿三年。但是事先廣州方面宣佈除非南京當局聽從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委員的主張，否則決不參加廿三年的國民黨代表大會。政府當局乃繼續努力從事促成兩方合作，並密遣專使向香港廣州方面接洽。結果胡漢民同意參加會議，但要求將會期再行展緩，以便使黨的領袖間的調解工作，有更充分的時間，而使粵共軍事亦不因指揮將官被召赴會而遭受阻礙。全國十六省省黨部當時一通電附和此項建議。

國民黨代表大會因此便決定再度展緩。汪精衛在中辯此次延會的原因時，力言是由於共黨的危機，但是事實上這次延期的主因，却是由於南方諸人的剛復所致。雖然蔣委員長與汪精衛都不願承認這種事實，以攪擾他們的思慮，但是這個形勢是不可否認的。

在相近的時間內，蔣委員長與汪氏聯名發出了一個宣言，提出了五個綱領：對於中央政府及地方當局的權限加以清晰的劃分，深信由這個計劃可以使國家趨於穩定，而當時南方的反對，亦可以由此

消除。計劃內對於法律的施行，人員的遴派，宗教行政，經濟計劃中央與地方當局，財政及軍隊的問題等，都有詳細的規定。

政府當局對於法律的施行僅負責將大綱加以訂定，其細則與詳章則由省政府及地方政府負責擬定，蔣委員長與汪氏並覺得任命公務人員的權力，應由中央政府授與，而其選擇與介紹，則可由地方當局專司其事。爲求其職位的穩定計，任期規定三年，如無相當的理由，不能隨意解職。任期如滿而能力良好者，仍可連任。

至於行政與經濟的計劃，蔣委員長與汪氏宣佈，必須由各地地方政府根據各地的需要，擬就計劃書與預算概算書，一併呈請中央政府核准。在計劃被核准而施行時，政府當局除了例行的視察外，不能再加干涉。此外，又規定國家與地方的稅收與經費必須加以清楚的劃分。所有國家的稅收，如關稅等，必須呈繳中央政府，而賦稅收入，當視地方當局的財政狀況，方准轉撥作爲經費。

軍隊的問題極爲重要，所以蔣委員長與汪氏表示：國家軍隊與地方軍隊的編制，必須規定標準。國防軍隊必須由中央統領，而地方軍隊，如警察，保安隊，民團等，則可由地方政府統率，但其實力必須由中央政府規定。

至於國家軍隊或地方軍隊向國外購買軍火等事宜，蔣委員長與汪氏所發表的綱領內規定：必須完

全由中央政府加以統制。





## 第二十一章

- 一：蔣委員長夫婦連續不斷的航空旅行……
- 二：蔣委員長夫婦在西北……
- 三：巡視十省……
- 四：空前的行程……
- 五：處處受到熱烈的歡迎……
- 六：蔣委員長歡迎教會工作……
- 七：飛往中國中部及西南各省……
- 八：貴州的新設……
- 九：省政府主席上家鄉的撤職……
- 一〇：昂明迎蔣……
- 一一：飛向四川之成都……
- 一二：四川徹底改革……
- 一三：蔣夫人翼揚航空事業

在民國廿三年的秋天裏，蔣委員長夫婦從事一連串的長途的航空旅行。那些旅行，在第二年裏，幾乎帶了他們走遍中華民國的每一個角落，不願它是怎樣的遼遠。那些旅行使蔣委員長對他自己的國家與同胞是怎樣的一點，有了一個更顯露的觀念，而且同樣地，也使他的國家與同胞對於蔣委員長是怎樣的一個人和他是代表什麼的，得到一個盡善盡美的觀念。

起先，旅行是未曾準備和沒有計劃過的，而是偶然引起來的。蔣委員長夫婦由張學良（他剛才從

歐洲回來，那時正在蔣委員長（介石）的指示下，在華中從事剿共，伴送着，到洛陽去參與一所新的軍官學校的開學典禮。乘着一時的高興，他們決定了朝西再走一程，到陝西的西安去。就是在那個時候，是現在他們計劃中的，除了西安以外，也沒有別的了；可是到了那裏，他却決定繼續到甘肅去。於是這一行人等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直到最後，他們視察過了華北，西北的十個左右的省份，經歷了五、六千餘哩的路程才止。

蔣委員長（介石）的旅行是長途旅行的第一次。在中國，一個政府的主腦人物，不願它是一個皇帝，大總統，或是軍事領袖，從來沒有遊歷過這樣廣大而且是代表全國性的一塊土地。這一次遊歷當然是靠了飛機而成為可能的，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假使旅行者藉着火車，汽車，或者甚至於藉着馬或駱駝而遊歷，它的大部份幾乎是不能達到的。無論如何，對於一個這樣為政務緊纏着的人，這樣的一個旅行，除了依靠飛機外，由於它所需的時間，將是不可能的。

這些旅行，在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之間及蔣委員長和他的同胞之間的關係上，起了可以正確地稱作一個新紀元。不論他到那裏，他受到十分熱烈的歡迎，以致這一次旅行變成從一個省份再到另外一個省份的勝利的巡遊，不過它並沒有一個有地位的人所能夠期望到的，常有的中國的浮華與虛飾，他不喜歡鋪張，輕便而迅捷地旅行着，看到許多，並且問了許多問題；在他旅行中，緊隨着他的空體而去的

大贊的人望，是由於這個人的淳樸所招致的。

視察陝西的巡遊，變成了一個節日的旅行，因為每一個城市都想在給予蔣委員長及他的一隊人的一個熱忱而形形色色的歡迎上，壓倒別一個城市。他們從洛陽飛到西安，中國的古都之一。他們從民衆和兵士兩方面，受到一個巨大的歡迎，而且在那民國廿五年十二月成爲蔣委員長的拘留所的，歷史上著名的花園裏，得到一個設着茶話會的款待。這個古老的都會以許多的旗幟裝飾着，大群的人們聚集在每一個優越的地點，樂隊奏着樂而大砲也鳴了二十一響的禮砲。對於蔣委員長，這種熱忱是一個啓示。他對於自己在西北的聲望，從來沒有多大的估價。

軍隊是檢閱過了，蔣委員長並且給予地方長官無數次的接談。那些地方長官們報告行政與建設上的，卓異的，雖則是地方的，種種問題，例如：建造公路，經濟問題，教育和禁烟工作。蔣夫人幾乎是同樣的忙碌，關於國府的政策和新生活運動的目標，作着啓迪各個團體的工作。附帶地，在蔣委員長與外人間的，一向不甚密切的交誼上，展開了新的、一頁的後一個運動之推進，大體是蔣夫人努力的結果。他們決定將處理新生活運動的代表與外國教會團體間的合作之可能性傳播開去，而那一件事情就使他們邀請了後者的每一個會員去赴宴。在那一個宴會裏，當蔣委員長對教會人士說：在大衆間的工作上，政府歡迎他們的合作的時候他們都感到了驚奇，他們回答他的請求說：他們理應協助新生活

運動。他們立即組成了一個中外委員會。蔣委員長召見該省的主席，教他幫助這個委員會，並且爲了民衆的福利，要與教會人士合作。

西安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也是爲中國效忠而大顯於世的許多名人的故鄉。在一次當衆的演說裏，蔣委員長適宜地指出說：中國目前的患難是由於從前是陝西偉人的理想與主義被忘却了的一事所引起的，並且宣稱一個恢復那些主義的努力，是包含在新生活運動裏的。

除了演說和談話之外，他親身見了許多別的東西。他視察過城裏的情形，申言過經濟的開發，而對歷史上的碑石與死去多時的皇帝的陵墓，感到很大的興趣。

這一行人等，從西安飛到了甘肅的省會蘭州。在那裏，蔣委員長聽聆政府官員綱舉着他們的改進計劃和其他的提議。這個城市受到了昔年舊軍閥手下的兵士的蹂躪；而這樣造成的荒涼，仍是到處昭然在目。

在蔣委員長離開蘭州之前，他接見了遼遠的，極西的青海省的軍事領袖馬良將軍和馬步青將軍。他們是連日連夜趕來會見他的。他勸誡甘肅的軍政當局，以及這兩個主持青海的將軍，不要爲他們自己而工作，要爲整個國家而工作。在這裏，教會團體重復召集攔來，而它的推進新生活運動之原則上的合作，也取得了保證。

蔣委員長與他的一行人等，啓程而赴蒙古的邊陲，飛到寧夏一個戈壁沙漠的荒涼的邊界上的極遠而最難達到的城鎮。（一個綠洲。）在這裏，遇到了一羣有着他們不同的思想，習俗，與難題的回民。在他們的歡迎上，他們是熱忱而專誠的，而且他們對於蔣委員長對他們的關懷，也知感激的。其間的地方，當蔣委員長從他的飛機上俯瞰下來時，是荒蕪而淒涼的，而且約摸有二百哩，全是一片連綿的荒野。這荒野僅爲一個不能形容的小山的山系開斷着吧了，在北邊，它與內蒙古西部的小戈壁沙漠的火紅的紅沙接界。藍阿拉山（Blue Altai）的障壁阻住着那些紅沙，使它們不能將寧夏所佔有的肥沃的平原變成一個沙漠，而黃河也阻止了賀蘭沙漠的沙石從東邊流進去。

當飛機降在西安的時候，蔣委員長已經飛過了最難到而最高險的國境裏的一千哩的三角形旅程。他學得了許多他從來不知道的，並且帶回了當安撫中國的那一個最遠部分的問題或時機到來時有最大價值的知識。當檢閱他所觀察的各地軍隊時，蔣委員長乘機宣講着他的簡單，精潔英武，誠實與互助的新主義。

這一行人等由西安搭火車到洛陽。再從洛陽到開封。在這裏，蔣夫人邀請教會人士赴宴。在那一個宴會上，蔣委員長，像上一次一樣親自到會，並且重述着他的諾言：『政府歡迎他們爲中國民衆而做的工作，』而且對他們解釋新生活運動的宗旨，蔣夫人仍像上次似的用英語對這般人說話，列舉着

這個運動在江西所獲得的效果。考後，教會人士組成了一個委員會，幫助河南省的新生活運動做消滅破眼的工作。在其他視察過的地方，又成立了好多所戒煙局。

從封，蔣委員長夫婦飛到了北平，同時，張學良就回到漢口去就職。在他們到北平的中途，他們在山東濟南作了一次匆促的逗留，去見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將軍。到了北平之後，他們兩人進了協和醫院，在那裏受了一次全身的健康檢查。

在十一月四日，他們視察察哈爾的張家口，後來，繼續到綏遠的歸化去，他們在六日的晚上抵達那裏。第二天，有着一張填滿的會談表，接着是一個稀有的全蒙運動大會。得錦標的是一個十二歲的中國孩子，名叫賈根。他得到蔣委員長供給他教育費的允諾，作為他的獎品。那一件事情使廣大的羣衆大為喜歡。

在十一月八日，這一行人等飛到了山西的太原。在一個對一千個官員和其他居民的演說中，蔣委員長對鴉片和其他毒品作了一個無情的打擊。他指出它們為中國最大的禍因及新生活運動的最壞的障礙。他宣佈說：烟禍，纏足和其他罪惡的滅絕，是列在這個運動的項目中的。他並且表示出他對於不道德，賭博以及貪污的深惡。要滅絕它們，他指出說，民衆的合作是必需的，因為如果民衆自己是冷淡的話，單靠政府發命令，那是不夠的。



蔣委員長夫婦順道作了一次到太原左近的太谷去的旅行。在太谷。他們被城裏最聞名的居民孔祥熙博士招待在他自己的故居裏。到太原去的回程，結束了蔣委員長的一行人等的西北旅行。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的宣傳，連着在作爲民族生存上的一個統一的因素上有着無法估計的價值的。個人的接觸，是在這一次搭着飛機，火車與汽車而完成的五千哩旅行之成就中的。那一次旅行是走到了中國境內的那一些並不爲現代中國的領袖們所達到過的部分。

在旅行中，蔣委員長對華北和西北的經濟，財政，政治，教育，道德與統治情形，作着仔細的觀察。就他看來，陝西，甘肅，山東，綏遠及山西幾省，似乎有了長足的進步顯示着；如果當局是有決心和良心的，不願充分財力的缺乏，它們仍可以爲民衆的福利而做些事情。拮据的倉庫並沒有使山西和綏遠當局感到沮喪，而不敢做起建設工作來。山西的工兵數目的同蒲路輕便鐵道，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在山西，最使蔣委員長感動的，就是一所兵工廠已經變成了一家製造普通用品的，如鐵道，客車，洋燈，電風扇，封浦，（抽水器）度量衡器具，以及洋針的工廠。

根據蔣委員長所見到的，和平與秩序佔領着綏遠。在農業上，羊毛工業上，牧馬上，穀倉的成立上，合作社與牧場上，在在都有了進步。甘肅，雖則它有着昔時的大亂，由於它的剷除匪徒和解散遊蕩部隊的努力，已經展開了一條是供將來建設的道路。在山東，蔣委員長在地方統治下，發見了一個

有效的高度的秩序，在給予那省以卓越的服務的民團上，發見了紀律。在道路建設及公眾衛生上，個華北有着不少的進步。

然而，照蔣委員長的意思，這些省份都有着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當個別的省份在建設進步的時候，它們中間却缺少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如果所有的省份對它們的不同的計劃合起來，就可以獲得時間，費用與人力的節約。此外，各當局方面，都疏忽了造林與護河問題的解決。造林是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國的最重要的工作，並且是農村復興的先決條件。在大多數的省份裏，還有着一種教育改良的缺乏。

蔣委員長已靠着飛機巡察了西北與華北。而從它獲得了許多的好處。其後，他想去看看中國的西南部。他回南京之後不久，他與蔣夫人重新出發，乘着飛機而作一次經過華中及西南地方的旅行，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和雲南在內。這一次，不像第一次旅行開始時一樣，它不是一個偶然的旅行。

蔣委員長飛到漢口，此後沿長江上溯，越過棧道而到四川的重慶。蔣夫人趁了輪船去看棧道。然後，他們深入遼遠的，到那時止仍是不易抵達而大不著名的貴州省。她們飛到它的省會貴陽。

在他們抵達那個省城的兩個月之前，國軍已經適當其會地到了那裏，爲了共產黨近在咫尺，而且喪失士氣的地方軍隊顯然已經計劃着劫掠那個省城而後退的緣故；但是在紀律嚴明的軍隊出現之後，除了那些沉鬱地退出了的當地軍隊外，每一個人都是喜歡的。

當地走進了貴陽，蔣委員長立即忙於與當地官員的談話。但也抽出時間，來巡遊那個省城，以及親身視察當時所存在的情形。不久，他就發覺了那省是爲烟禍所籠罩，人民是沉迷在鴉片中。農民們已經大大地依靠着種植罌粟來維持他們的生計。其他的生產事業是缺乏的，而天然資源的開發，還沒有超過創辦時期。墾植方式是原始的；道路與交通是不能使人滿意的。在文化上和開發事業上，貴州所呈顯的情景，恐怕可算是中國所有的省份中最落後的一省了。

況且，蔣委員長發覺那裏有着一個互久的逆政。在中午之前，官員們從來不出現於他們的辦公室裏，而在其後，也不過逗留片刻吧了。在遵義以及離開省城一些路的其他城市裏，誰都不能在下午之前發出一個電報去，爲了沒有一個人負責拍發那個電報的緣故。海口來的信件離要一個月的工夫；沒有電訊；對於貴州境外所發生的事情，貴州是不大知道，也不大留心的。

在蔣委員長看到了這一切的實情之後，貴州當局的歡迎者對他所妄用的甜言蜜語，正像火兒從鴨背上似的失落了。他全不是一個常有禮貌的，會保持這些官員的共同目的的視察員。他嚴格地抨擊着

烟禍，而且對他們說：他們必須將它除去，做些開發貴州的事情，以及給予民眾以合法而正當的職業。最後，他指出說：那些就是他所要說的話。在一陣死一般的沉寂，僅爲一隊音樂隊想奏出一個因驚恐以致沒有奏成的樂曲之斷續的努力所打破，以及幾聲雜亂的歡聲中，蔣委員長帶着一個嚴肅的面孔，大踏步地走到他所駐留的，虛飾的，但是空冷的地方；去籌劃一個計劃的大綱，以備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的提倡下，開發國家的資源並提高大眾的生活程度。

在他離開貴陽之前，蔣委員長親眼看會污而無能的貴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底撤職。後來，王家烈同他的妻子被帶出貴州，而搭在張學良的飛機裏。個安徽省的主席，在貴陽接替了他；接着，就是一個舊任手下的官員的全體調動。不久之後，蔣委員長夫婦離開貴陽，而到極端西南的昆明市，這一次是他到那個地方去所作的第一次旅行。飛機飛過在不久之前還被共產黨軍隊行過的一塊峯轉重登的地域；而他也可以親眼見到他的軍隊，在行軍中的兵士們所遭遇的困難。

當蔣委員長抵達昆明的時候，他受到一陣勝過他的上一次旅行中任何地方所給予他的盛大的歡迎。在他的到達之後，他立即與雲南的官員談話。共產黨是他的話題，也是使他到那省去的緣故。昆明曾經受到它的威脅，可是共產黨軍隊的領袖們爲了某種理由，不會進攻昆明或任何其他雲南的中心大城；他們盡他們所能走的速率向前進行。蔣委員長抵達雲南的那一天，朝北走的共產軍，在揚子江的

上游，得到了天時的相助，因為，當其前的渡江的努力被政府的炸彈所挫敗時，他們想在雨霧之下，安全地渡過去。渡過了之後，他們盡可能地向着北方走去；被政府軍追趕着，他們以行軍者在崎嶇的區域所走的一個使人難以相信的速率出動着。

看到了貴州的極端的窮困之後，蔣委員長有着對於他在雲南所看到的情形表示好感的傾向。在將他的大部份的注意力寄在軍事上以及繼續剿共軍事計劃上的時候，他仍抽出時間來，由蔣夫人協同着，在雲南推進新生活運動。在那省進行的新生活運動所針對的主要目標，就是罌粟的種植，吸食鴉片和奴婢以及童工。最後提起的一種，是盛行於嶺南錫礦中的。雲南省主席龍雲將軍概允給予蔣委員長的計劃以他的全力的贊助。

在他的巡遊中，蔣委員長也對苗子感到了興趣。苗子是西南的土著。無數的山子是在貴州，雲南和四川的幾部份見到的，他們是一種愛好清潔的耐苦的的人民，可是却被中國人所輕視。這種感情自然地引起苗子輕視中國人的感情。因為是山民，他們將他們的大部份時間用在畜牧上。蔣委員長，他自己也是一個山民，宣佈說：他們應該得到一個改善他們自己的機會，而且訂下了教育七十個左右的部落——或是貴州的各族——的苗子的計劃。後來，蔣委員長送給苗子一份禮物，用以改善他們牛羣的，幾頭良種的黃牛，給他們作紀念。

結束了昆明的視察後，蔣委員長和他的一行人，飛到四川的省城成都。從許多軍閥的搶奪裏，那省比任何一省受到過更大的損害。在中華民國的二十三個省份裏，四川有過四百七十七次的戰事。除了兩次之外，那些戰事都是四川人所作的，但是蔣委員長深諳那省所發生的事情。而早已決定了全部的改革。在他抵達成都的好久之前，中央政府的勢力已經開始靜靜地而且不觸目地伸展到那一省了。

同時，將軍們和他們紀律不好的軍隊連續地被共產黨軍隊敗，因而引起了輿論界的不滿。民國廿四年的春季，局勢是這樣的緊急，以致在重慶的，四川省主席劉湘將軍竟想將成都棄給共產黨，而保牢自己在港口的堅固地位。於是南京當局，在蔣委員長的命令下，真的開始進軍了。成團的，配備齊全的兵士們湧過棧道，而密佈在整個的四川省裏。隨着這一幕的演出，劉湘和他的同僚召集了一個秘密會議，而制定了抵禦南京的侵境的計策。

他們創辦了一個『四川人的四川』運動，而想阻止新銳的國軍進駐四川，並擬將那些已經在省裏的趕出去。一個七十四歲的耆宿，一個四川人，發了一種傳單而出來贊助中央政府。在那種傳單裏，他宣佈說，歷史顯示出：由於四川人的貪得無厭，以及對自己以外的每一個人的自私的壞良心，他們

所給予四川的，祇有災難。他並且說：蔣委員長是不是四川人的一件事，並沒有什麼關係；祇要他是中國人就是了。

在這個緊急的關頭，蔣委員長真的從雲頭中降落在他們的中間。他的突然的降臨，在每一個四川人身上，有着一種感動人的效力。蔣委員長忙慌於和軍政長官，教育家，宿儒與商民會談。他坦白地對他們說，他不但是爲驅逐共產黨，而且也是爲着整頓該省來的。他立即受到大眾歡聲相迎。大眾慶視他，不特把他當作在戰場上能够戰敗紅軍的軍事指揮官，抑且把他當作能够將一絲希望給他們困苦的生活的民族領袖。

即使像倫敦那麼遠的地方，關於緊隨着蔣委員長的抵達四川後那省局勢的立即改述，也作着記錄。『泰晤士報』在四月十二日的社評裏，說：『在蔣委員長身上，他們（指共產黨）有着比有一個時期似乎將統治新中國的美國化知識份子要幹練得多的一個對手。他已經顯示了一種顯著的將失敗變成成功的才力。他的從貪污的官吏與暴君似的軍閥手裏拯救四川省的五千萬民衆的努力，正在得到值得注意的結果。』同時，蔣委員長以及陪他入蜀的蔣夫人，慷慨地將他們的時間與精力化費在推進該省的新生活運動上，以及費心於籌劃禁煙的方法上。

依照蔣委員長拯救四川的計劃的一部份，劉湘辭去了軍事職務，以便將他的全付注意力用在民政

與復興工作上，他的二十一軍被分成由各自的司令官指揮着的三個較小的隊伍。四川被劃成八個保安區。每一區委派了一個軍事指揮官。命令所有的指揮官在六個月內完成那省的剿共工作的訓令是發出。然而他們却不許去干預他們管轄區內的，財政的司法的和黨部的事務，而在另一方面呢，那些負着處理那些非軍事的人們，也不准去干涉軍人的行動。

將近七月底，四省政訓的主席劉湘，奉了蔣委員長長的訓令，對他的屬員和兵士頒佈了許多規例。其中有：發給有禁烟啡罪的軍事長官，不論其職位大小，均將處以死刑；所有官吏，不准在沒有設立他們的總辦公處的城市，繼續設立他們自己的分署；不許藉口建造瞭望台而向人民敲詐金錢；軍用汽車不准搭載婦女往來各地。

爲了有效地執行他的改革計畫起見，蔣委員長在佛敎勝地，高大的峨眉山山麓，設了一個訓練『復興民族』的領導者的學校。高級官員，縣長，教育家以及其他生活部門的領袖們，必須受作領導者所受的嚴格的訓練。課程包括軍事知識，政治知識，經濟與教育的方法。官報學和信號法兩課，也是被教導着的。

十月六日，在四川省成都的國民黨總部的擴大紀念週的一次演說裏，蔣委員長宣佈說：四川是民族復興的一個理想的根據地；但是，要想復興該省，他說，必須恢復永久被尊崇的道德，並須提高人民



的知識程度。他勸導人民過一種正直而有益的生活。關於民衆教育，蔣委員長着重於和平與安謐的美德；指着他的有爲而提的建議說，如果領導者保持他們冷靜的頭腦，教育工作是不會混亂的。最後，蔣委員長替四川提出了兩點主張：第一，不應允准未成年的青年去拉人力車或者募入軍隊，這是他爲了道德的以及實踐的緣故而主張的改革；第二，倘使僅僅就數量而言，那麼，該省的兵力應該減少。

在這個廣大的運動後，蔣委員長被召回南京。雖則他並沒有在成都逗留多時，他却創辦了許多改革。那些改革是會顯次顯出它們是與四川民衆大大有益的。首先，劉湘和他的同僚不再是獨立的軍閥，而是服從南京的命令了。各縣是統治得好一些了。三十個新縣長，新的訓練學校的畢業生，一照料着它們的福利。在成都，賦稅須照着規定的稅率征收，而不再依着收稅員的私習慣於從僱兌上賺一大筆錢的銀行家，也在經營着合作信託社。水利專家，爲了人民的福利，正在改進偉大的灌溉制度。成都與重慶由一條鋪成的公路銜接起來，並且還在敷設着一條鐵道。

那省所遇到的強烈的心理學上的改變，和夫一些物質上的變更，正如一個成都的僑說的，自蔣委員長和他的南京政府真有處理四川省的權柄後，已顯出各種事情的建設與實際的趨勢。除了那些吸引蔣委員長注意力使其無暇顧及四省的事情之外，似乎沒有什麼良好的理由可以解釋：爲什麼這個中國的地形上的要地不應該成爲國防上所急需的經濟與政治的重要因素。

在這些應該擔負他們所觀察的四川和其他省份的許多改革的責任的航空旅行中，一徑陪伴着蔣委員長的蔣夫人，合理地斷定說：在一切幫助中國統一的發明品中，恐怕要算飛機是最卓越的了。她說：真的，它的消滅距離的能力，與它的幫同消滅相互遠離的地方長官間的，或中央官員與地方官員間的懷疑和誤會的成就，恰巧成了一個正比例。她指出說：在飛機的來臨之前，尤其是在那些邊僻的遠省，地方官竟是無人節制的統治者。在那些特別遼遠的省份裏，他們是不大能够參觀首府的，而且文牘的交換幾乎是沒有效力的，爲了它的往還要費大量時間的緣故。除了在極稀有的時期中，首都的高級官員決難想到從事深入內地的長途的旅行。她解釋道，從前，這種旅行，不特是化費無數時間，而且對於旅行者以及他所不得不經過的地方的所有下級的官員是十分不舒適的，艱辛與不便利的。在飛機未曾發現之前，要想有近似的速率和舒適，官員們祇能沿着鐵路綫行動，可是鐵道僅够及到這個大國的一小部份。

在蔣委員長之後，蔣夫人所處的地位，是最適宜於估定航空旅行在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的發展上的影響，不要說起它的經濟狀況了。所以，蔣夫人自己對蔣委員長的航空巡察所說的話的一番重述，是極其有趣的：『他幾乎飛到了中國的每一個省份——完成了他在平常情形下所永遠不能夠完成的旅

行。從南京到雲南以及回來，走着長江的一路，用平常的交通工具，將費兩個月的急速的旅行。然而現在用上飛機，它却可以在一天內完成了。從重慶到貴州省的貴陽的旅行，常需十六天的可厭的轎子旅行和許多的精力。由貴陽到雲的旅行，要費同樣數目的時間，而且需要同樣多的精力。可是蔣委員長却藉着飛機，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內，迅捷地飛越一重高山，而完成了第一段的旅行；在兩個半小時內，飛過了第二段。公路正在將這幾個地點銜接起來，那麼，無力搭乘飛機的旅行者，也可以利用汽車，而替他們自己解除數星期間在狹窄的轎子裏所造成的他們肉體上的骨頭上的，以及精神上的痛苦。

「蔣委員長在遠行他的義務中所作的幾乎常是重要的旅行，詳細地記錄下來，是不必要的。單說他飛過了全國，越過起伏的高山，肥沃的平原和沙漠的沙地，以及他曾經能够替國家做着有無法估計的價值的與悠久的重要性的事情，已是足够的了。他曾經憑着比較上的舒適和沒有時間上的損失，能够在遠地的官員們的自己官邸裏遇見他們，而在那裏，替他們解決了他們不同的問題，使他們心裏滿意，並給予他們南京對於他們和他們的憂患的密切關懷的保證。

同時，關於國家的地形與特資，他已能獲得一種活的知識。那種知識是其前任何高級官員

從來不能獲得的，而且那種知識，加以他的與不同的官員和人民的接觸，對於爲了有利於一個更好的中國的計劃的推進上，他所擔當的那些義務的履行，已經給予他以空前的準備。別的官員們正在比較有限的，但恰是同樣重要的方式下，取法於他的模範。他們這許多人，當然是在減少地方的妬嫉，而在相互諒解的基礎上樹立關係。平機在蔣委員長公務上替他所盡的效勞，實在是可驚的。」

## 第二十三章

- ：汪精衛：刺未成……………二：蔣氏任國府主席……………三：中常會的變動……………四：學生運動的復興……………五：蔣委員長改革政訓工作的計劃……………六：張報的對日關係……………七：蔣見日方通譯員……………八：無禮的日本少將……………九：冬田的署名小冊子……………一〇：『非蔣介石與國民黨滾蛋不可』

蔣委員長從四川到達國都後，就與汪精衛，孔祥熙和其他領袖們會談。其後，他對他的故鄉，作了一次短期的省察；遂即及時旋歸南京，參與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一日的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在開會的第一天，就發生了一件不幸事件，它使蔣委員長的兩肩負起民政上的附加的責任。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正當拍攝一幀團體照以紀念那一次盛會的時候，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突被一個從人叢中出來的刺客擊傷。他受傷得很是厲害，不得不辭退自己的職位，而到歐洲去受特別的醫治。這件事情使行政院少了一個院長。在所會中，衆委員就推舉蔣委員長來填補這個遺缺。當時，中央常

務委員會也起了幾個更動。輿論界指摘說：在九個常務委員會中，有五個委員，至而在日本受過他們的一部份教育；並且立即起了一種呼聲，說當時在蔣委員長方面，已經發覺了一種親日政策的證據。然而，日本人自己不久却發覺了：蔣委員長所選選的，是一個護華的，而不是一個親日的常務委員會。

在新委員就任後不久，蔣委員長就對他們略述他的政策。他教他們儘速的結束訓政時期，而在一致的努力下，用強有力的方法來從事建設。蔣委員長所要的，就是勤勉與謹慎的工作。他說：一切公務人的成績，此後將受詳細的偵查。成績好者會得到特別的獎勵，成績壞者將受到不稍寬容的懲罰。各委員間工作的重複和共同目標的缺乏，就可以消除了。簡言之，他警告說，在實際上及名義上，政界被澄清了後，那變政治改革才可開始，重要的工作才可沒有延擱地得到完成。

他允許說，建設工作必定要加速進行。講到經濟建設，他是指中國天然富源的開發與生產事業的發展；地面上與地土中的寶藏須被全部利用起來。他指出說：這種建設工作應該先為人民的福利而做的；爲了收得最好的可能的效果，可省的費用是要避免的。每一個人必須竭盡他的全力來得到國家的和平與安樂。他竭力說：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是該得到擁護的，因為它們是想鞏固國家的物質基礎。此後，中國必須依靠它自己的資源，而將它的全力用於救國事業。

他繼續說：中國是處在一個極困難的地位；而他的繼續的生存依靠着立即做起來的事情。他確定地說：認清了它的責任的嚴重性，政府應該迅速想出方案來，解決對於中國自由平等有害的各種問題。關於這方面，他驚人地說道，政府是不肯馬虎的。

蔣委員長向中央常務委員會所略述的以及不久之後公佈的那個政策，受到極大的關心，尤其在許多地方受到讚美。然而，它並不是受到日本人的讚美。他們却急速地出來饒舌，從事反對了。磯谷少將在上海宣佈說：在中日關係可以得到穩定之前，必須將中央政府中的國民黨的政治勢力與它的干涉除去。一份東京報紙伸訴說：『局勢比汪精衛做行政院院長和外交部部長時更加不好了。』日大使有田主張說：中國必須放棄依賴西方列強的政策，但是中國人對於這個不請自作的勸告的接受，是不會使他鼓舞的。

當時，蔣委員長所要對付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學生運動的復活。這個運動已經沉寂了多年。北平的青年們——被日本的侵入華北所激怒——開始舉行示威運動，而且他們的抗議得到了全中國學生團體的響應。最後，蔣委員長決定將全中國專門學校與大學的師生們召集到南京，讓他們親自瞭解政府所定的國策。

在過去幾年裏，中國的這種騷動與不安，在國家的危急存亡之秋，已經成了政府的許多煩惱的一

個泉源；尤其是關於中日關係的。有些人因了政府對待學生的寬容而責難政府；但是我們必須記著：中國的知識份子居於領導地位的传统仍是很強的。學生們是被當作將來的統治者的，因為如此，不<sup>⑤</sup>們丁輕輕年紀，他們是該以敬意顧慮對付的。這種對待他們的態度，是各階層人民所共有的；任何對付那些熱血青年——想就政府官吏們的責任而與他們辯論的熱心青年——的不當的苛待，是會激怒民衆的。

蔣委員長所採取的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無疑也是得宜而機敏的。聽了他的關於中國的處境的意見以及他所解釋的政府的國策之後，學生們就可將他們的力量轉用到建設方面去了。當學生們與他們的教師們，數達三百名，在南京會集的時候，蔣委員長坦白地同他們談話。他對他們說：政府希望他們肯保守紀律，並且留心他們的學業。在不違反學校紀律，或擾亂和平與秩序的時候，他們儘可以表示他們的意見，而不致有什麼糾紛的。然而，如果他們的活動竟然越過了合法的範圍，他們將受到法律的制裁。他說，他沒有規避自己責任的意思，並且請他們信仰政府。他指出說：在有些時候，一個政府是無可避免地不得不犧牲一些，爲了保持中國的統一，中央政府是不惜犧牲的。他解釋着：民族的復興，是靠在有秩序的文化發達與經濟建設的基礎上面。

在聽了幾個學生和大學教授的回答之後，蔣委員長作了這個劃時代的宣告：政府不會簽訂任何與



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有害的協定，也不會進行任何秘密協定。坦白地對付學生們的策略，得到了極大的成功；並且鼓起了一種希望，就是在將來的國家的緊要關頭上，如果學生運動再活躍起來，它也許會轉向到有用的方面。

第二件引起蔣委員長注意的，就是公共事業的情形。在南京中央黨部的一次演說裏，蔣委員長宣告說：公務員的組織與訓練是急需的，為社會為國家而盡的個人的犧牲，是政府的基础。在西方的國家中，不論是平時或是戰時，戶口，尤其是全國的公務員，是用統計表而調查起來，組織起來，而且予以總動員的訓練。中國的計劃是將這項工作在首都開始起來，先在那些負有指示與領導民衆以及處理國務之責的官員們中間實行。等到他們受過組織之後，民衆就可跟隨下去，工作範圍才可擴展到全國。這樣，政府就可收到最大的實效，而增加自己的力量。

在將這個工作完全實施起來的時候，蔣委員長應用了一句格言：『在平時，聽着人準備着戰爭；在戰時，他保持着平時那樣的沉着。』他指示說：不論如何艱苦，中國應該繼續準備。如果是完全準備好了，遇到戰事發生，中國就可應付萬一了。『如果我們在平時多流汗，我們就可以在戰時少流血了。』

蔣委員長報告政府說，在獨立了一個獨立的穩固的基礎之後，爲了完成它的新計劃與新政策起

見，政府自己必須特別的守着國家的法律，保持它的清廉與誠實，使人無可置疑。祇有這樣，才可克服自私與利己主義的黑暗勢力。他以自己的人格擔保說：他可以使自己手下的公務員保守絕對的清廉。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政府官員被查出犯着舞弊，貪婪，或是貪污的罪，他自願領罰。他宣佈說，他決不會規避或圖免那種責任，或者用任何的藉口來掩飾一個醜行。

此後，於民國廿五年的春季裏，在南京召開了一個有着極大重要性與特殊性會議。這一次會議到會的，有九十個行政與教育的地方委員和特別的行政委員，他們都是從江蘇，浙江，安徽，江西，閩南，湖北，福建，山東，河南與陝西等省來的；還有江浙皖鄂五省的省主席以及中央黨部，中央軍事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財政部與中央衛生處的三十四個代表。

該會的目標是在檢討地方行政的工作，尤其是在民政方面的，以及籌策改正過去行政缺點的方法，與獲取正常的解決。這一類會議的第一次，是早在民國廿三年在江西南昌召開的，當時議定每年召開一次同樣的會議。然而，在民國廿四年，由於蔣委員長全心用在剿共上，所以沒有開會。

這一次會議的開會詞裏，蔣委員長要每一個到會的官員做一份詳細的報告書，報告他獨特的一省或一區的地方行政的實際情形；所遇到的困難以及由實際經驗所顯示的現時行政的缺點。這些報告，在作為將來改革的考卷上，是有着極大用處的。他並且主張說：現在的行政法規的實效是必須保

習的。該委員長並且着重改進地方會計制度的必要，以便平衡地方的收支。

他指出說：在有些地方，保安隊已經成爲社會的一個障礙，它們應該被廢止掉，而將維持它們的經費用在保甲制的創辦上，或是用在地方警察的改進上。然後，他講到在省政府的各機關裏，工作上共同目標的缺少——例如：民政，財政，教育與建設廳常常自營自的工作。這些廳的相互關係既然是極端密切的，它們自該互相地通力合作。

他持着這樣的意見：關於教育的質與量兩方面，都應該加以改進；在現時，尤其是前者，更爲重要。中國所遇到的最重大的一個社會問題，就是許多以教書當作一種職業的人們的不適宜的訓練。他以為改進學校的教授人員是首要的。爲了發展基本教育及培植一個牢固的基礎起見，必須努力訓練帶練的小學教員和中學教師。他慨嘆着許多中學畢業生失業的那一件事。爲了想用一塊石頭打死兩隻鳥兒，他竭力主張說：失業的大學生應該受到特別的師範生的訓練，那麼，他們也許可以成爲合格的小學和中學的教員。在民國廿七年，小學校和中學校的數目要增加四分之一，因之，正需要一個相當數目的教員去領受訓練。

隨後，他又說，民政上有兩個需要考慮的急迫問題：警察制度的改良和土地管理的創始。一般人都知道：有些警察是不幹練而收受賄賂的。在許多地方，燕子窩，賭場與妓院是在警察的庇護下開業

的。●種行布，不特在邊僻的地方盛行，而且在大鎮大城裏流行。在警察經費缺乏的地方，他勸告當局將警察完全取消，而倡用保甲制度，或是以民團代替警察。

講到土地管理方面，他指出說，土地問題是中國基本的政治問題之一，而土地管理也是政府的基礎工作之一。在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要想進行政治上的建設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設立一種有效的土地管理，一定需要大宗的款子，這句話是不真確的。不過，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經費是該籌募的。

當蔣委員長與中央政府所應付的關於內政問題被世界人士與中國人認作重大時，中國的對外關係，主要地是那些對日的，簡直被認作更爲重大了。當然，危急的時期，起自民國二十年九月。自此以後，隨着日本人向亞洲大陸的挺進，由東三省，熱河而華北，接連地發生了一個一個的危機。在民國廿一年，曾經有過一次向上海的侵略，而隨後的幾年，在中日關係方面又帶來了它們的需要對付的特殊問題。

在所有的這些事件中，蔣委員長是確定地而密切地牽連着的。他曾在華中孜孜不倦地從事剿共，但是他却從來沒有鬆弛過自己對於日方發展的戒備，並且使自己與日方的發展並進。他是現在唯一的

中國人。對於他的意見，日方是認爲最重要的。

他對中國局勢的認識以及他的對於中日關係的態度，可以從他於民國廿三年年底，在南京接見一個日本通訊員立花（Tachibana）的一次會談裏看出。在那一次會談裏，他表示着自己贊成和平的。但是宣佈說：中國希望友邦以敬意與對它應有的顧慮對待它。這次會談的一個誠實的記錄，是在不久之後就設法得到的，給予中國的局勢以不少的啓迪。下列幾段摘錄是得其要領的：

「立花：中國對日的現時態度，似乎是持久抵抗的一種。聽說：在未來的危急關頭上，恐怕在民國廿四——廿五年，到那時日本或許要受到國際膠輻的重大壓迫。中國是會乘機反抗日本的。這是真的嗎？」

蔣委員長：我們人民中間，有幾部份人自然會這樣想的。然而，凡是熟悉世界大勢的，特別是熟悉遠東大勢的，在他們的反對另一次世界大戰上，是團結一致的，我們都知道遠東的安奎與繁榮是以世界和平爲依歸的。就中國本身福利的立場而言，不問可知它是不喜歡另一次狂亂的世界大戰的。中國與日本是遠東的兩個姊妹國，所有它們互相的友誼是該根據正義與善意的。除了相敬相信之外，是找不到另一個可以培植國際友誼的穩固基礎的。

立花：隨着東三省事件的發生，中國與國際及列強的密切合作，有沒有使遠東局勢更加復

雜的傾向？

蔣委員長：中國既然是國聯的一個會員國，它自該遵守『國聯盟約』的所有條文。

立花：最近列強在華的軍事勢力與經濟勢力的擴張，會不會阻礙中日的合作？

蔣委員長：就我所能看到的：意大利與歐洲各國不但停止向中國擴張它們的勢力，而且正在逐漸放棄它們的幾個特權。

立花：什麼是中日糾紛最好的可能解決呢？

蔣委員長：對於所有的中日問題，祇有一個基本的解決，那就是遵守相互的尊敬與信賴。

這個時局的解決，是完全操在日方手裏的。

立花：日本對於倫敦海軍會議的目標，是在確保它在遠東的獨立地位。關於這個問題，你的意見是怎樣的呢？

蔣委員長：我沒有詳細地研究過那個問題，不過我的懇摯的希望，就是成立一個這樣的協定——一個會把長久的和平與安樂帶給全人類的協定。

立花：日本希望國民黨中止它的現行政策，寧願孫逸仙博士的汎亞細亞計劃成爲主要的主義。你的高見以爲怎樣呢？

蔣委員長：今日的國民黨，就是孫逸仙博士的國民黨；它沒有脫離它的創始者原訂的主義。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我們已故的領袖的汎亞細亞的平等主義，也沒有人會反對使互相合作成爲事實的。」

後來，蔣委員長添加着：

『中國是已經統一了。西南是不成問題的。我可以對你保證說：中國的內訌時代是過去了，江西的共產黨問題也已經順利地解決了；但在國內的其他部分。也許仍有共產黨游擊隊所造成的騷擾。這些是可以逐漸平服的。』

立花：什麼是中國的邊疆政策？

蔣委員長：所有中國的土地都該在中國的直接統治之下。』

早在民國廿四年的二三月，駐在上海的日本軍官，已經向外國通訊社人員私語了：『瞧着五六月吧，有些重要的事情，將在華北發生了。將近那年的年終，人人明知日本有着變更華北現狀的預定計劃；特別是由於日本軍閥對於蔣委員長，張學良和國民黨的狠毒的攻擊，這層就極爲明顯了。』

在六月裏，日本關東軍的參謀長（Takishi Sakai）宣佈說：日軍不擬將它的活動局限於華北，

不過它已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蔣委員長，既為中國軍政機關的主腦人物，是必須下野的。他宣佈說：蔣委員長用了政府的資力與兵力來源，在統一中國的藉口下，實際是『僅在腐化被他視作一個殖民地』的華北，日軍的領袖們覺得他們最安全的計策，就是全然剷除蔣委員長的勢力，特別是在北方的勢力。他們宣佈說：會危害中國的民族生存的，不再是共產黨，却是蔣委員長。因而日軍意欲採取必要的手段，強迫南京政府取消所有的組織，包括防守的軍隊，國民黨政治分會，所謂『藍衣社』和其他團體，以及那些專門倡導服用國貨的所有團體。全中國的『日意識與『滿洲國』國內騷亂的造成，都該歸那些團體負責的。

不久之前，當他在天津的時候，關東軍參謀長說：日軍對於華北，有着一個一定的不能變更的方針。他簡直告訴何應欽，當時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會長，說蔣委員長給予何應欽的命令是『不誠意的』——講到中國人時，日軍領袖們所愛好的四個字——並且說蔣委員長的『兩面外交』是該拒絕的。在那些緊張的日子裏，關東軍參謀長與何應欽的多次晤談，包括着日本軍官以日本軍人特有的形式發表的獨白。那種特有的形式是日本軍官對付他們亞洲的『從兄弟』時用的。當然，沒有人會誤解那些獨白所含的威脅，以及關東軍參謀長對於蔣委員長個人的攻擊。日本已經決定了一連串對華的新侵略，這件事是昭然若揭的了。



日本第三總隊總司令百武 (Ono Hyakutake) 中將，在六月裏造訪四川成都的委員長行營，當時，他說明自己對於華北事件的意見，並且添加了更多的威脅。他說，日本軍部與外務省決定採取強硬行動。並說日軍正以至大的誠意談判那件事情，所以南京方面也該以同樣的誠意與它談判。日本的言辭上的壓力，在一篇綉就的聲明書上達到了一個最高峯。那篇聲明書，如果不是華北日軍總司令多田 (Higaya Tado) 少將所作的，定是他所授意的。這是一件頂出色的公文，可以代表同時代日本軍人的頭腦，但是日本人的劇烈的怨恨，却使它從日本軍閥所造成的其他事變裏區別出來。據聲明書的表示，那種怨恨是對蔣委員長和國民黨的一個恐怕並不是完全沒有恐懼成份的怨恨。多田將軍以為：在華北，組織一個新的自治區的大障礙，就是蔣委員長和國民黨。在他的民國廿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對日本記者的宣稱裏，多田說，日本與蔣委員長的國民黨是勢不兩立的。除非日本被屈服了，這個障礙是必須除去的。

對於這些壓力研究一番之後，勢必得到這個結論，就是將來用作辯護『積極行動』的口實是早已仔細地準備好了。很明顯的，日本人對於新生活運動的成功，以及未來中國民族意識的急遽增高的證據，已經擔起心事來了。日本認清中國人中間民族覺性的發達，一定會使它的階級和土的大志遭到失敗，因而他斷然地用盡自己可以運用的各種方法來阻止它。

到了六月底，據悉：蔣委員長決定了一個巨大的計劃，就是在中國創設一支新的有效的空軍。除了杭州的航空學校以外，還定下了在內地另外設立一所廣大的航空學校的計劃。這些都使日本人伸訴得簡直更加愁苦了。他們說，蔣委員長沒有露出一些改變他的被他們稱作對日的含糊政策的意見。

當蔣委員長所取的態度與日本人的一切無理要求格格不入的時候，他曾擬改成有着和解的傾向的態度。因為他心目中有着這個意見，所以在民國廿四年九月裏，他公開宣佈說：『中國與日本是兩個姊妹國，它們應該在公正與友善的基礎上共同合作。』他提議說：在解決中國的經濟困難上，中國向西方各國的求助，是不能視作一種抵制日本的手段，正如它與日本合作的努力一樣，是不能認作一個想限制它與西方各國間關係的願望的。

關於華北的發展，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就是：在這種環境下，中日合作的時機是否成熟？他申言說：要想解決一切的特殊事件與引起真正的中日親善，中日兩國應該維持着一種真實與平等的精神。

『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是建築在『和平』這兩個字上面，』他繼續說：『和平是中國對外的唯一政策。如果日本願意與中國共負維護遠東和平的責任，對於中國，應該採取一個比較合理的態度。要想得到友誼，相互的同意是必要的。一個新的中日政策，應該建築在相互的平等與獨立的基本原則上。中國是一個自主而獨立的國家，要它放棄領土上和行政上的主權，是

絕對沒有可能性的。爲了維護東亞的和平與顧全日本的利益起見，

讓步的，不過，這必須有一個限度。」

儘管蔣委員長竭力想除去中日間的誤解，日本人却在民國廿四年的秋天，找到了一件可以憂慮的新事情。幾個日本人有着一個意見，就是蔣委員長在四川的活動，尤其是他的在成都召集一個重要的軍事會議的舉動，有籌策一個抵禦別國侵略的國防計劃的目標。別的日本入又宣佈說：上海與南京的兵工廠裏的所有機器，都被搬到四川去了，並且說，這一點，就構成了蔣委員長在那省興辦一個強有力的軍事根據地的計劃的證據。日本人以爲蔣委員長終會從四川開始進行抗日運動的。蔣委員長命令第二十軍與第四十五軍由四川開往陝西，以便陸續進行那個區域的剿共軍事。日本對於蔣委員長的這個行動，甚至也認爲值得重視。他們以絲毫不減的狠勁繼續在報紙上對他攻擊。



## 第二十四章

- 一：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二：蔣委員長的重要演說……………三：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闡釋……………四：殷汝耕背國附逆……………五：華北自治運動……………六：日本幕後的陰謀……
- 七：廣田三期……………八：奸門的日本軍部……………九：東京的軍事叛變……………一〇：日本在  
華北的走私行動……………一一：半獨立的西南

在這些日本軍事長官向蔣委員長的口頭抨擊中，有着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和山東——的所謂自治運動。無論國人或外人都將這個運動認作是日本在中國領土上一個欲蓋彌彰的更進一步的侵略。這運動在民國廿四年夏天一直不停地繼續着，但沒有什麼重大的發展。其實這運動並沒有完全依照着日本的計劃進行。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沒有應許過什麼。日本人也並不信任那被認為分離派最先目標的宋哲元。閻錫山並不贊助這運動，而由五省漸漸減少到冀察二省。

日本人現在覺得就是祇有這二省也還不會完全順從他們，因為省中的領袖們在短時期內決不能馴

服地任日本人來干涉他們的行政事務。他們認蔣委員長在運用着可怖的政策，來阻止華北自治，而據說日軍極其重視着他的『欺騙。』民國廿四年的一月下旬，長駐北平的日本陸軍中佐，和北寧路中國當局，一同向據說是蔣委員長所命令的通車（將北寧路上車輛北京運南）的事，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感到非常不安，因為當時不斷地謠傳着說，蔣委員長正在動員着軍隊和運輸工具，以對付這自治運動。非官方消息說，在河南已有八師中國的救國軍動員了。蔣委員長努力地保證着華北五省中國領袖們的忠心。中央政府的工作很是簡易，因為宋哲元的幾個重要部屬都是反日派。但河北省非武裝區域行政長官殷汝耕，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被塘沽協定劃為非武裝區域的一帶，宣佈脫離河北省而獨立。東京外交部命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警告蔣委員長，不得因殷逆的反叛行動而通緝他，或用武力來壓制那運動。在中國的日本僑民的態度，很明白地宣示了日本的目標，就是廢續推進那運動。在上海的一份日本報紙這樣說：『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是完全和日本工作。』

在殷逆於冀東設立自治政府以前的二日，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是在南京舉行了。由於蔣委員長在他黨員中有着的優勝力量，他在會中五百十五票中獲得了四百九十五票，而當選為新組的中央執行及監察委員二百零八個委員的領袖。日本當然極其注意着這會議，而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在閉會後向蔣委員長試探中央政府對華北形勢的態度。蔣委員長告訴他說：中國政府充分地認識着那緊張的形

勢，並準備在意外的發展時採取適當的措施。

當那些中國重要軍事領袖們都齊集在京城中的時候，蔣委員長召集一個特別軍事會議，列席的有張學良，閻錫山，何應欽，馮玉祥，和其他諸人。這會議在日本政治圈內引起了不少的猜測。

這會議獲得了意外的成功。許多例行公事都具着真誠團結的精神做去，但其中最重要的事，是蔣委員長伸述政府外交政策的一篇演說。關於對外的關係，他提議從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開始的東北事變。他簡括地追述着隨後的發展——淞滬抗戰，和華北的長期抗戰。全國在嚴重的壓迫下已有四年了，而和其他常務委員會委員們，既受到國民黨委託着應付當時形勢的責任，他便非常敏銳地感到那壓迫的痛苦。然而，他說，這國家已從這次國難上得到了不少的教訓。對於國際間的關係，中國志在求民族的獨立和平等；對內，它力求能自恃和富強。

蔣委員長又解說：這一點曾極爲孫總理所重視，因他力主平等，廢除不平等條約，和精神物質的復興。他在他的『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和其他著作中，很清楚地指示了他的這種理想。

那麼中國在這十年中對於達到這些目的的工作已完成了多少呢？蔣委員長這樣詢問着，並回答着他自己的這個問題。這二個國民革命的方策應同時進行，並依着並行的路綫，以求獲得成功。假使中國祇注意着這問題的一方面，它一定會遭到挫折——一個當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

『國家間的關係，』蔣委員長這樣說着，同時顯然希望着日本能改變它對中國的政策：『與個人間的關係是完全不同的。在國家間決不會有永久的敵意存在着，這可用十九世紀中歐外交史來證明，因為當時的各國一會兒成爲朋友，一會兒又變成仇敵了。這因爲國家間的關係是複雜的，而它們的意見是廣泛的，而並不像個人間關係一樣簡單。在某一事件上，從某一個觀點上看來，似乎在兩個國家間完全沒有友好的可能，但在另一事件時和在另一個觀點上看起來，又好像沒有疏遠的可能了。這理論正有着無數的實例。因此，國家間的關係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換言之，能決定那包括着聯合和分離的友誼和敵意的國際關係的，是有關係之國家的興盛或衰敗，和民衆的重要利益，而不是片刻的感情或局部的權益。依着這些心得，先去細細地辨別緊要 and 可容遲延的事，並將重要和比較不重要的事細細地比較一下，然後才能決定最後的政策——這一點是一切負責的政治家都應注意到的。』

蔣委員長又繼續說，中國在每一次受到重大的恥辱時，它不得不回顧自己國內的情形。孫總理說，能滅亡中國的，正不止是一個國家。這是我們應對之很刺心的一個警告，因爲這次空前的國難是循着因果的原理，而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變。孟子曾說過：人必自貶，而後人貶之；國必自攻，而後人攻之。（大意）



蔣委員長又指出，假使中國不能依靠着它自己的努力而生存，那麼今日的友人或將成爲明日的仇敵；反之，假使它能自強和自恃，那麼它現在的仇敵也很有可能成爲它未來的朋友。他說：『人先自助，而後人助之』和『不斷注意己身幸福者，方能致富』這二句古語，也是根據着這個原理的。

『在我們這樣的地位，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着二點：第一，我們應該將完成政府組織認作是我們最大的責任，並且這不得因暫時的權益衝突而受到影響。孔子所說的『小不忍則亂大謀』，很清楚地宣示着這一點。在緊急時期中的外交形勢，的確不能用尋常的方法來應付。

第二，國際形勢的變化，常會發生得極迅速而沒有預兆。當一件猝然事變發生時，一定得迅速堅決地來應付。』

他說，東西各國在歐戰後所遇到的國內外的困難，都與中國十年來所受到的稍有相同。由於當局採取堅決迅速的行動的決心，那危機是終於消除了。

蔣委員長，又解說那擁有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的興亡，對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幸福，都有着很重要的關係——各友邦精明的政治家都已開始認識這一點。中國正在努力地追求着的，是全民族的健康存在，並與世界列強共存；它不需要別的什麼東西。假使中國對內能繼續進行那些完美和實際的改革方策，並對各列強友邦運用一個坦直真誠的政策，它深信總會有一天，無論內外都能獲得

瞭解。

他說：

「我們現在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按照着這幾點上看來，要阻止任何中止我國生存和妨礙我們復興大道的國際變化，我們應以國家和民衆的重要權益爲依歸。關於一切較小的問題，我們應有着更大的忍耐心，並且在不妨礙我們主權的範圍內，應力求與列強友邦建立友好關係；我們又應根據着互相往來和平等的原則，與他們經濟合作。否則，我們將服從政府而下一個堅決的決心。我不敢誇口，但也不敢卸去責任；祇要維持和平還沒有到完全無望時，我們不應輕棄和平；我們又不應妄言犧牲，除非最後關頭已經來到。因爲，個人犧牲事小，而一國犧牲的事却極其重大，個人生命很爲有限，而一國的生命却是無窮的。」

假使和平的廢續有着一個止境，假使我們堅決地下了犧牲的決心，假使我們爲和平而盡其最大的努力，並決定將犧牲作爲最後一着——竟在使國基穩定和喚起國魂——我真誠地相信着。那便是我們能克服這緊急事變和得獲民族復興的唯一政策。」

在蔣委員長作這篇重要演說後，日本的駐華大使，和陸軍少將磯谷和海軍少將齋藤——這二個是

大校的陸軍和海軍參贊，——一同會集，以討論達到他們侵略目的的方法，想使在中國的日本政府機關各支部的努力能集合在一起。他們的討論是根據着當時日本外相廣田的三原則的。這三個原則是：

(一) 壓制中國國內一切抗日運動。

(二) 在中國與它的緊隣——日本和『滿洲國』——間，成立一個合作的組織。

(三) 三國應一同聯合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在遠東的擴展。

在不久以後的一次會晤時，蔣委員長對那日本駐華大使說中國不能接受廣田的三原則，同時再度鄭重聲述着中國領土之不可侵犯。這時，有吉明假裝莊重地說那日本人在自治運動背後策動着的流言是絕對虛妄和沒有根據的。他說東京當局將這華北的行動認作是『當地民衆一致願望的一個表示』，但他向蔣委員長暗示着，日本政府不能容許他派遣軍隊到河北省去壓制那自治運動。

蔣委員長在回答時，着重於中日關係的改善，並說他有着更謀改善的計劃，但他指出說，假使華北的自治和獨立的成就，是得到日本的輔助，並違犯着中央政府的意志，中國民衆將對日本有着深切的仇視，而這樣一個形勢，假使真正發生的話，將使國民政府的地位非常困難。

蔣委員長在民國廿四年底和民國廿五年，繼續對中國和日本間的關係保持着強硬的态度。他於中國對日本的态度，有着無限的力量。因為他是行政院院長；他不顧着日本軍閥的陵辱，仍保持着一

個正常和友的關係。譬如磯谷少佐在他從中國回到東京後，曾這樣說：『日本的政策決定不顧着中國的態度。以蔣介石爲首的南京政府，以前曾用所謂欺詐的外交手段，來暫時解決日本和中國間引起的問題。』他又說：『蔣介石政府的是否真誠，並不關我們的事。重要的，是日本不應給中國在說到對日本的態度時有反狡辯的機會，而日本應使中國不斷地知道着它堅決的態度。』

磯谷回到東京去勸他的政府不要和南京因中日問題而舉行任何會議，除非中國先答應日本的一切要求。他又舉出一個更堅毅和統一的政策，以期立即解決中日關係的糾紛。他接着又略述不少要點，以作爲日本對華未來政策的基礎。他說，蔣委員長已覺得他不能再以前對日本的政策而獲得成功，於是日本對華政策實施的希望，也成爲更濃厚了。尙待解決的中日問題能很容易地被全部解決，假使南京政府能依從着那些日本政府早已送出的提議，而實際可以不必舉行什麼南京中日會議。中日問題的根本解決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蔣委員長與國民黨斷絕關係

磯谷又繼續說，西南長官們的地位，尤其是廣西省，在遠東安全的觀點上，是和日本相同的。所以日本不一定要怎樣注意到中國那一部分的較小事件。甚至還值得給予西南以實際的援助，以使他們能完成建設的計劃。

民國廿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東京的一部日本軍隊突然講變了。這次講變中值得注意的，是幾個內閣大臣和高級將領的被殺。中國將這認為是日本對華實施更橫暴政策的前兆。由於軍隊的殘忍暴動所引起的東京政治變化，有田八郎——在南京的新任日本駐華大使，回到了東京去，並在那兒就任日本外相。談到日本的外交政策時，他如常時一樣地縱談着關於日本和中國間的血緣關係，文化，和互相依賴等，但對於他所建議應存在於兩國間的合作的性質，他却絕口不言。大家都臆測着，他的所謂合作，就是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在有田離開中國前，曾有人清楚地告訴他說，中日關係的調整，全看日本是否將在華北中止一切軍事行動而定。

蘇維埃俄羅斯和外蒙古在這時所訂的互助公約，引起了日本更大的憤怒。關東軍和『滿洲國』對口蘇蒙公約，宣誓『保護』所謂冀東互共自治政府，使不受到共黨的襲擊。國民政府因蘇蒙公約而向莫斯科提出的抗議，結果更喚起了日本無窮的忿怒。日本人都這般說着：『這些事的目的完全是想阻止我們，而蘇俄的政策似乎正敵對着日本和『滿洲國』』

四月裏，日本國內謠傳着說，蔣委員長正準備假託着剿共的名義而集中大量軍隊於山西省，以阻止日本的西進。這，據日人宣告，又顯然是『中國不願和日本合作的另一例證，同時是中國的詐偽的一個顯明證據。』

然而蔣委員長在民國廿五年還遇到另一個問題，因為華北日鮮浪人的走私，已開始成爲一種嚴重的事實。天津和秦皇島區域內的海關當局。在每件事務上都受到干涉，而駐紮在那兒的日本軍官又限制着他們的活動。到那年七月，海關當局覺得他們不得不在新形勢的壓迫下屈服，而海關緝私船便從所謂非武裝區域的海面上撤退了。爲了那件事，海關的緝私工作，從民國廿三年秋天起，實際上就早已不存在了。

民國廿五年初，華北的走私行動已成爲一件有着國際重要性的事，並海外引起了普遍的批評。南京的外交部再三地向東京提出抗議，但不能得到任何滿意的答覆。『倫敦泰晤士報』這樣地記述着：日本對英美二國關於走私的外交抗議的推諉的答覆，指出對這『虛偽的欺騙』的默許，不單是當地軍人的舉動，而是政府政策中一件經過熟慮的舉動。

到五月，中國海關因無限制的走私行動而受到的損失，已約計三千萬元。形勢成爲十分嚴重，中國遂向東京送出一張強硬的抗議，指出中國海關的緝私權不應受到任何方面的干涉，並堅請日本政府立即採取有力的步驟，以阻止他們軍事長官再作任何不宜和不法的干涉。其中又說到塘沽協定中並沒有關於海關武裝船的問題的規定，並且這協定中的任何條件都不能解釋作可以約束海關武裝巡邏隊的

緝私行動。

然而這抗議一些不能得到什麼答覆，祇是些日本無聊的聲明，說他們對這事是無關的，並說走私的真正原因，是中國的稅率太高。已退休的日本華北司令，陸軍中將，多田駿粗悍地說，中國應付當時形勢的最好方法，是將進口稅率減低。日本軍陸又大量地開始闖入華北。

但南京外交部部長張羣將軍不願這些，他不失自己尊嚴地，並如政治家一般地要求着中國和日本間更大的諒解。爲避免着互相攻訐，並反對着任何從對方獲利的念頭，他勸日本和中國採納一種互惠政策。這請求在道義上是無懈可擊的。

日本向海關的襲擊，和日本在華北不斷地侵略的結果，更增加了和平解決中日間的懸案的困難。蔣委員長在他行政院院長和國民政府軍政部長的位置上，從他自己和他親自任爲外交部部長的張群的言行中，很清楚地顯示了他維持和平的願望，因爲他想能集中注意力於中國經濟的建設。但日軍在華北的陰謀，却明顯地在挑唆着一個日本，中國，蘇俄，和或許其他各國都將被捲入漩渦的大戰。

從以前幾章中可以看出，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威信和權力雖然不斷地在增加着，這時還不能說中國是一個全國統一的國家。雖然華北的大員在名義上是被南京委任的，但有時有許多長官

東的被國府任命，顯然因為他們是親日派的緣故，在他們中有幾個的確與西原借款和日本其他曖昧行動有關。很清楚的，日本人決定對華北運用他們在東北和察哈爾獲得這樣滿意的收穫的慣技，雖然這次沒有像以前那般熟練和慘酷。

華南所受到國民政府的約制，比華北更少。南京對西南政治會議和西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選，絲毫無權過問。這些公團，雖然並不被外國承認，但在處理事務時却好像有着獨立的主權一樣。粵桂二省的軍隊，在名義上是中央軍的一部分，但實在他們祇肯對自己的統帥效忠。西南實際可說是南京的一個負擔，而不是資產。祇要這三省——其中一省是人口稠密而非常富饒，且二省都極為重要——在實際自治時，像幣制和裁判權的改革等事都是絕對不可能的。日本人對這些都很明瞭。誠如磯谷所說，他們的確在盡其所能地煽動着南方來反對中央政府。

蔣委員長知道在西南將領們甘願服從南京的命令前，他統一全國的理想永遠不能真正實現。據很有理由的猜測。說他的幾個顧問會再三地勸他用武力去征服兩廣——這，祇要他願意，無疑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蔣委員長的政策是從不願使用武力，假使他能用其他的方法來達到他所追求着的目標。他對無論何事都有着極大的忍耐心，而這常引起了解他的人們的欽羨，和粗魯的人們對他的不悅。但當蔣委員長一旦知道勸解不能奏效時，他就會迅速地實行打擊，並且是猛烈的打擊！



七月中發生的事件，充分地證明蔣委員長之忍耐政策之效力，同時使他的威信也增加，比之假使當初因他派兵征伐兩廣而得的威信，正不啻有霄壤之別！



## 第二十五章

- 一：西南再度作梗……………二：假意的抗日軍事運動……………三：爆發反中央政府的運動……………
- 四：南方的軍隊活動……………五：湘省的廣西軍……………六：蔣委員長告誡陳濟棠……………七：政
- 府軍嚴加警備……………八：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九：反叛陳濟棠……………一〇：蔣委
- 員長演說……………一一：中央決意肅清叛逆

民國廿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報紙上載着中央政府已與西南發生接觸的消息。這些消息當然是杜造的，但西南確已將兵陳列邊界表示進攻之行動；這使國民政府感到非常不安，而很有可能引起一次內戰。軍事領袖們——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二氏——動員了他們部下的軍隊，並宣佈成立『抗日救國軍。』陳濟棠成爲這軍團的總司令，而白崇禧成爲副總司令。在這些行動中，有着某種程度的陰謀。他們向全國發出通電，說他們三個愛國者不能忍受着日本在華北的侵略，並請求國民政府向侵略者宣戰。由於當時中日間對華北形勢的緊張關係，信個通電受到了民衆熱烈的歡迎，雖

然一般真正的中國愛國者，和那些希望中國強盛的友邦人士，却都對這中國國內的分裂覺得氣餒。

然而華南將領們設法使他們行動有真的抗日態度，甚至不能欺瞞孩子們，大人們當然更不必說起了。人人都知道那些廣西的軍人會雇用着日本顧問。日本也還將軍器和軍需售與陳濟棠，以實行他的所謂抗日戰爭。六月十二日，在中國的日本軍事參贊，陸軍少將的確曾證實說，華南將領們曾爲他們所建議的抗日戰爭而向日本購買武器和軍火。他們這個敵對行動，顯然是向中央政府而發的。華南將領們深信中國民衆的抗日情緒，和蔣委員長在忙着華北的事務，都能使他們在一個向中央政府攫奪土地的戰爭中，佔着絕對的優勢。

六月初，南方開始軍事行動，而廣西軍在桂省之北的湖南省境挺進了十五里。六月七日，蔣委員長拍電給粵軍總司令陳濟棠，勸他放棄軍事準備行動，並請他注意着因外侮而宣佈獨立的愚蠢，這電報回覆着桂省和粵省在六月二日和四日拍給中央政府的電文；其中他們請南京政府向日本宣戰，並表示將獨自作戰，假使中央當局不願與他們合作。

「你不能因暫時的刺激而將一國的生存來孤注一擲，」蔣委員長這般說。他鄭重地說，粵桂二省抵抗侮的決心，雖然獲得了不少的同情，但祇有全體民衆有組織的努力，才能達到救國的目的。個別行動，他說，將立即引起國際間威脅的喪失，增加中國敵人對他的侮慢，使他的友人失望，並減削

中國的最後抵抗力。

挽救中國和保證它的賡續生存的唯一方法，蔣委員長指出，是一致應付着當時危急的形勢，並用它全體的力量來達到那目的。假使中國缺乏着一個確定的政策，如遇中國的一部離開了其餘各部而開始個別行動，則中國一定會喪失它應得的尊敬。他這樣繼續着說：

從軍事原理的觀點上看來，任何要得到勝利的運動，都應有着統一的指揮，並應有着健全的組織。要得到表彰，必須發動一個國際間的戰爭。甚至一個友邦軍隊的行動，也一定須在和它同盟者的參謀本部細細商量後才能實行；這樣，那共同的目標才能由於他們聯合的努力而達到。

我深信我很知道些軍事的原則。假使你突然動員軍隊，同時希望着以後能從他處得到援助，但預先却沒經過斟酌，那你軍人的地位一定會受到不利的影響。

再者，戰爭或和平的事對黨國極為重要。你怎樣因暫時的刺激，而不願意再去力求達到那些決定國家生命的大眾目標呢？

這幾天流傳着的許多謠言，引起了不少的猜測和疑慮。普遍的評論說，假使粵桂二省的行動確和謠傳相合，那麼他們所得的結果會正和他們救國的願望相反。

我很知道你是真實愛國的，所以我不願相信你會贊助這類出我們不和的運動。我請求你不要任你的軍隊進入鄰省境內，因為這樣會引起對你原意的猜疑，並損及全部國策。我又希望你能源負責的代表到南京來，和我們解決一切問題。

由於我國現在的困境，我們不能自由地辦理一切事務。中央政府救國的決心，正和你的一樣堅強。像你這般聰明的人，決不會不見到我議論的要點。最後，請你將這電文的要點告訴給

李宗仁和白崇禧』

三天後，蔣委員長第二次拍電給陳濟棠，勸他遵照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撤退粵桂二省的挺進軍隊，以阻遏一切流行着的謠言。

「將在一月後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大會上，」蔣委員長的電文這樣開始着，「國民黨將解決一切未決的政治爭端。一切忠心的軍士的本分是遵守黨國的命令，而他們永遠不應該採取任何引起民衆不安的獨立行動。」

蔣委員長向粵省軍事領袖們提起當時的形勢說：華北形勢嚴重，外交形勢緊張，全國又都對全部形勢憂憤着。並說，他深信陳氏和其他西南文武官吏決不會在這樣一個嚴重的時候，來增加國家的危機。起先，他不相信那些流傳着的許多謠言，但據極可靠的消息說：粵桂軍隊確已在六月八日開入了

永州和郴州。再者，他又得到他們還在繼續北進的消息。蔣委員長繼續說：在接到這些報告後，中央政府立即命駐於衡州府以南的軍隊開始北退，以避免發生衝突，而未決裂的談判尙能企求着對那事件和平解決。

蔣委員長接着便熱心地勸說陳濟棠命他粵桂的挺進軍隊停止作戰，並回到他們原來的駐軍區域內去。否則，他忠告着陳氏，這獨立行動的繼續進行，而不顧着中央政府最高當局命他們中止軍事行動的命令，將使觀察家們有着這樣一個印象：這不是中國軍隊一部的抗日戰爭，而是當地軍隊和長官反抗中央政府命令的一件事變，他表示在他軍中，一定有幾個不滿於政府和眼光淺近的軍事領袖，在藉口着抗日宣傳，將軍隊越過省界，以逞他們私人的野心。

蔣委員長又說：

「然而他們不能覺到，國難既是一天天的在加重着，民衆已不能被這種偽託的虛偽愛國心所朦蔽了。我請你不要墮入那些不負責任的人們的計中。否則你會犧牲你過去的革命功績和榮譽。你曾不畏任何艱難地同我堅守在一起，所以我以爲向你真摯地忠告，是我應盡的本分。」

我國現在雖已到了這樣一個危急的地步，但我們仍須貢獻我們最大的努力，來保衛我國的

生存，即是使我們得到民衆的援助，並且還在了一起工作着。假使在現在這樣的生死關頭，還有着內部的分裂，後代的人們將對我們發生一個怎樣的感想呢？」

蔣委員長說，陳濟棠是在西南握着領袖的地位，任何不忠的行動都將使他自己的名譽一敗塗地。因此，他勸陳氏應服從着中央政府的命令，而立即召回兩廣的軍隊。蔣委員長在那篇電文中又指出說：這樣一個行動不單能澄清當時危急的局勢，並且還能證實他純潔的愛國熱忱。

蔣委員長另外再請陳氏將他這電文的大意表達於廣西軍事領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二氏。蔣委員長結論說：政治形勢的從混亂變成穩定，不單是國家的幸福，並且也是兩廣本身的福利。

當蔣委員長正進行勸解，並企圖使西南將領採取合理和愛國的態度時，他却決沒有疏忽了必要的軍事行動。大量的軍隊都從湖北調入湘省，而這些軍隊行動的迅速，無疑使粵桂二省感到了驚慌。湖南省主席何健仍對政府效忠，雖然有些當地的省軍是由於他們忠心的可慮而被調到他處去。對湘省形勢的變化感到驚惶的華南領袖們，開始向中央軍的集中提出抗議，並說適宜於他們的地方應該是華北，去抵抗日軍。六月十二日，據稱南京軍隊已向前提進，而南軍也已隨着後撤，但雙方都留意着不讓有任何大戰發生。南京的本意仍是想使這些困難能得到和平解決，而華南領袖們却也並不希望着什麼戰爭——他們所需要的祇是金錢。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宣告將於七月十日在南京舉行，而各派都等待着這會議對中央政府及兩廣間未決爭端之議決案。因此，軍事行動大抵祇是些軍隊的調動等等，然而宣傳戰爭却也正積極地進行着。華南將領們派代表到上海和北平去；北平的人們，很歡迎他們，並聽着他們的宣傳，雖然宋哲元和韓復榘的目的。是想在禁錮他們之前等着看什麼事將會發生。

廣州那些不能同心的政治家們爲了要使他們的抗日藉口更逼真，準備在六月十三日於城中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反日遊行。日本直到此時一直很歡悅地注視着華南將領們假裝的反日情緒，因爲這並不是出乎至誠的，和廣州的遊行却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因爲他們知道民衆的反日情緒是純正不假的。結果，日本連忙向遊行之事提出抗議，而爲『顧全顏面』計，陳濟棠覺得他一定有拒絕日本抗議的必  
要。

六月十七日中，中央軍在湖南省的集中是完成了。這行動的敏捷，增高了不少南京的威勢，尤其是對於將成爲決戰場所的湖南省的民衆們。這對華南將領們也有着莫大的影響。他們現在已開始退縮，並發出呈文，對國府的『誤會』南方抗日戰爭的意志，表示遺憾。

他們向中央政府提出許多新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府應給予南部二省以經濟上的援助，以使他們能度過經濟的困難。其餘的要求是關於反日運動，應於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舉行的民衆大會的展

期，和國家憲法的改革等。這時，大家都已很知道華南將領們所最注重的是金錢，粵省這時正遭到一個極嚴重的經濟恐慌。至於桂省以前的稅收，大半來自鴉片稅收——從四川，雲南，貴州等省運到海岸的鴉片稅。在蔣委員長增強國府對上列西部各省的節制後，廣西軍人們就再不能徵收到這麼多的鴉片稅了。

六月二十日，日本官方通訊社——同盟社——發表消息說，蔣委員長已向華南將領們發出哀的美敦書，要求着他們屈服。但這却被一個南京的官方發言人斥為純粹的宣傳。顯然的，在南方的叛變行動開始時，日本人極希望他們之間發生衝突，以使他們自己能從中取利。雙方的確都在等待着將於七月十日在南京舉行的全體大會的結果。六月底發生的重要事件，祇是北方將領宋哲元和韓復榘的要求和平的請求，和廣州改編從前的十九路軍的企圖。

蔣委員長又顯出他能了解報紙傳佈準確消息的重要，他在南京接見了許多中國記者。他說，中國的存亡關鍵，完全在它自己的手中，假使全國民衆能團結起來，並忠實地在一處工作，那麼他們便能克服一切當前的艱難。反之，假使他們自己還要內訌，禍患一定也就會來到。

他解說著：

在這個緊要的關頭，我們對國家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中央政府必得將它國內和平與統一

的政策實行到底，而我希望全國同胞都能了解我們的態度，並盡他們國民的責任，努力幫助着政府來完成這政策。

中國應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我們從過去的歷史上，知道一個國家祇有在全部團結時，和平與強盛才會存在，而上下不能同心協力時，就會有恰巧相反的情形。因此，假使中國的行政是在統一的指揮下，中央政府一定須負起全部的責任，而不應卸之於他人。

但就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對各地的權益也得經過相當的考慮。各省居民的心理風俗常是各異的，所以當國府在努力想獲得統一的行政機構時，這些也都要顧慮到。』

他說：中央政府極願用着絕對公平的態度來討論兩廣的問題，以求達到這些問題的圓滿解決。中央政府又極願用人力和經濟來幫助這二省的發展。但他指出，他們的目標是全國的福利，而一切個人的利益和私見都應放棄。他表示希望這二省的民衆能認識合作和遵守紀律的重要。他指出中央政府正在努力地想用和平的手段統一全國，因此那二省爲了使國家富強和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起見，應該擁護中央政府。

他指出維持和平與增強國防實力的最主要因素，是嚴格的軍事訓練和統一的軍事指揮。一切軍隊的調動，都應遵照着中央政府最高當局的命令，因爲它負着決定國策的使命。祇有這樣，這國家才能

統一，而且成爲富強。他又繼續說着：

『假使中國的哪一部份想對國事有所建議，他們應和平地並絕對公開地提出，而不應該有任何能引起國內不安的獨立行動。』

最近粵桂二省的軍隊已開入了湖南貴州江西和福建等省——這行動不合於前面所說的原則，而我對這事很爲痛心。然而我仍深信，這二省的將領和軍士都是極愛國的，並能尊重中央政府的政策，而且倘若他們對這事能細細地考慮一下，他們一定會因國家的福利起見，而與中央政府合作。假使他們真能這樣做，他願用極大的真誠來對待他們。我不願譴責他們所做的事，或者派別省的軍隊到粵桂二省去。我用着絕對坦白的態度在要求着一個正實的回答和兩廣當局對政府的忠心擁護。

至於我個人的態度，這早已是國內無私的同胞們所共曉的了。在這個緊要關頭，我既受黨國託付着這樣的重任，我一定將爲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而努力工作。我早已宣示過我不願成爲新憲法總統之職的候補者。而我還能鄭重地申說，我並不介意任何個人繁榮或利益。我覺得我應盡力捐助，以挽救我國的貧困，因爲我能隨時視察我國遠近各部，並看出各處民衆的需要，而這樣又一直可用來幫助解決各種關於軍事改組，教育改革，經濟建設，農村改良，各省交通，

及一切其他關於民衆根本福利的問題。我祇想領導着同胞們去克服困難，並爲中華民國奠定穩固基礎：這也就是全國國民的共同目標。」

從華南的反叛行動開始時，就一直有着關於他們內部不和的消息。甚至在南方將領們公開表示辭意前，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已力持應與南京用和平方式解決各種問題。並且爲了表示反抗陳李白三氏的戰爭政策起見，出發到歐洲去。在南京的廣東同鄉曾拍電到他們的故鄉廣東省去。勸他不要做傀儡的行動。甚至在廣西省——一個管理遠較粵省優的省份——也有着農民們反對廣西將領徵兵制度的消息。

不久以後，外界開始知道連陳濟棠部下的幾個重要將領也都反對着他敵對南京的行動，七月七日，這些傳說着的內部分裂有清驚人的演出，因爲粵軍中有二十一個空海將校出走香港去，並且還有十個乘着四架飛機飛到南昌，歸觸了中央政府。到香港去的那些脫逃者，痛斥粵桂二省軍事領袖的腐敗。他們斥責那些領袖是和日本勾結着的。在這形似一張長篇聯名通電的電文中，有二節是這樣的：

「自從他佔據粵省後，陳逆（濟棠）就使民衆擔負着空前的重稅。就祇他個人搜刮所得而言，已不下一萬萬元。他在廣州香港的地產的數目之鉅，全國無人能與他相頡頏。莫秀英（陳

濟棠之妻）竟已設立了一個地產公司，而陳維周（陳濟棠之弟）也常乘舟砲艦來往巡弋，以防任何財產的被竊。他們在不忠實地和正當商人競爭，並且利用着他們的財產來操縱金融市場。但是粵軍却已有六個月沒有領到軍餉，而民衆還須繳納『數十種』之多的賦稅。陳濟棠祇知道怎樣自肥，而一些不顧民衆的痛苦。他的確是一個粵省的好賊，同時是民衆的害蟲、

再者，他曾在經過審判而將許多無辜的人們處死或監禁。任何敢詆譏他政策的百姓或軍士，他都拘禁起來。他所用的苛刑，真非筆墨所能形容。在這種嚴刑威逼下，什麼招供會不能得利呢？於是無數的人們是在逼供的罪狀下犧牲了。例如從這次暴動的開始時起，已有二百多個第六師的將校軍士，一百多個中山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四百多個軍校的學生，和各個官方機關中許多參謀人員，因有反對他的嫌疑而被監禁起來。每天都有許多人繼續被他扣留起來，而每夜又有無辜的人們，在他的命令之下被公安局秘密槍決。』

我們這時還能加上一句，這些廣東飛行員所發表對陳濟棠壓迫民衆的罪狀，都是非常真實的。五年中，陳氏一直壓榨着粵省以增加他自己，他家族，和他同僚的私產。當談到南京將領們用大量的『銀彈』來收買陳濟棠的部屬的消息時，我們應該記起上面所說的這些事。在中國，尤其在外人中，人們慣常臆測着『銀彈』是壓制剛纔萌芽的叛動的主要因素。但在這次的叛變中，的確並不需要用這

種手段，因為粵省當地的民衆正已決心除去他們的壓迫者了。

七月九日，粵省綏靖主任李漢魂，宣告脫離華南的運動。同日，廣東第一軍軍長余漢謀也不依着陳濟棠的願望，而飛京視蔣委員長會商。陳部下其他的脫離行動也都很快地隨着發生了。是月十四日，廣州海軍的西鎮砲艦中。有兩艘逃到了南京去。

蔣委員長在七月十二日於南京中央黨部紀念週上，再三地講述着中央政府準備用和平手段來解決兩廣糾紛的政策。他申說着，在中央政府能注意對外問題前，一定須有統一的行政組織和軍事指揮。他說，中國的對外政策。應有一個有力的內部行政機構作爲後盾。而假使國內的行政組織並不健全，抵抗外侮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蔣委員長充分認識外。威脅的嚴重，並嚴肅地說，中央政府不能逃避他平定內亂的責任。他繼續說平定內亂一定要並用理性和常識，假使鄭重地說，在忠逆之間也應劃一道嚴禁的界線。

蔣委員長向在會聽衆擔保，中央政府在過去六月中，一直完全依照着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所議決的內外政策在做。接着他又指出：『我們都應該記住：假使我們內政統一和國基穩固，世界列強都將尊重我們。當中國真團結時，沒有一個國家再會敢來反對我們。』

蔣委員長在分析國內形勢不穩的原因時說，這完全是各派領袖不能合作的結果。他又說，這不歸咎於全國愛國的民衆。要使國內情形穩定，須先解決黨內的不和，而解決這一點的最好方法，是遵守憲規和國法。對於兩廣獨立行動的事，蔣委員長說，這種行爲，就法律上論，是絕對不容許有的，不過，他又說，中央政府從剛正開始時起，就採取容忍的態度，以求用和平手段來解決當時的形勢。然而他對兩廣領袖用來辯護他們行動的口號『將軍事指揮在抗日的旗幟下統一起來』，覺得只是痛心，因爲，據他解說着，在對異國的侵略作武力抵抗前，一定須有統一的政治和軍事指揮。

他說，中央政府的確已用盡了一切可用的政治手段來解決現在的糾紛，但同時他希望西南的軍事領袖們會對他們的行動反省。在另一方面，蔣委員長說，中央政府決定維持黨紀和國家門團結，並很有膽量來壓制任何叛動。『我們都應認識，』他鄭重地說着，『由於外來的壓迫，國內的騷亂更須被壓制下去，中央政府不應對少數軍事領袖的野心表示退讓。』

蔣委員長表示他深信，凡是一個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時會後退的革命政府，決不能完成它的使命。他說，中央政府所以要用這種政治手段來解決內亂的原因，並不是因爲中央政府懼怕着內外同時的壓迫。這完全由於各派同志間過甚的友誼，和由於增強國防實力的願望，以便全國能一同抵抗異國的侵略和完全復興中國的重大使命。



次日，他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大會上，答覆西南代表所提的要求抗日的建議。這建議早已被拒絕了。他發表意見說，西南領袖的所以提出這樣一個建議，是因為他們由於隔膜，而不能充分了解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之故。甚至對民國廿四年十一月間中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在和平還沒有完全絕望以前，中國決不輕棄和平在中國未到最後關頭前，也決不妄言犧牲，』西南的人們也不能充分地了解。

蔣委員長清楚地說，在要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的時候，才應該到國家的犧牲和戰爭。中國不會讓任何國家來損害它國土之完整。『中國』他重復地說着，『決不會簽訂任何損及它領土完整的條約。』例如，當任何國家強迫中國簽字承認『滿洲國』時，那就是中國作最大犧牲的時候了。又如，當任何可用的政治手段都不能阻止一個強國向中國領土侵略的計劃，而中國的生存也就這樣受到威脅時，那也是中國作最大犧牲的時候了。

『簡言之，』蔣委員長說，『這是中國和生及生存之戰的至少限度的條件。』在過去六個月中所發生的事，使大部份人都覺得當時的形勢，已不是絕對沒有和平的希望。他在會議中坦白地說，較之過去六個月中的形勢，現在的確已顯露着一道強烈的和平曙光了。

他繼續說着：當中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正在舉行時，意阿戰爭剛正開始。世界的輿論當然都

表同情於阿比西尼亞，但不幸阿國在今日已是一個淪亡的國家了。然而阿比西尼亞的戰敗，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像阿國一樣爲着保持主權和獨立而戰爭。中國不怕成爲另一個阿比西尼亞，假使戰爭是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唯一方法。『雖然我們不怕成爲另一個阿比西尼亞，』他說，『我們却也』預成爲阿比西尼亞第二。『假使全國同胞和全黨同志都能堅強地團結起來，作爲中央政府的後盾，那麼中國決不會成爲阿比西尼亞第二的。』

中國的生存或滅亡，現在都在國民黨的手中，而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全體委員更應負起這責任來，『那麼，』蔣委員長詢問着，『當現在的情形還沒有到和平完全絕望的地步時，我們能將這國家推入一條不通的崎嶇小道嗎？當國家還有着復興的希望時，我們能祇因着一時的刺激而催促國家的滅亡嗎？』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說，他相信一切充分了解國民政府對外政策的人們，都不會輕易地採取這樣一個步驟。組織國防委員會（這事早經決定了）的目的，是使全國各地負責的軍事長官都能在一起討論那些問題。有着完全的團結和精誠的合作，人人才能在遇到不得已的結果時，同心協力地一同負起抵抗外侮的責任。

從中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閉會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地根據着以前所決定的政策進行救國工作。最後，蔣委員長更請求當時在會的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會裏面的西南代表，將中央

政府的政策轉達於西南的各將領。



## 第二十六章

- 一：陳濟棠免職……………二：西南政治分會撤消……………三：陳濟棠逃往香港……………四：粵省藍
- 籌主任余漢謀……………五：廣西將領的問題……………六：蔣委員長的事俠心和寬大性……………七：
- 沒有領袖慾……………八：日本的新要求……………九：中國的反要求……………一〇：蔣委員長對川越
- 的明白表示……………一一：中國的強硬態度和日本於滬退灘谷之困境

蔣委員長在席上對外交政策作重要敘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將陳濟棠卸去了粵省的一切職務，雖然爲了不使他太受屈辱起見，還委任他爲新近組織的國防委員會中的一個委員。西南政治分會和西南執行委員會都被撤消了。余漢謀代替着陳濟棠而被任爲廣東省綏靖主任，並受命調動軍隊以使南京的命令發生效力。陳濟棠廣東第二軍軍長去將余氏的粵胸軍第一軍解除武裝，但這不是一個無效的命令。他又向廣西軍人請援，而桂省便派一部分他們的軍隊到廣東去；這引起了當地民衆異常的恐懼，因爲他們對廣西軍隊的驚懼，正和對數年前的壓迫者一樣。

粵軍的叛離，現在變成每天都有發生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十月十八日。在那天，所贖的廣東空軍，在秘密準備就緒後，有一百六十個以上的駕駛員和技師，乘六十二架飛機離去；四架向着香港飛去，而其餘五十七架——其中一架不幸於途上失事——却去投降南京。最後，五十六架飛機到達了南昌的中央政府空軍根據地，並在那裏拍電給蔣委員長，請他去勸查他們和他們的飛機。

陳濟棠乘着英國炮艦『蛾』號逃到香港去，因為他不敢放心地乘着他自己的軍艦，他從香港躲避的場所，請求中央政府派他出洋去。

使全國民衆一致擁護中央政府的原因，是南方將領們所推託的目標的顯明虛偽。這華南可笑失敗的最後結果，的確無限地增加了國民政府的權威，雖然華北日軍的要求，曾暫時降低過它的地位。

這次華南運動的結果，是中央政府竟在實際上不費一卒一彈地完全獲得了粵省的統治權。在陳濟棠遁走後，中央政府派宋子良和其他經濟專家去改革廣東省的經濟和金融制度。

『倫敦泰晤士報』的一篇社論，贊揚着蔣委員長主持下的中央政府的容忍政策的勝利。其中一部分是這樣的：

『一件自強至弱的事，是很難得會受到變質的，然而這一次不單有利於中國的領袖，並且還對全

中國極爲有利。這國家中所扮演的这一幕活劇，在他本身並不是什麼光榮的收穫，但因爲日本在旁誤傳着任何有力的行動，所以任何其他行動都將很有危險，而那結果除了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威外，還是一個政治形勢很是健全表示，……在各級的民衆間，拒絕戰爭，即是向全國團結的目標更前進了一步，中國是應被祝賀的。』

這緊隨着同樣遭到失敗而更其血腥的福建叛亂而來的華南運動之失敗，很給予幾個墮落的軍閥一個教訓，除非他們是有外國侵略者幫助着，在地們中沒有一個敢輕易向中央政府的權威挑戰。事實已經顯示過：南京當局完全被與侵略的鄰邦的復讐和困難關係所牽掣着的事，並不保證那些有着軍閥心理的將領們能安全地在將來進行着他們叛逆的行動。

假使廣西的反叛領袖們還想繼續頑抗，陳濟棠在粵省的傾覆就是他們未來命運的前車。在注意着那些華南叛逆的敗亡命運的人們心中，現在祇有着一個疑問，就是桂省問題的最後解決是用和平方式呢，抑或是內戰；假使是內戰，結果當然會決定廣西將領們的悲慘命運，但最後或許也能損及國民政府的權益，因爲它那時正被外來困難窘迫着。

在陳濟棠去職後，廣西軍事領袖們，將他們以前派出去的軍隊撤回他們自己的省中去。國民政府立即保證仍許他們繼任，而這樣，他們就有機會能不失自己尊嚴和地位而接受這新的特權。然而他

們過了二星期才對這建議作覆，而桂軍雖已自粵省撤退，他們仍保守着戰時狀態。蔣委員長以爲李白二氏對這些官職還不能滿足，或者他們還在希望着政府能表示更信任他們，而委之以更重要的職位，所以他擔保委任白氏爲浙江省主席，李氏爲國民政府軍政部的委員。同時，他們當然應除去以前所允准的不職。顯然地，爲了要困累政府，他們竟接受了國府起先答應的們繼任的廣西本職，並同時將他們軍隊的一部調入湘省。

蔣委員長在陳濟棠出走後不久，就到廣州去，並且在那裏滯留了三星期，一直在指示着與李白二氏的談判，並且就廣西領袖們派他們武裝的軍隊侵入鄰省時，他也毫不氣餒。我們值得提起，蔣委員長在離開廣州領導着勝利的北伐軍北進以後，他還是第一次回到廣州來。雖然廣西將領們在這次糾紛中是較弱的一方面，他們也證實了是不容易對付的。然而蔣委員長在進行談判時，是得到了兩津院院長居正的不少有力的贊助。居正同着參謀總部主任程潛和軍政部的朱壽德，一同到南寧去，想使李白就範。

蔣委員長因爲對廣西行政事務的優美，懷着一個良好的印象，所以並不願提出任何苛求的條件，但李白二氏猶如很知道蔣委員長寬恕的態度，似乎決定要爲他們自己私桂省簽訂一個最好的條件。同時，全國朝野都感到非常不安，因爲他們的談判正在秘密地進行，並且對廣西將領們的不能立刻聽從



而理解，也有着不少嚴厲的譴責。

但在九月八日，廣西問題的最後解決條件終於公開地發表了。李宗仁被任爲桂省省綏靖主任，白崇禧爲國民政府軍政常務委員會委員，而已被任廣西省要職的黃紹竑，仍復浙江省政府主席原職。此外，又訂定了下列幾個條件：

(一) 關於救國工作和國防計劃方面，廣西當局此後應絕對服從並受中央政府的指揮。

(二) 現有的桂軍應減少至六師，並應歸李宗仁指揮。

(三) 改編以前的十九路軍，應得到中央政府的准許。這路軍該應暫時駐紮在粵省南部的各指定地點。

(四) 中央政府將派專員去整頓桂省的政務及黨務。

(五) 廣西當局應厲行禁止鴉片及賭博。

以前的十九路軍的將領們對這個解決辦法似乎不十分滿足；十九路軍翁照垣部侵入了粵省的西南部，並且不久就在北海地方有着虐待一個日人的事件發生。這引起了極大的紛擾，但最後這些軍隊是被勸令撤退至原駐軍地。前十九路軍軍長蔣經鐸到了香港去，並且不久就辭職了。

李宗仁和白崇禧遵守着他們的條約，並在九月十六日正式宣誓就職；中央政府在宣誓儀式時的代

表是程潛和黃紹雄。

當蔣委員長還留在華南時，發生了一件被稱爲『華南歷史中第一佳話』的事情。蔣委員長應當時的廣州總領事赫爾勃脫·愛利特 (Herbert Hilder) 的邀請，在九月十八日從黃埔的司令部乘汽艇到廣州去赴宴，與他一同被邀列席的，還有香港總督安特魯·卡爾特考脫 (Andrew Carré) 爵士。蔣委員長與港督在席間流露出極大的友誼，並且增進了不少華南中英間的友好關係，港督的赴粵之行，是爲了應正在香港養病的蔣夫人宋美齡的醫治——這是她完美的政治家之才能的另一實例。

廣東糾紛的勝利的解決，使全國朝野的愛國者都感到異常興奮。這歡悅並不祇限於中國人。英國在上海的日報『字林西報』在對這事的一篇社論中這樣說：『蔣介石將軍由於現在廣州和南京間的團結，已增高了不少的權威，並且能有力地使人相信他應佔着最高領袖的地位，因爲他已有着一個很好的證明：他不用軍事上佔着優勢的權力，而用友好和約與互相諒解的美德來解決這次糾紛……使這次非常容易得到解決的明智的容忍和均等的尊嚴，已經很幸福地和必然地準備好了政府採用國制的一個顯著的進步。』

由於民國廿五年春末與夏天時華南危急的形勢，華北日軍更加緊壓迫着。走私的行動因國際間反

對的輿論而略做好了些，但日人的反應，却是建立一個冀察特別稅務處，來代替中國的海關，而這就可使日本浪人的走私變成『合法』了。綏遠邊境也十分緊張，因為在那裏有着東北日本的傀儡國所支持的匪軍和雜色軍隊；而同時日本的陰謀又在福建和其他南部各省內活動，例如日本煽動兩廣實行叛逆，並廉價售予軍火的事，就是其中之一。

這一切對中國領土的侵略和對中國主權的侵害，已經使中國民衆的情緒非常激昂。結果，在成都，北海，漢口，和上海等處接連着發生了幾件事變，而大約有六個日人因此而喪失了生命。行政院曾再三地命各省及地方當局保護外僑，並維持當地治安，但這命令終於因日本不斷地挑撥而不發生任何效用。九月三十日，由於蔣委員長的指示，南京又發出同樣的命令。

這些涉及日人的事變，使在中國的日本僑民向政府要求『斷然行動。』九月下旬，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與中國外交部部長張羣開始談判，他們在表面上是想解決那些日人因之喪命的事變。但據『泰晤士報』（倫敦）指出，這談判不久就已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那些日人的被殺『已被他們用作口實，而現在正在南京進行的談判，完全不合於解決各事件的初意。日本是在向中國提出新要求了。』

他們努力地想將談判內容完全保守秘密，並且川越張羣兩人的會商都是完全口頭的，因為日本還沒有忘記在著名二十一條時的反對呼聲。當其中的一方面覺得不利於保守秘密時，再要守秘密，當然是

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中國和日本的報紙，都滿載着日本「要求」的消息，而這些消息接着又傳播到海外去了，東京的長官們感到異常震怒，而他們的發言人天羽英二（Amegaki）想將這完全歸咎於路透社，但路透社儘管客氣地改變了當時的鬥爭形勢，指出他們那時所載的消息都完全依照日本報紙。

川越的發言人曾經發出要求，但日本外交部似乎以爲祇要將這些要求換上的一個「提議」或是「建議」或其他什麼名稱，他們就能隱蔽中國人和全世界。然而當一個日本的軍事發言人說川越的建議，是「日本的堅決要求」時，他們的假面具地除去。但對於川越和張羣在第一次及以後會晤時所提出的要求的確實性，照論從東京或南京方面，都還沒有證據確鑿的敘述。

一個在上海的外國訪員，拍給他的總社一張如下的電文，而這電文似乎是再不能更爲真實了：

『川越在他最近與張羣談判時，曾提出下列七個條件：（一）禁止一切抗日運動，如國民黨的活動，禁止組織抗日團體，並審查一切教科書以除去抗日思想等；（二）准許華北五省自治；（三）修正並大量減低日貨的海關進口稅率；（四）雇用多數的日本軍事顧問；（五）共同防共；（六）福岡和上海間，設立直接航空線；（七）在成都設立日本領事館。』

張羣同時却也向川越提出下列的反要求：取消民國廿一年的淞滬停戰協定，取消塘沽協

定，解散冀東偽組織。將「滿洲國」的軍隊從察省撤退，並禁止日人的走私活動。」

據緊接着的消息稱：當日日本大使用越聽見對方一一列舉着這些要求時，他非常駭異地跳了起來。並且恫嚇着說，他將停止談判。在會晤時，中國提出這些條件的第三次會談終止時的空氣非常緊張。據說張羣的態度，完全是得到了蔣委員長的授意。據稱這談判的中途變化，使這日本大使想中止和張羣會談，而想和蔣委員長開始討論。

當時，蔣委員長正在忙碌着華南的事務，但日本報紙因得到了官方的暗示，現在開始大聲地要求蔣委員長回到南京去親自進行談判。最後，蔣委員長在九月二十八日離開了廣州，飛到南昌，並在那兒暫時休息後，就繼續隨身到牯嶺去。由於蔣委員長已抵南京的不確報告，上海的日本報紙卻欣喜地發表着蔣委員長已如日人所命地抵達了京都的消息。不久以後，他們才探悉蔣委員長原只是暫時的住所暫時休養，並在那兒與政府要人等舉行會議。

日人對中國外交部意外的強硬，當然感到很訝異。各方面都坦白地承認，這次談判不會有什麼發展，使情形更爲劣惡的事，是當時的形勢已引起了外國報紙反對的評論。這時，日本外相廣田在九月二十八日向外國新聞訪員們發出報告書，其中他這樣說：『這一切不幸的事件，都是那些已實行多年的抗日教育，抗日運動，和其他抗日政策的必然結果，而對於這一點，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不能推諉負』

任。」

廣田報告書的結論是這樣的：『現在的談判的結果，祇能是下列二種中的一種：中日關係或將成爲極良好，或將成爲極惡劣。在現在的形勢下，不應再談他們像以前那樣地懷着含糊的態度。中國現在是在最重要的十字街頭。應該決定究竟是否將與日本握手。我非常熱誠地希望着，中國將不顧任何會得克服的困難而和我們友愛地握手。』

中國人都將廣田的報告書意味作中國一定須向日本屈服，否則就得發動戰爭，但他們覺得廣田或許是在想『恫嚇』他們，所以便採取一個靜觀的態度。再者，大家不久就知道日本當局已派亞細亞事務局主任 (Kinsō Kuratama) 到南京去向日本駐華大使川越作新的指示。日本所要求的已是這樣的多，以致一般中國人並不預想這些新指示會更爲激烈；相反地，他們都預料着南京政府意外的強硬或許會軟化果東京面的態度。亞細亞事務局主任採取日人在說到中日關係時所慣用的強硬態度，並在離開日本時，宣示說：『日本所要的不是平淡的諾言，而是實際的行動。』

他在十月五日抵達上海，次日，他到了南京去，而在十月七日，他就回到日本去。政治舞台上現在的一幕，是日本大使川越會晤在十月五日從牯嶺回到南京的蔣委員長。許多方面都以會現在兩國間的『互惠』的時候已快來了。

十月八日，蔣委員長在他的官邸接見日本大使川越。在這次重要的會晤時，祇有外交部亞洲事務部主任高宗武，以及日本大使秘書長清水(Shimizu)在旁。在一度寒喧後，川越就開始敘述他對於未來的中日關係，和他們對遠東大勢的態度的意見。他說：由於中日兩國間的友好關係，他們應根據着互助和عاون的原則，立刻採取步驟，來為東亞的和平和二國的福利而工作。他又說：很不幸，去年的各事件竟在兩國間引起了爭執和誤會。他說，這二國現在埋應盡力地除去友誼之道路上的障礙，並增進互相有益的合作。回答時，蔣委員長發表對於調整中日關係的意見。他概括地說：從東亞形勢的觀點上看來，當時對兩國間關係的根本調整，是極為重要的。蔣委員長又對日本大使說，中國所最希望着的，是領土完整之不受侵害，和對它主權獨立與政權完整的尊重。因此，蔣委員長繼續着說，一切中日間未決問題的討論，都應根據着絕對平等，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和完整的領土與政權的原則；而他深信這種在和平與友好的空氣中進行着的外交談判，一定會對二國關係的調整發生一個美滿的結果。

關於那些最近發生的不幸事件，尤其是已經調查完畢的成都和北海事件，蔣委員長暗示着說，他們應按照國際的常例來處置。他又明確地告訴日本大使川越說，請他與中國外交部長繼續討論外交事務。他說，外交部的意見完全代表着中國政府。

在這次會晤後，川越對新聞界說：他很爲蔣委員長和設法解決危機，和設法完全調整中日關係的熱忱所感動。「我所得到的印象，」他又說，「是我們能信任蔣委員長想努力解決中日問題的真誠。」

蔣委員長和川越的會談使中國外交部長張羣和日大使川越間的會商繼續下去。這些會談進行得異常秘密，甚至連在旁的譯員都沒有。然而據稱在十月二十一日磋商時，川越會非常努力地想強迫中國接受共同防共計劃的要求。這計劃包括着二部份。第一部份規定在山海關和雁門關間的區域內——察綏晉四省——設立軍事同盟。這一部份又要求着組織一個防共委員會，來指揮中日軍隊向共產黨的戰事。

第二部份是關於中日兩國對中國其餘各部的共產黨的政治合作，而這顯示着一個未來的更廣大的合作，要求是：（一）軍事牒報之互換，（二）共產俘虜之互換，（三）宣傳反共思想，及（四）阻止及約束任何共產活動。在這裏所指出的這些中日合作的細則，應在日本總領事和中國各地的縣長間努力求得，並使大眾所共曉。日人的見解是想使歐美人士知道，在中國已有合作防共的組織。而他們不應再注意這個問題。

中國覺得日本在會晤時所宣示的防共計劃，會將中國拉入日本的一面作戰，假使日蘇間發生衝突



的話，這計劃完全是一個變相的反蘇軍事及政治同盟，而這結果一定會使中國遲早被日軍佔據。這計劃又將壓制一切中國政治及社會生活之自由狀態和一切對自由力量表同情的趨勢。

張部長拒諷考慮這些要求，但川越却堅欲中國接受。川越另外又表示不願對中國在第三次會晤時所提出的建議——取消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和冀東偽組織；從華北撤退所謂『滿洲國』軍隊，並禁止一切日人走私活動——有所考慮，雖然在實際上，這些都是解決中日未解決問題的要素。雙方的意見相差太遠，於是第五次會晤仍不能得到什麼結果。日本大使的海軍參贊海軍上將齋藤，在這次會晤後立刻到了南京去，並且表示他的意見說，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是阻止一切抗日活動，而共產黨問題並不怎樣急迫。同時，日本陸軍參贊植田將軍，預言在談判陷僵局後，日本將繼之以激烈行動。這似乎指出都在中國的日本海軍代表的態度，已突然變成稍為軟化，而日本的陸軍代表，仍是蠻橫非凡。

在十月二十一日的會晤後，日本駐華大使決定派他的顧問須磨彌吉郎 (Yakichiro Suma) 到東京去將他們的會談作一個詳細的報告，並想得到些新的指示。這二人又在十月二十六日舉行第六次會議。須磨在返華前，於十月二十八日在神戶接見記者時說：「我所得的指示的根本要則，是日本的要  
求仍保持不變。現在沒有別的意思，祇能繼續追求先前的目的。」「我希望」他又說，「中國人會立

刻將談判圓滿解決，來答覆日本勢所必然的強硬態度。」

東京消息稱：在日本外交部和軍部長時間的會商後，大家同意應努力使中國官方更充分地認識日本爲了解決中日爭端而提出的建議之「正直和公平的性質。」據續傳消息稱：須磨在東京時曾因爲日本報紙以前曾刊載過日本向中國所提出的要求的緣故，而在會商時請求將日本報紙禁止發言。

十月三十日，外交部向日本使館提出三條強硬抗議：第一，關於日軍在華北的大演習；第二，關於日軍在太原城中非法佔據一所華人住屋；第三，日本報紙對楊永泰遇刺的惡意的臆測。

張群和川越間第七次會談是在十一月十日舉行了。這兩個代表又互相交接解決那些複雜問題的意見。雙方所發的正式報告，都指出這些談判還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而中國的宣言書着重於中國的外交部長仍堅決地保持着他以前的主張。據稱在會議時，川越曾要求這些未決的糾紛作一個迅速的友好的解決，並願中國政府深深考慮當時實際的形勢，以圖達到此目的。他說，日本仍在力求着一個根本的解決，但却讓步地說：假使全部的解決在常時是眞不可能，那麼他們也能接受部分的解決。

他特別注重於防共的軍事合作。他提議說，第二部份中的那種合作或可暫時擱起，但他却堅欲中國接受他第一部份中所陳述的那些計劃。日軍的防共軍事合作的計劃，顯然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因爲這會使中國的腹地極易受日軍的進襲。據流行的傳言說：當那日本大使第一次建議中日聯合戰線時，

張羣曾回答他說，中國很願在東北，熱河，殷逆汝耕之冀東及察北等地，接受這樣一個計劃，但在其餘各處，却絕對不能答應。這曲折的妙問，竟使那日本大使不能作答。

日本想在華北得到特殊地位的要求也被他拒絕了，因為蔣委員長曾向全國答應，他願恢復冀察二省的中央政權。他最近和山東，山西，和綏遠等省領袖們的會議，指出這些省份正在意志堅定地擁護着那願給予他們以軍事，經濟及政治援助的中央政府。

川越改變了他的策略，表示他願意先討論較小的問題，以求逐步的解決，但張群又拒絕這個辦法，而他說他所以拒絕的緣故，是因為日本大使曾在東京的指示下拒絕過中國的要求。一直到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中旬，這些中日談判還沒有什麼發展，而此後，他們又陷入了以前一樣的常見的僵持狀態。

截至那時為止的談判的結果，無疑地中國的理由遠較日本為充足，雖然中國在這次爭端中是較衰弱的一面，但他們已無限地增強了他們的軍事實力，和增進了與列強間的友好關係，以致他們現在能拒絕日本的要求，並且甚至還有勇氣來由自己提出要求 and 抗議。

『紐約時報』的社論，對十月初的遠東形勢這樣評論着：『再三地對中國主權的殘酷的侵害，正在不斷地增加着激烈反對的輿論。在這種環境下，而祇有這麼少（寧願不要稱為這麼多）的襲擊，是

很可詫異的。『紐約時報』的結論這樣說：『日本政府現在竟在鄭重地請求世界各國將他們的侵略認作是合乎正義的，但人類的輕信心，恐怕決沒有像他們所想像的那麼厲害吧！』

在差不多的時候，一篇『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論也同樣大膽地直言着說，日本在長城以南的行動，就是從日本利益的觀點上看來，也不是一件可喜的事。並說：『日本自己對全世界的信譽雖然受到了嚴重的損失，它到那時所獲得的却是極少極少，』雖然日本還沒有進行得怎樣遙遠，『泰晤士報』評論着，『他却已將近中國鐵錘的盡頭了。假使它仍固執或過分橫暴，中國，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中國的領袖們，一定將起來反抗這不斷的侵略。』『泰晤士報』的結論這樣評論着日本的現行政策：『西方將請日本用自力來改變那政策——使它行動的精神與他抗辯的意義相符合，以給中國一個復興的機會。祇有這個國家才不注意或關心日本獨有的需要困難；但日本在它過分自誇的對亞洲的博愛主義成爲比一個粗忽的變相好一些以前，祇能期望着些少的同情，而且除了同情外，不能再得到比較實際的東西。』

這種有着不少同樣例子的外報評論，顯示出在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將軍領導下的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已顯然地獲得成功了。中國國民政府在日本長時期的侵略中所取的态度非常適當，所以獲得了各國普遍的同情，而中國態度最近的轉硬，也同樣地獲得了海外的讚揚。

## 第二十七章

- 一：蔣委員長國慶日致詞……………二：中國不再是一個不統一的國家……………三：共產主義的禍患……………四：目前不是一個真的威勢……………五：中國在建設方面的進步……………六：學民員担的減輕……………七：陸空交通的改良……………八：蔣委員長和北方領袖的會議……………九：蔣委員長五十年辰……………一〇：全國空前的慶祝……………一一：獻機祝壽……………一二：五十年辰感言……………一三：對於蔣母的衷忱的讚揚

中國的十月十日的國慶紀念日，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重十節，是爲了在民國廿五年中口開的微妙的關係的緣故，而得到它的特別的意義的。這個日子造成民衆的感情，有一個異常爆發的機會。蔣委員長回到南京去的主要的目的，實際上是在以他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以及行政院院長的資格來參與雙十節的典禮的。

蔣委員長選擇中國的統一與建設做題目，發表他的國慶日致詞。那篇文章的內容是這樣的：

『自蒸氣無線電空中航行發達以後，國際間之關係，即起一鉅大之變化；任何一國發生任何一事，瞬息乃即傳遍於全球。中國處此時代，已非往昔閉關自守無聞於世可比，然關於中國之傳聞愈多，則所招致之誤解亦愈甚。

自中國改建共和以來，舉國上下一致之努力，對內厥惟求國家之統一，對外求國際間之自由平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此新舊制度交替之過渡時代，包含政治社會家庭等問題，甚且影響及於外僑之利益，國內情形既若是其複雜，而欲局外人持平觀察，予以坦率之判斷，自甚困難。

故對於今日之中國，尙有認爲無組織之國家者，此等誤解，致使中國不能博取世間充分之同情。中國近年來日夕努力之建設工作，遂陷於事倍功半之境地。

茲值民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願向國內外各界讀者發表若干觀感，在此普天同慶舉世歡騰之日，余意除以『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爲主題外，再無其他適當之題目，足以符合消除國際間誤會之期望。

第一點友邦人士所應注意者，今日之中國已非往日分崩離析可比。

在一九一二年建立共和以前之五十年，中央威信日益低落，地方跋扈日益加甚，由此種種

勢而構成軍閥割據，引起循環不息之內亂，人民蒙其殃害，不可勝言。

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建都南京，而糾紛之起，無時或已，軍閥之割據固未盡除，而內戰之外，又有共匪之滋擾，人民痛苦，水深火熱，通都大邑，化爲灰燼，農民離村，田野荒蕪，除劫奪燒殺以外，幾無工作可言。此種恐怖狀態，足使一國統治者束手無策。但中國政府，深知欲謀國家之建設，必先求國內之統一。故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來，即無日不努力於統一之完成及秩序之恢復；數年來，政府以堅毅不拔犧牲邁往之決心，按步就班，實現劃共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之計劃。故一九三三年共匪巢穴之江西收復以後，兩湖川黔各地之赤黨，亦相繼肅清，其散在邊陲地帶之少數餘孽，亦不難一鼓蕩平。故共匪與軍閥之勢力，已不足爲中國之患。且也聞變致平，兩廣就範，中國統一之局，已達於垂成之域矣。

第二點應注意者，中國於萬分危難之中，已實行復興與建設之計劃，戡平匪亂困難，而整理匪共擾亂後各縣治安經濟尤難！應付此種困難，自更需要勇往創制之精神，人民苦於禍亂，久失秩序與團結。爰援引中國昔日之保安制度，而運用新方法，以促進村里人民互助互衛及互相監督之責，使不肖份子無隙可乘。

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爲農民，欲求建設，非先復興農村不可。一九三四年政府遂下令

不再增加田賦附捐。以後並迭令取消苛雜，截至今日，已取消者有五千餘種，每年減輕人民負擔五千萬之鉅！

近年來國民政府支出鉅款，用於水利及造堤工作，在去年一年之短時期中，即支出三千五百萬元。自今以後，繼續不斷，則旱潦之災，亦可避免。

合作事業，今日亦甚發達，總數為二六·二三四，其中一二·五一七為去年所組成；實業部最近又增設合作公司，推行全國之合作事業。此外又成立農本局，資本六千萬，官民各半，其目的在傾政界社會之全力，推行農民貸款，及農產物之運銷。

關於交通方面之進步，最好以數字說明：鐵道由一九二五年之八·〇〇〇公里，增至一三·〇〇〇公里；公路已完成者凡九六·五四五公里，在建設中者，有一六·〇〇〇公里。

往日自南京至廣州或南甯，舟楫車馬，費時數月，今藉汽車，數日可達。

空中航行，十年前不聞於中國，而今日由上海可達漢口，成都，北平，廣州諸大城市，而遠及於新疆邊省。由乘客數量言，即以中國航空公司一家為例，一九二九年祇有三五四人，去年一年已一〇·三〇四人。

中國之建設，並不止於經濟，而對於行政效率之促進，公共衛生之推廣，義務教育之實



施，及財政之改良，均經努力，而獲得顯著之成功。

以上所指示者，僅爲大端。此雖云大端，余敢言此八年之短時期中，有此成績，在中國歷史上可說從來未有之現象。

茲值紀念建國萬象鼓舞之日，余本不宜向友邦誇示國民政府已往之成績，正當集中且充於今後未完成之工作。然余所以略示過去情形者，乃期表明中國確有自力更生之能力；既已劃除軍閥共匪，又不斷爲人民幸福而建設。所不足者，爲不受干涉，不遭阻礙之自衛的發展機會。此機會吾人所夕以求，志在必得，能予中國以此機會，不特間接幫助中國，實亦爲世界和平之始基。蓋中國四萬萬愛好和平之人民，及無窮蘊藏之富源，中國而一旦富強，則必爲全世界最大之安定勢力無疑也。」

民國廿五年的中國國慶紀念日的最重要的特點，是在南京舉行的盛大的全國童子軍檢閱。在十月十日的早晨，一萬男女童子軍排着隊朝中央運動場上的蔣委員長的身邊走過。

在一篇對從中國各省來赴會的童子軍的訓詞裏，蔣委員長加強語氣地說：今天中國的統一是由於它的國萬萬人民流出無數的汗血的結果，所以它需要每個國民的擁護。

蔣委員長繼續地說，爲什麼中國會被其他的國家輕視，爲什麼三民主義不會普遍地實現。以及爲

什麼人民的苦況會日益加深，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內部不能統一。他更加重地說，爲了中國的得救，爲了中國的更生，以及爲了中國可以享受完全的自由平等，全國首先必須統一。他於是迫切地說，現在政治的統一已經成功了，全國的人民應當盡力擁護政府，服從命令，以及彼此團結。

當蔣委員長告誡那些年青的聽者須立志鞏固國家的時候，他說，爲了加強統一的基礎以及實現中國的更生，他們必須要恢復中國的古代的道德，禮義廉恥，忠孝節義。蔣委員長確定地說，如果國民將這些道德的本質恢復以後，中國就能在國際上享受自由平等。他還說，中國將來必會進而被認爲一等的強國。

他勉勵他們遵從民國廿四年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爲黨員規定的十二條行動的規則。最先的兩條就是要盡忠以及盡孝。照那次大會的意思說，忠孝是愛國以及國內協和的支柱。如果每一個中國人能够實行這十二條戒律，蔣委員長相信中國能够恢復失去的權利，並且國家能够再生。他鼓勵出席的男女童子軍把這十二條常規帶回去開導他們的父母，親戚，師長以及朋友們。

在結論裏，全國童子軍聯合會的主席，蔣委員長爲了引起他們對健康的注意，他說，在我們爲國家服務以前，我們一定先要有一個強健的身體。

在參加了南京的雙十節的典禮以後，蔣委員長以及蔣夫人乘飛機到上海，在那裏停留了幾個鐘

頭，他們就飛到了杭州。蔣委員長這次旅行的目的。是在參與十月十三日中央航空學校開學典禮，在開學的那天，他對學生們訓話了。

但是，同時，他利用這次旅行去和山東省的主席韓復榘，山西綏靖主任徐永昌，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翼察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兼宋哲元代表戈定遠，以及其他軍政領袖，開過重要的會議。北方的軍事領袖到杭州去認爲是他們服從中央政府的一個明證。當韓復榘接見『大公報』的杭州通信記者的時候，他宣稱說，關於山東的內政以及外交方針，都遵照行政院長蔣委員長的訓令，因爲不論那一省都是中國的一省。自從那消息發表後，各方更認爲全國統一又多一個證明。

十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回到南京，到二十一日，他又乘飛機到西安，去和西北剿匪代理總司令張學良，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舉行會議。以後，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以及甘肅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到西安來謁見蔣委員長。爲了察綏邊境的緊張的局勢，他們的謁見是含有極重大的意義的，因爲他們在中日的關係方面站在很嚴重的地位上，日本報紙『上海每日新聞』宣佈說，蔣委員長到西安去的目的是在把他的勢力加強到張學良的軍隊裏邊去。並且該報還說，不管蔣委員長到杭州或是西安，他的唯一的目的，只是在統一中國而加強中國的國防以反抗日本。蔣委員長統一中國的進展之神速，是出乎一切意料之外。我們只要看他在四個月內，不費一卒一彈把兩廣征服，他的

進展的速度，差不多達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

民國廿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雙十節的後十天，蔣委員長的五十歲（照西歷推算只有四十九歲）的生辰的慶祝，是中國一個空前的表示。在早幾個月以前，南京的官場方面就應該慶祝蔣祝壽，但是在民衆方面，很快地就把這個獻機祝壽的運動採取了自發爲國獻機的形式，而在到處發動了。在民衆的心目中，蔣委員長已變成了一個新設的國家的象徵。

在獻機祝壽的名義下，所捐的款項購獻給國民政府的數目，超出了開始發起者的預料之外。單單南京一市，就捐獻飛機十七架，十月卅一日在首都參加獻機典禮的，不下五十五架。據估計，全國獻給祝壽的飛機的數目，當在百架以上。

當獻機的典禮在南京舉行的時候，廣大的羣衆約二十萬人左右，幾及南京人口的五分之一，聚集於明故宮飛機場，參加典禮。當國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向羣衆發表廣播演說而接受獻機的時候，有三十架獻祝的飛機翱翔於天空中，列成兩隊：一隊計十六架，一隊計十九架，各在空中排成中國文字「中正」兩字。中正兩個字，爲蔣委員長的官名。後來，另外有一隊，計五十五架出現於天空，掠林主席站着演說的中央講台上面而過，表示敬禮。

同時，蔣委員長離開西安到河南的洛陽，和由上海去的蔣夫人宋美齡晤面。因為蔣委員長對獻機祝壽表示謙讓，以致不曾親自去到正在學堂熱烈地慶祝他的誕辰的南京，當二十九日蔣委員長乘專車抵達洛陽，剛走出月台時，忽然大雨滂沱起來，達三十分鐘之久。幾個月以來，洛陽得到雨水，還是第一次。因此，農民歡呼若狂，對蔣委員長益加稱道，視為他們的救星。

十月三十日的晚上，洛陽的中央軍事學校分校的學生和教官，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提燈遊行會，以慶祝蔣委員長；當晚洛陽分校校長祝紹舟設宴，為蔣委員長洗塵。十月三十一日早晨，將近二萬多民衆齊集於洛陽分校，向蔣委員長致敬。閻錫山和商震也特爲此事趕到，同其他的要人出席這個慶祝會了，當蔣委員長偕同蔣夫人在二十一響的禮炮聲中蒞臨時，民衆鼓掌歡呼，響徹雲霄。羣衆一齊向蔣委員長行三鞠躬禮，以表示慶祝，而蔣委員長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說。當這個慶祝會閉幕時，由蔣夫人將從上海帶來的兩個巨大的誕辰蛋糕切開，分給當地三十幾個團體的每個代表。

從十月十五日到三十日這半個月中，僅僅南京的電報局就收到了全中國各地和海外的政府，黨部，軍政機關以及民衆團體發來的賀電，達五千份以上，這足以表示全國的感動以及海外的影響之如何的熱烈。全國各報都出特刊以紀念蔣委員長的誕辰。這一次慶祝是現代中國民氣的一種空前的顯露，比起十月十日的中國國慶大典來，恐有過之而無不及；凡是曾經參與過這次典禮的，沒有不深信

中國確已獲得了永久的統一。

十月三十日，蔣委員長發表了一篇宣言。在這一篇宣言中，他向國內外獻機於中央政府祝他的誕辰的同胞，表示感謝。他對全國以及海外的中國人民非常熱烈地捐款以增強中國的空軍力量，表示欣懣，蔣委員長說，他以一個國民的資格，萬難同意以這樣的規模來慶祝他的誕辰，但是他以中央政府的委員地位，他願意領受中國人民的愛國的熱情，並且代表國家以接受獻機。蔣委員長在他的宣言的結論上說，他要求所有的空軍人員，必須實現全國同胞對他們的最大的希望，以全國的獻機去實行救國事業。他懇切地告誡他們，必須爲國家而努力，利用獻機，以保護中國的獨立和自由。

蔣委員長還做了一篇題名爲『五十生辰感言』的很長的文章，以作這篇宣言的補充。這篇文章是這樣的：

『中正半生憂患，革命報國之志未遂百一，而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慨自弱冠以前，革人從戎，卽受國家教養，迄今三十餘年，凡吾所食所衣，與夫一切生活所需，無一不仰給於國，亦卽無一非民衆之脂膏與汗血。中正蒙恩被澤，可謂深且厚矣！

今茲又承吾海內外同胞男女老幼，節衣縮食，嘽機見祝，精誠相感，勗勉備至，吾同胞策勵之力，與期望之殷，蓋如此其甚，益使中正慚惶慚慚，不知將何以圖報也！

史余往日明師之教益，同志之扶持，與夫袍澤之難相同，犧牲相繼，往事歷歷如在前；至今我馬餘生，靦然視息，俯仰天地，誠又不知何以爲！

其間印象最深刻而不能一日忘者，則不肖孤露之身，自鞠育教，以至今年，胥唯母氏勞之賜爲獨多；迄今吾母之墓木已拱，而茲關所望於孤，以報國淑世不辱其先考，乃蹉跎而無所成！

黨多艱，民生日瘁，復興之業，前路方遙，維歲月之不居，愧天職之未盡，撫茲時序，爲孝皇陳真！

等雖吾母夙昔淳家敦子之念，藉閱孤苦成立之艱，且願以刻苦自強之義，與吾同胞同志相共勉於報國之業焉！

中正生長鄉僻，家僅溫飽。吾祖父數世爲讀，勤儉節儉，薄有資蓄。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竟了無依。

其時清政不，東晉勢豪，資緣爲虛。

吾家門祚既單，垂垂垂餽之時，欺凌脅逼，靡日而寧。嘗以田賦徵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賤不保，甚至擄陷公庭，迫辱備至，鄉里既無正議，戚族亦多旁觀。

吾母子含憤茹痛，荼藥之苦，不足以喻。當此之時，獨賴吾母本其仁慈，堅其苦節，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外而周旋豪強，保護稚弱，內而親和族里，整飭戶庭，罔不躬親負荷，謹慎將事。

其於中正撫愛之深，常如嬰孩，而督教之嚴，甚於師保。出入必檢其所攜，游息必詢其往，罷讀歸來，心考其所學，而又課以灑掃應對之儀，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親傭保之工作，以勵其身心。夜寐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

中正幼性頑鈍，弗受繩尺，又出身孤弱，動遭擠擯。及年稍長，立志出國，學習軍旅，里講異軌相泥阻，其力排羣議，拮据籌維，以成其學者吾母也。既聞革命大義，許身黨國，歷艱危，戚族相戒，莫敢通問。其篤信不疑，多方委曲，以壯其行，辛苦持家，以堅其志者，母也。

民國紀元，中正始有以致菽水之養，而稍慰倚閭之望，然吾年於茲已荏苒二十有五矣。

以軍閥竊國，主義未行，革命事業屢遭挫折，其剴切申戒，勗以勿緩勿輟，貫徹始終者，又尚非吾母聖善之教也。溯自中正九歲以至二十五歲，吾母殆無日不因心衡慮於家難之速避。及中正二十六歲以後，又常以亡命生活勞吾母之顧念，吾母唯一秉自信之堅，以造吾家為唯一



之責任。

嘗語中正，謂：『吾以兢兢弱髮，歷人世難堪之境，當其孤舌，曾不知何以自全，所確信而不疑者，則惟孤子之必須教養，方可有成，與吾家之必當有後，宜使之努力自助，以毋墜家聲而已。』又嘗謂：『艱危困難，世所恆有，而自立自強，必當盡其在我。故家世愈艱而禮法不可不飭，詐門愈薄而志氣不可不堅。孤寡弱小之賴以自存，舍奮勉自立，刻苦自強，更無他道。』及中正矢志革命，吾母又常勉以大孝報國之義，謂：『追念吾家往昔岌岌不保之苦狀，卽當推而廣之，俾人世無復有強凌衆暴之慘史。故口體之養，世俗之譽，非所以盡孝，男兒惟以身許國，乃爲無忝於所生。』凡茲懿言，皆吾迄今猶無以慰吾母九泉之望，每憶昔日寡母孤兒，形影相依之情景，彌覺固極深恩之圖報無日也。

中正既蒙國恩，彌懷母教，輒自檢討，其五十以前之人生，究爲如何之身世，則不能不認前二十五歲乃爲茹苦含辛，遭逢家難，零丁孤苦，因知勉行之身世，後二十五歲乃爲承負國難，顛沛困厄，動心忍性之身世。艱難歲月，逝者如斯，更不知以後是否再有二十五歲之身世，而此後之二十五歲，究不知其身世果爲如何也。由剝而復，事在人爲，察往知來，理有可信，是以中正於此不能不爲吾同胞同志進而闡論國家民族所以自立之道。

先哲有言：『國肇於家，』故家庭興廢之理可通於國；國之盛衰靡常，正猶家之興廢無定，其或不勝挫折，而終於敗亡，或崛起興起，以致富強，則悉視其國民之覺悟及努力與否以爲斷。中外古今，事無二致。而近百年間新興諸邦，艱苦復興之史蹟，尤足爲吾人今日之楷模。天下無不勞而倖得之收穫，亦無徒勞而不獲之耕耘。唯貴以一致之精誠，出以持續之努力，則任何艱危，無不可以突破之理。

以中正所躬自體驗者，吾家當中正幼時，孤弱艱危，可云至矣，然而豪強之侵逼，能陷吾母子於困厄，而不能挫吾母保家教子之志節，亦不能阻吾家自求多福之途徑，則知天下事。安危禍福，固非自致，而轉弱爲強，必資自力，明矣。吾國自十四年國父孫先生崩殂以後，內外交迫，禍亂相乘，始則赤燄蔽天，黨國屢危，繼則外侮頻仍，東北淪陷。其間變遷交作，請認叢生民命國脈，朝不保夕者，蓋十有餘年矣。其情勢之危急慘厲，實較中正九歲喪父時童昏無知，孤寡失倚者爲尤甚。然中正猶以爲一時之艱危不足憂，公理之消沈不足懼，國力之薄弱亦不足慮，而存亡興廢所繫，惟問吾國民有無勵精知恥，刻苦自強之決心。苟吾同胞皆能以孤寡再造衰家之志，戮力報國，則國家之轉危爲安，必可計日以待，而吾全國諸姊妹咸能致力持家教子，知禮明義，則於國家民族富強康樂之關係爲尤大也。

以中正個人之身世而論，自孤幼以至今日，其獲益於賢母之家教，與良妻之內助者，殊非淺鮮。苟吾全國二萬萬女同胞，皆能如吾寡母之保家教子，使爲人子者皆能保衛其國，豈有不義致事更於復興之理。蓋無論國家與個人，所以競立於斯世，其道不外乎自立自助與自強。唯自立乃有以自存，惟自助始可得人助。而國者當衰微危弱之際，爲國民者，當察所處環境之險惡，明自身地位之孤寡，勿憤於強暴以較其氣，勿沮於急効而亂其心，是則刻苦自強之義，更爲復興建國之要圖，所當從開始終，一以精誠貫徹之者也。唯吾先民之教，以孝爲先。總理嘗語：吾人以中國立國自有其道，不可徒效外國之皮毛，更不可抄襲帝國主義者之霸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爲吾中國立國固有之精神與道德，而孝道尤爲總理遺教所特重。可知中國立國之道，自來皆以孝爲本，唯孝莫大於尊親，其次曰不辱。所謂尊親，謂當發揚光大吾祖先黃帝之遺緒；所謂不辱，謂當勿貽吾父母以隕穫之差。

以我民族歷史文化之久遠，我不自亡，人孰得而亡我？誠使我同胞人人有『恥不若人』之覺悟，而所夕惕勵於雪恥圖強之一念，鏗而不舍，金石可鏤，則不辱之義，庶乎得之！中正俯仰國家，深自贖責夫盡，既無以副國民殷殷之望，亦有負我寡母闔斯孳子之勤，復何敢自信其能勝吾寡母平生保家教子者之重任，勉盡中正今日報國之天職於萬一。然而撫時感事，推小及

★，所祈望於吾全國同胞，以孤藥自居，以精誠自勵，共同一致，奮勉自強，以保我民族歷史於千秋萬世者，其意彌摯，而所望彌切。唯報國家之願一日不違，卽鮮民之痛一日不得紓。是用不辭縷縷，實述此一日間之所感，用彰已往蹉跎之過，而期補贖於來茲。吾海內全體同胞，倘不以吾言爲謬，曉然於家國興亡之道，以聞勉提挈，共同致力於報國根本之途，此則中正之所大願，亦卽所以翊報國家民族與我全體同胞於萬一者也。

## 第二十八章

- 一：中日的交涉……………
- 二：中國的崛起的態度……………
- 三：拒絕日本的遺忘錄……………
- 四：川越承嗣主張的改變……………
- 五：對中國新變態的必要……………
- 六：侵犯綏遠……………
- 七：關東軍援助緬甸軍隊……………
- 八：蔣委員長在太原……………
- 九：中國軍隊克復百靈廟……………
- 一〇：日本飛機的活動……………
- 一一：德色軍隊的反正……………
- 一二：日本遭受大轟擊……………
- 一三：德日反共協定……………
- 一四：中國的反應

民國廿五年的最後兩個月，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值得永遠紀念的。有一件事情是全世界看出中國日本有一個更堅決的態度。從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大使提出妨害中國的主權的條件，嚴加拒絕考慮點看來，就知道蔣委員長是極有決心的，是很冷靜的。日本負責的官方人物不斷地發出了各種嚴峻恫嚇，但是並沒有打動他。

在上海的旗幟出雲號的司令島田中將公開地說：『不用再開會了，並且不用再多說了，現在只有

行動。」海軍少將近衛說，「此後，日本決不寬待那些把日本的國民以及官員看作中國的仇敵的中國人的。」副司令岡田宣稱說，「我們的犧牲不會沒有代價的。此後，先有行動再來說話。」另外一個日本人的海軍發言人說，現在的危機是比民國二十年佔領滿洲以前的時候更為嚴重。上海日本大使館海軍武官齋藤少將，對『紐約時報』的通信記者說，形勢是很迅速地日趨惡化了，有由八隻兵艦做成的二個驅逐艦就要開到上海來。他還說，第二批現在不知道有多少數目的援軍已得到日本天皇的許可，用運輸艦開到中國的海上來。他接着又說：「我們現在知道和南京的官員繼續辦目前的交涉是無用的，因為他們沒有權力作一個滿意的解決。」

蔣委員長在這些恫嚇之前，還是很泰然的。當交涉進行的時候，他常和外交部的代表商議，並且不斷地訓諭他們，日本的條件有幾個是萬難接受的。同時，到處表示在蔣委員長領導的中國是整備變「那」期破裂的地步的，並且大家都覺得中國政府不能再表示讓步的時候已經到了。

這個事實使日本人醒悟：日本人武斷地以為他們提出恐嚇的要求，中國人會專心地接受的日子是迫切地過去了。在中日交涉第七次會議畢會的時候，在中國的日本人說出了一種顧全面子的托詞，他們說交涉稍有進步。可是，在日本國內，都已承認這次的交涉完全失敗，並且日本的報紙以及刊物上普遍地指摘首相廣田以及外相有田。東京權威的報紙『日日新聞』宣佈說：老實說，在一開始交涉的

時候，日本當局對於判斷方面，就犯了顯然的錯誤：日本當局責備國民政府的遷延。這個遷延的原因，並不是中國的過失，而是日本當局的過失，他們不够機敏，而且不够明白去怎樣對付那些抗日的中國人。

十一月十七日，有田對日本的內閣承認中日的衝突是很尖銳的了，但是他相信進一步的談判還是可能的。雖然他盡力去挽回這個局面，但是日本外務省不出一個星期，就開會議來討論這個以調整中日變方的關係爲目的的交涉之已達決裂的事情。兩個日本海軍軍官，前上海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近藤和第三艦隊參謀長岩村慘愁地對他們的國人報告說：中國人在瘋狂地沿江準備戰爭。

十二月四日，川越大使和外交部長張群開了第八次的會議。當川越把備忘錄呈遞給張群的時候，爭端便立即發生了。張群拒絕接受它，由於它的內容和事實不合。當這個備忘錄退回去的時候，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大爲氣憤，斥責張群說，這是『空前的侮辱。』十二月五日，他們再把備忘錄送給張群，但是它仍被退回到日本的大使館去。

雖然川越的頭腦也許比他的行動更爲模糊，然而他的目的是顯然的。備忘錄上竟宣佈下面所說的幾點已經雙方獲得同意：

(一) 共同建設中日的航空事業。

(二) 南京聘請日本顧問。

(三) 裁減中國的關稅稅率。

(四) 中國政府取締朝鮮革命黨人的破壞行動。

當大家都知道中國外交部部長拒絕承認這個備忘錄是一個正確的會議記錄的時候，日本的外務省，海軍省及陸軍省的代表就在東京開了一個會議；在這一次的會議中，他們決定日本應當要求中國把這個非凡的備忘錄確定加以接受。無疑地，川越再三要張群接受這個備忘錄，是爲了使東京方面相信，交涉的延長並不是完全沒有結果的。這可以挫滅東京對他不滿的詞鋒。即使引不起對他的同情，至少可以引起對他的了解。他是被派去實行一件不可能的工作，雖然他起先不知道它的不可能性。當他在天津做總領事的時候，他根本上就是關東軍以及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的發言人。有那些有力的軍事力量做他的靠山，那時他和中國的官員辦理交涉，他抱的是橫蠻而獨裁的態度，但是當他被任命爲大使的時候，他很快地就明白了：在南京，他是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地位。國民政府是不受威脅和恫嚇的。張群明白地表示他不是在接受是個長官的命令，而是在和一個平等的人商討事件。

繼第八次的會議以後，一個更遲的會議在晚上舉行了。就在當天，因紗廠罷工事件，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這表示日本對於中國，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張羣要求川越午後七點三十分到他的



外交部的私邸去。這一次兩個外交家的會談，形勢極端的嚴重，會談的結果完全破裂。中國的外交部長堅持着說，當日本海軍陸戰隊繼續在青島的岸上，以及日本對待綏遠仍抱曖昧的態度的時候，繼續的交涉是絕對無用的。那夜晤談的結果，把一月以來所保持的局面以及可能的前途都完全地推翻了，一切都表示日本要停止交涉而把袁的美頓書發出。在中國也顯然地達到了忍耐的極點，於是它採取了堅決而自衛的立場：除非東京政府能命海軍把它的陸戰隊從青島撤退以及下令關東軍停止援助蒙古以及『滿洲國』的偽軍去進攻綏遠，否則便不再和日本的大使繼續磋商。這是顯然的：中國表示它預備以兵戎相見。日本的海軍在青島登陸，並沒有造成什麼結果，除了使中國人加強抗日的情緒，以及增加國際間因日本蔑視國際法而感到的憂慮。

川越坦白地承認這個新的局勢，這是很可以顯出他的價值的。在第八次會議以後，他到上海去，在一個公開的接見的時候，他認識如其中日雙方要到一个理解的地步，對於現代的中國，日本一定要有一個新的認識。他說：『在我從北方轉到南京以後，我自己對於中國的主張完全改變了，並自由於我在南京耽擱的結果，我獲得了許多新的認識。』他還說，『自從綏遠的戰事發生以來，中國的態度顯然地變硬起來。』但是他聲明在最後的會議裏，交涉並沒有到一個破裂的程度。川越的這次公開的接見，博得中外報紙的許多的好評。因此，也就引起了他的辭職的謠言，但是日本外務省的發言人否認

了這個謠言，同時，對川越公開承認日本對華的政策失敗，也表示否認。

交涉的失敗使日本感到難堪，東京政府遭受攻擊，不僅遭受到日本報紙的攻擊，並且也遭到樞密院以及貴族院的議員們的攻擊。外相有田受到嚴厲的罪難，在川越大使離皖南京以後，對於廣田內閣在處理政府的外交的事件上所抱的『軟弱』的政策，全國羣起責難。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使得日本的內閣不倒的唯一救星，是不久在西安發生的驚人的事件。

在民國廿五年的年終的時候，宣佈那曾經使中日關係惡化的成都事件以及北海事件，已就地依法滿意地解決了。這兩個事件的解決，使在南京遷延不快的中日談判獲得了一點喘息，而且更顯示了中國的外交政策的一個驚人的勝利；中國的外交政策早就主張所有各地方上發生的不同的事件，應當就地分別處理而商討解決的辦法。

綏遠方面的局勢的發展，使中國的自信心恢復起來日本明顯地想利用交涉為煙幕，實行更進一步去侵略華北的領土；當川越正和張羣竭力交涉，想在『友誼』的名義下，將一切中日間沒有解決的懸案加以解決的時候，他的軍人同僚們却正在計劃佔奪綏遠。甚至早在民國廿五年的夏天，當所謂調整中日關係的交涉開始的時候，『滿洲國』以及蒙古的偽軍，在日軍的指揮下，並且配以日本的武器而由日本直接指揮，已開始集中於察哈爾的北部，準備侵犯綏遠。當時，為防萬一計，傅作義，王靖國

以及臨錫山的軍隊也向綏東集中。到民國廿五年的八月十五日，在隣近平地泉的綏遠境內發生了衝突。

至十月下旬，『滿洲國』的偽軍中的偽軍土匪首領王英和蒙軍司令李守信，更準備妥當，分兩路襲擊。據東北傳來的電訊，這些首領，由某方——一個對日本所用的隱語——以飛機八架助戰。

十一月七日，一千個受日人指揮的偽蒙軍佔領百靈廟。他們在飛機和坦克車的掩護下，向中國的防線進攻。飛機向中國的防軍擲彈。但是中國防軍擊退了進攻陶林的偽軍。

這個無故的挑釁，引起了全中國人的憤怒。民衆捐款去幫助綏遠的防軍。報紙上的記載說：綏遠的中國軍隊缺少禦寒的棉衣，於是慰勞的捐款，到足夠爲中國的防軍添置皮衣及棉衣。民衆方面的心更引起對日本的關係的惡化，無數日本在朝在野的人士宣佈說，他們的國家對綏遠的事件不能負責，但並沒有因這種虛偽的宣傳而使中日關係的惡化轉好。

因爲西北的局面將有嚴重的情勢的發展，中國外交部在十一月十一日要求各國的代表，包括日本在內，通知它們的國民從綏遠，寧夏，青海諸省，以及爲內蒙古所管轄的幾個地方，『爲了明確的軍事行動，』都得撤退。在十一月十六日，上海的日本陸軍武官喜多，對一個外國的通信記者承認說，報上記載日本軍人幫助由蒙古，『滿洲國』以及土匪所組成的，現在正集中於綏東的雜色軍隊是

根據事實說的，並且他還承認日本計劃取得中國另外一大塊土地，包括一一七・〇〇〇方里，作為日本的屬地。

自七月以來，為日人所指揮的偽軍對綏遠作最猛烈的攻擊的一次，是十一月十五日。在陶林的地方，先用七架飛機轟炸，然後用在察哈爾的軍隊去打衝鋒。

當然，飛機是為日本的機師所駕駛。十一月十六日，在紅格綳圖，中國的高射砲把兩架飛機打落。為的表示南京決心以武力抵抗日本對綏東綏北的侵掠，十一月十七日蔣委員長乘飛機到了太原。在那裏，關於綏遠的防務，他和閻錫山舉行了一個長久的會議，並且也接見了阿王，內蒙古自治委員會副委員長。

蔣委員長到太原，起了兩個作用：使傅作義的軍心振作，並且使山西及綏遠的綏靖主任閻錫山堅定。第二點，對日本人明顯地暗示中央政府直接過問北方的大局，任何併吞綏遠的計劃都會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打擊。關東軍對於自以為容易成就的這一個工作，現在明白地知道它的繁難了。

十一月十八日，在一個有三千軍政黨的公務人員的會議上，蔣委員長宣佈，『我們已經完全準備妥當，去應付綏遠省的局面，用不着過份的驚懼。』他還說，中央政府已有縝密的辦法，去應付『滿洲國』以及雜色的偽軍對綏遠的進犯。並且勉勵他們說，應當以冷靜的態度去對付危殆的局面。他褒

樊山西和綏遠的軍隊不辭勞苦地努力保護國防的前線功勳。

十一月二十四日，有一件驚動了全中國的事情，就是：傅作義以及王靖國的軍隊把百靈廟克復了。在各方面說起來，這對日本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這表示中國軍隊能和日人所訓練而領導的優秀的蒙古軍和中國的偽軍作戰，並且還能把他們打敗。這對於日本計劃在整個的北方佈置一重障壁，也是一個嚴重的挫折。當百靈廟在他們的手上的時候，日本人容易達到寧夏。民國廿五年中，日本人忙於在寧夏設置測量機關以及軍事特務機關。在百靈廟為中國突出的奇兵攻陷以後，在廟內，曾搜出許多的文件，毫無疑問地證明所謂的『滿洲國』以及蒙古的偽軍是和日本的關東軍有密切的關係。在百靈廟失陷以後，因為關東軍的特務人員，匆促地潛逃，致不及將那些上面有詳細解釋進攻綏遠以及佔領綏遠的計劃的文件帶走或消滅。這個文件的證據，如果不是因為把日本廣田首相一味堅持綏遠的情勢與日本無關的這個說謊的事實拆穿，是用不着提起的，因為這早已為全世界所明瞭。可是，平心而論，我們一定要指出：在十二月八日的一個接見中，廣田承認日本國內的政府和國外的官員絕少合作，當然，這意思是說，關東軍是照它自己的意思行事的。

根據登載在東京的英文『日本廣知報』中上的同盟社電訊說，十一月二十七日發生一次空戰，中國飛機擊落了幾架『蒙古』飛機。同盟社電訊記載說，中國飛機是中央軍新近組織的，包括蔣委員長

五十誕辰祝壽的飛機。實在，像許多日本發出的電訊消息一樣，這個記載是完全不正確的，中國飛機，受當地的形勢所限，破壞的並不大。顯然地，日本人想用這些飛機，使蒙古以及雜色軍隊感到日本在天空的威力。雖然在山西，中國飛機已整裝待發，停機場以及飛機庫也在加速建築，可是這些飛機當時還是不着。高射砲已足夠應付這個局勢。

十一月二十七日，以接見新聞記者的性質，關東軍以及「滿洲國」的外交部發表一個談話，是爲了希望挽回這個絕望的大局，公開地擁護德王去侵略綏遠，並且恐嚇中國，『如果中國軍隊想把德王的「滿洲國」的軍隊打敗，那麼他們就要援助德王。』

在南京的中國發言人回答說：『日本的關東軍輕視中國人民以及政府的決心，外國想要把中國的土地蠶食下去的時候，已經完結了。如果關東軍以爲他們能夠的話，那麼他們就要和中央軍相見的，而且，如果他們希望把這問題化成地方的事件，那他們就大大地錯誤了。如果關東軍這麼做，這就是戰爭。』

十一月二十九日，蔣委員長在洛陽孫總理的紀念週時的訓詞，可以說是对關東軍的說話的另外一個回答。他說在過去的幾星期裏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情：百靈廟的克復和『日德防共協定』的簽訂。百靈廟的克復加強人民的信心，就是，只要團結一致，失地是可以收回的。他說：『就這一意義而

嘗，百靈廟的佔領一定要認作是民族復興以及民族獨立的歷史上的一個起點。」

在離開太原到洛陽來以後，蔣委員長下令說，沿綏遠的北方的邊境，定須建築永久的防禦工事。他同閻錫山發出了一個聯名的通電，致『滿洲國』以及蒙古的雜式軍隊，勸喻他們和外來的勢力斷絕。這種勢力只是挑起中國人自相殘殺。那通電說：『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爲什麼目的，你們要進攻綏遠？難道你們真地願意讓你們的子孫去變成別的民族的奴隸嗎？』那通電也請求他們立刻地醒悟。不要愚昧地去和他們自己的弟兄作戰，並且要求他們倒戈來歸附政府，俾在將來不致被後世罵作漢奸。

當綏遠的防軍把進攻紅格爾圖的軍隊打退的時候，這更可以證明日本訓練的軍隊是很拙劣的。這些雜色的軍隊受到很重的損失。在日本人的鞭策下，於十二月五日，他們向百靈廟實行了一次反攻，但是在死去五百多人以後，又被打退了。由於這些事件的結果，南京的威信以及蔣委員長的聲望達到了新的階段。

十二月九日，綏遠的軍隊克復了大廟，這是『滿洲國』以及蒙古的僞軍在綏遠北的部最重要的門戶。這次的勝利終於把那個地方上的反政府的僞軍解決了。百靈廟以及大廟的克復，使雜色的軍隊完全崩潰，有的給趕到山上去，而給養完全斷絕。他們的軍隊常常叛變。政府的領袖對於那些反正的士

兵，完全以寬大的態度相待。

在克復大廟後的兩日，兩團計有軍官二百名士兵五千人的雜色的諸軍隊，以前是受王英指揮的，向綏遠軍投降了。這些軍隊帶來了十二輛軍用汽車，四架野砲，二十枝機關槍，幾架短波無線電收發機以及毒氣彈。

綏遠的戰事，起初好像是地方的事件，現在已經變成全國的，甚至變成了重要的國際戰爭了。全世界都覺得這足以表示侵略的日本和一個醒悟而堅決的中國在作武力的初步試驗。這個戰爭表示中國在對驕傲的日本反抗，日本從前以為在威脅以及別的代表前，中國就會永久地屈服，那個反抗使關東軍窺食中國的土地的企圖遭受突然的顛挫。還有，這一次的侵掠使中國的民氣堅定，因此使南京政府的領袖們對日本的交涉，抱一種不妥協的態度。是政府的領袖又是國民領袖的蔣委員長，大大地加強了中國各階級對他所抱的信心。這一點在慶祝他的五十誕辰的這個事件，已經完全表示出來了，但是命運注定了幾個星期以來，聖誕節那天，使他獲得各方面的更大的頌揚。

綏遠的戰事結束不久——至少暫時是停止了——德日間的反共協定宣告簽訂。中國人聽到這個消息，感到興趣，可是也不見得不夾雜憂慮。這個協定顯然是直接反蘇俄的。但是許多的中國的輿論方



而深怕在間接方面，德日會強迫中國去參加反蘇俄的運動。

協定簽訂的宣佈，差不多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以外。報上記載說，交涉在柏林進行了十二個月。簽字本來是不必要的，因為這兩個國家覺得它們有固有的親緣。早在民國廿四年，希特敦就在他的一篇演說中說及雅利安民族以及非雅利安民族的相對的價值時，曾對日本民族表示特別的如意。當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日德簽定了一個協定的這個消息最後公佈了的時候，據說日本的外相有田感動得以致他把國社黨的首領希特拉的照片，緊抱在心上，以表示他的衷心的快樂。日本和意大利也有表示，它們透相慶祝它們彼此承認『滿洲國』以及『阿比西尼亞』，但是意大利並沒有公開地加入反共協定。

日德的條約不僅引起中國的嚴重的憂慮；就是英美方面也感到不滿。『倫敦泰晤士報』最直率地批評過日本，它說日本最近的行動，徒使最近已稍緩和的日蘇的緊張局面，更轉惡化，另一方面，而它的新同盟者會更使那些看到有禍事正在蘇俄的西方鄰近的地方發生的國家增加憂懼。『泰晤士報』還說，日本算是得了新的朋友，這兩個朋友雖然都有『承認明顯的現實』的傾向，但是它們並不能遮而接受國際條約簽字國所遵守的公理。日本這樣做，使它和蘇俄的關係益形惡化，更危及它的行動的自由，結果是使它得不償失。該報結論說，日本過去是很希望把英日的協調加強的，可是它把這個前

途破壞了，因爲大不列顛政策決不會自己捲入而追隨於同盟集團之後的。

當所有的日本人聽見德日防共協定成立時，他們並沒有像外相有田那樣地覺得快活。『日日新聞』指出新的協定更足以促進中國和蘇俄的接近，而日本企圖增加對英美的友誼的關係，是不會照到它所期望而順利地進行的。就是有田當他在樞密院前，解釋他處理日本的外交關係時，也承認在日德協定成立以後，中日的關係日趨惡化了。

日本和德國雙方都忙着對大起疑心的全世界解釋說，在它們兩國的協定中，沒有秘密的條件，但是兩個政府的表示並沒有把全世界的公共的猜疑平息。全世界都根深蒂固地相信防共協定不過是日德兩國用以遮掩它們進而去侵掠土地的野心的一個幌子，在不遠的將來，意大利也可能成爲它們的一個夥伴。當然，這是個新法西斯集團。這樣說也許有點過火，對於和德意兩國締造過友誼的，甚至是最密切的關係的中國，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爲了鎮定民衆的衝動，並且盡可能地使中國和歐洲的兩大國家的關係不致日趨惡化，蔣委員長公開地表示他的信心：日德防共協定並不會變更兩個國家的外交的關係，或是遠東的一般的情形。他又婉轉地說，他不相信這兩個國家有任何秘密的軍事聯盟，並且他不以爲德國會完全忽略和中國以及別的國家的友誼。同時，他指出清剿西北的餘共，只是中國的內政，決不會受到外來的影響或是國際政

治的影響，或因遭受阻礙而致中途停頓。

國民政府之欲進攻共產黨，是毫不成問題的，但是在張群和川越交涉的時候，日本要求協助中國剿共的權利和行動以及後來的日德防共協定，使許多中國老成持重的人民覺得，爲了使政府能有力地應付日本的侵略的外患，如果和西北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了解，豈不是更好嗎？日本堅持南京政府參加反共協定，在多數的中國人看來，不過是它想把中國拖去做對蘇俄作戰的助手。當然，中國絕對不想幫助日本爲日本自身作戰。真的，如果讓中國人自己選擇的話，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會願意和蘇俄合作，而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時候，這樣的關係可以把中國放在法國和英國甚至美國的一個陣線上。這種感覺，當雙十二西安事變的當時以及事變以後，更在中國各方面的人中間，表現得最爲淋漓盡致了。



## 第二十九章

- 一：蔣委員長和東北軍……………
- 二：拒絕蔣屬的鐵線……………
- 三：濟晨的事變……………
- 四：蔣委員長  
的暫時綏靖……………
- 五：蔣委員長被劫持於西安……………
- 六：叛軍的八項主張……………
- 七：政府  
採取緊急行動……………
- 八：全國的騷擾憤怒……………
- 九：張學良的軍職以及討代軍的出動……………
- 一〇：端納飛西安……………
- 一一：蔣鼎文被派計南京……………
- 一二：衝突的中止……………
- 一三：日

本對西安事變的態度

當蔣委員長對綏遠方面擊退日本做後援的侵略軍的軍事行動，表示滿意的時候，他却對陝西以及甘肅的情形，深為不滿，交托給張學良將軍的剿共軍事，進行得並不順利。在民國廿五年的春季，共產黨擠進了山西，在他們為中央軍以及山西軍趕走以前，曾引起了嚴重的紛擾。大批的紅軍從山西逃出，並且在陝西的北部重新建立起來。張學良的軍隊和共產黨軍隊的訂有默契的諒言，幾乎為各方面所相信，並且認為是不能忽視的。

十一月廿四日，張學良把前線的緊張形勢告知蔣委員長，並請求他到洛陽以待面謁。張學良於十二月三日乘飛機去洛陽，向蔣委員長作一個詳細的口頭報告。而蔣委員長不聽他的部屬的勸諫，於次日前去洛陽，決定使糾紛的局勢好轉，同時親自指示剿共軍事。當他抵達西安飛機場時，有數百個東北軍的軍官蒞場歡迎，他們表示想向蔣委員長面陳關於剿共軍事的意見。蔣委員長就叮囑他們將意見交給張學良轉呈給他。這是東北軍對政府所採繼續剿共政策表示不滿的第一次的公開的表示。

在西安，蔣委員長召集高級將領，舉行了數次會議，討論剿共的軍事。蔣委員長因為認清了東北軍的軍心已不足以完成剿共的軍事，於是就委任蔣鼎文將軍（他並不是和蔣委員長特別有關係的人物）為晉陝寧綏四省的剿匪總司令。因此，謠言立即在張學良的軍隊中傳佈出去，說張學良將被降職，他的軍隊將被解散，有幾師要被調防到福建。同時，蔣委員長的部下認為他留居離西安約十五英里的華清池（臨潼）是不安全的，便勸他立刻回洛陽去。但是因為蔣委員長已明白張學良的信任心，所以他曾斥責他的部下的勸告，並且聲明將以撒佈無稽的謠言而治罪。

蔣委員長留居華清池極為安靜，每日和張學良和楊虎城見面，並且沒有發覺他們有一點對他不信任的表示。蔣委員長的行轅所在地華清池，是一個溫泉的勝地，背山而立。蔣委員長每次蒞臨西安的時候，總是駐節在這個地方，因為這裏的風景佳妙，空氣也很新鮮，他所住的屋子位居山麓，他只有

十幾個他自己的衛士以及五十幾個憲兵保護他。張學良調他自己的一營衛隊到那裏去，以加增對他的領袖的保護，張學良的這一營衛隊是駐在華清池的周圍附近。

在十二月十一日晚，蔣委員長設宴款待張學良和楊虎城。楊虎城以另外有宴會爲口實，沒有出席，但是張學良到了。九時宴罷，張學良隨即離開了華清池。在張學良離開華清池以前，他將孫銘九介紹給蔣委員長。據他說，他將派孫銘九到前線去擔任特殊的工作，要求蔣委員長對孫銘九訓話。蔣委員長不知道孫銘九到那裏的原因，所以真地對他訓話了。到後來，他才知道孫銘九是受張學良的命令來執行幽禁蔣委員長的這一個重大的任務的。僅僅在七小時以後，孫銘九就率領軍隊包圍了華清池。

在十二月十一日的夜晚，蔣委員長還沒有去就寢以前，他曾經對永久消滅共產黨的軍事的計劃，加以最後一次的窒悶。根據他的情報人員的報告，他知道共產黨的軍心已經大大地減低了。因爲他們東奔西竄，現在被圍困在一部份的鄉村之中，而不能獲得給養。一次嚴重的清剿一定可以使這妨礙中國統一的最後的障礙一掃而去。清剿的計劃已經完成了，蔣委員長歸房就寢，他相信三四個星期以後，一定能夠看到剿共軍事的結果。

第二天所發生的意外的事變，最好我們來看一看蔣委員長自己所寫的經過。

「凌晨五時半，牀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又發；再造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乃知東北軍叛變。蓋予此來僅攜便衛士及衛兵二十人，而行轅大門外之司警戎者，即張之衛隊營也。少頃，侍衛官竺培基及施文應率報：『叛兵已蜂湧入內，本已衝過第二橋內，被我等猛射抵禦，死傷甚多；叛兵知我內衛線已有防備，刻已略退，請委員長從速離此。』竺施等報告方畢，毛區隊長裕禮亦派傳令來報曰：『叛軍已衝入一門，但接後山哨兵所電話；稱該處並無異狀，亦未發現叛兵。』余問：『毛區隊長在何處？』答：『區隊長正在前院第二橋前假山旁率隊抵抗，速請委員長先登後山。』余問：『叛兵如何形狀？』答曰：『戴皮帽子，皆是東北軍官兵。』

此時余猶疑爲一部之兵變，必係赤匪煽惑駐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即張學良——譯者）有整個之計劃。蓋如東北軍整個叛變，則必可圍行轅外牆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尙無叛兵蹤跡，可知爲局部之變亂。如余能超越山巔，待至天明，當無事矣。

乃攜侍衛官竺培基，施文彪與隨從蔣孝鎮，出登後山。逕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扁，倉卒不得鑰，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着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候，扶掖以登。



此山東嶠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乃向東行進。山嶺陡絕，攀援摸索而上。約半小時將達山巔，擇稍平坦處席地而憩，命衛兵向前嶺偵察。少頃，四周槍聲大作，槍彈飛掠余身周圍而過，衛兵皆中彈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圍之中，此決非局部之兵變，而為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計，決計仍回行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巖穴中，荆棘叢生，纔可容身。此時身體已覺疲乏不堪，起而復仆者再，祇得就此暫息，以觀其變。

時天已漸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見巖山下已滿佈軍隊。旋聞山下行轅外機關槍與迫擊砲聲大作，約半小時許，知行轅衛兵尙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砲進攻也。此時當已九時許矣。自此即不聞槍聲。叛部乃四出搜索，經過余所在之穴前後二次，均未為所發覺。

忽聞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與叛兵厲聲爭執者；察其聲，知為孝鎮。時叛部搜索益急。聞巖穴上叛兵相語曰：『此間有一服便衣者，或即為委員長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擊以一槍再說。』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鬧！』余乃抗聲答曰：『余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理，如爾等以余為俘虜，則可將余立即槍殺，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稱不敢，向天空發槍者三，高呼：『蔣委員長在此矣！』

旋孫銘九營長來前，向余長跪而泣，連言：『請委員長下山。』余乃知圍攻行轅者，爲張之衛隊第二營也。孫隨護下山，至華清池行轅前，余欲入內稍憩，見門內物件紛亂，尸體枕藉，孫堅請余登車入西安，謂：『委員長所居之室，已凌雜不可居，營長奉上官命，請委員長入城。』余命孫：『找汝之副司令來！』孫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對上官叛變，實對國事有所請求，將面陳於委員長，望委員長接納吾人之所請。』余怒斥曰：『叛逆狂謬至此！無多言，欲斃余，則速斃余可！』孫與第一〇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又向余敬禮，請登車入城。余欲見漢卿詢其究竟，遂登車行。

孫銘九與唐君堯旅長既扶余登車，夾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車前，即張漢卿親信之侍從譚海也。車向西安城直駛，經東關，遙見張漢卿之車，唐旅長謂：『副司令來矣！』既近，實非張，乃來傳令送余至何處者。唐旅長詢前坐之譚副官：『送委員長至何處？』副官答：『新城大樓。』新城大樓者，即西安綏署，楊虎城所居。余聞而大疑；以圍攻叛變者爲東北軍，何乃送余至楊處？時車已近東門，見守衛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爲駭異。繼思昨晚約宴各將領，虎城未必到，以先赴張宴，爲張所給，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級將領，必爲其一網打盡矣。頃所見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係張部將第十七路軍留西安部隊繳械後，

觀其軍衣而令東北軍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蓋虎城參加革命之歷史甚久，亦爲本黨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變也。既入城，唐君亮向余喟然嘆曰：『委員長鬢髮漸白，較二年前我等在廬山受訓時，蒼老多矣！國家實不能一日無委員長！只看西安城內之繁榮景況，與二年前大不相同，非委員長主持西北建設，曷克臻此？甚望委員長善自保重！』余未及答。十時，抵新城大樓。』

蔣委員長之衛隊和憲兵抵抗張學良的軍隊的進攻，差不多有一個鐘頭。受傷的和被殺的有四十多。抵抗叛軍而死的有蔣委員長的衛隊長蔣孝先，傷的有蔣委員長的參謀長錢大鈞。

當張學良的軍隊圍華清池，攻擊蔣委員長的衛隊和憲兵並且搜尋他的時候，于學忠的部隊將當時適在西安的十七個國民政府的高級人員拘捕起來。他們裏面包括得有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內政部蔣作賓，晉陝寧綏四省剿匪總司令蔣鼎文，甘肅綏靖主任朱紹良，軍政部次長陳誠，豫皖蘇三省邊境剿匪司令陳繼誠，前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方震，西北剿匪前敵總指揮衛立煌，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邵元冲。邵元冲後來在事變中被害。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時五十分，這個嚴重的消息傳達到南京，當時由駐潼關的樊松甫軍長將張學良自西安發出的一个電報傳遞南京政府。在這個電報中，說華清池發生兵變，蔣委員長失蹤。後來張

學良和楊虎城費幾小時的努力，都沒有辦法找得蔣委員長，於是致電樊松甫報告情形。

一小時半後，軍政部長何應欽接到一封由西安發來的通電，使他對於西安的形勢稍為明瞭，而且更明瞭了它的嚴重性。這個通電的簽名者，其先後的名次如下：張學良，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饒大鈞，王以哲，高耀煌，董英寶以及穆徵流。通電中所列的簽名者，至少有十二個人是偽造的。因為這十二個人不但沒有同意列名，而且事實上他們早被拘禁在西安。

在述及東北的失陷以及列強『犧牲中國的國家和人民』而締結協定以後，這個通電提議中央當局應該乘綏東戰事的良機去獎勵人民和軍隊發動全面的抗戰。它說政府不但不抱這個方針，而且外交當局仍竭力尋求妥協。這個通電還進一步說：『我們追隨委員長左右有年，再不能坐視不救，因而迫使我們向委員長作最後的進諫。我們絕對擔保委員長的安全，同時更勸他對他的政策更加考慮。』

下面所列的是八項要求的綱領。這個通電，聲言是西安軍人以及人民所一致主張的：

- (一)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
- (二) 停止一切內戰；
- (三) 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 (四)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

(六) 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七)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八)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個通電解釋說：『這八項要求是代表我們關於救國的政策，也就是代表西北軍人和人民關於救國的政策。我們希望政府能尊重人民的公意，並且接受我們的要求，藉以使國家甦生，使以前的錯誤糾正。我們持有公理，決不後悔。我們的唯一的希望，只是求這些政策能實現和對國家有所貢獻。讓全國的同胞來裁判我們的功罪。』

在幽禁蔣委員長後，張學良企圖向他提出要求，但是沒有成功。當蔣委員長被幽禁的第一天，張學良稱呼他爲『委員長』的時候，蔣委員長斥責說：『爾尙稱余爲委員長乎？則爾爲余之部屬。如爲部下，則應服從命令送余回洛；如爲敵人，則立斃余可耳！二者任汝擇一行之，他不必言；卽言，余亦不聽也。』

在當晚十一時半，中央政府接到這個意外的消息的時候，就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以及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在這兩個會議中，一致通過決議，任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

常委由五人增到七人，馮玉祥及其他常委負責處理軍事委員會的事務。何應欽負責調動軍隊；張學良被免職，交付軍事委員會處分治罪，所有他的軍隊交給軍事委員會直接統制和指揮。孔祥熙和蔣夫人宋美齡乘當日的夜車趕到南京。次日，政府公佈命令免張學良代理西北剿匪總司令職以及其他的職位，並且命令軍事委員會將張學良交付軍法處辦。

當蔣委員長在西安失去自由的消息傳出後，全國驚動而且憤慨。各電報局所接到全國政治和商民團體向西安抗議，並且要求立即恢復蔣委員長的自由的電報，就像雪片一樣地飛來。不單是中國的人民——他們正在為自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見到行將告成的統一而歡欣——遭到這個突變而驚慌失措起來，就是歐美方面，也將注視國內嚴重問題的目光移轉到中國方面來，以不安和同情來注視中國突變的局勢之發展。

這個情勢的特點是全國的輿論一致堅強地擁護政府。雖然因為大部份的國民堅決地要求對日戰爭，所以張學良以及他的聯合者的反日的主張能獲得廣泛的擁護，但是甚至這些愛國份子對這個事變也側目而視，認為國內的分裂，徒然遲延一致對日的時日。

蔣委員長被劫持的消息一經證實以後，第二個使人民關心的問題是：是否他還是活着的問題。由於日本通訊社以及中國報紙登載的消息，說蔣委員長被殺，人民的焦急和憂慮便更加增了。然而，十

二月十三日張學良發來的電報，明白地表示蔣委員長是安全的。張學良在他的致孔祥熙的電報上，說：『我今天像八年前一樣的愛護蔣委員長。我對他的安全負全責，並且不讓他受到任何傷害。』在他的致蔣夫人宋美齡的電報中，他宣佈說，『所有我的一生，我就沒有做過一次忘恩負義的事。我可以對天起誓。請你不要為蔣委員長耽心。』

在第三天，張學良告訴蔣委員長，『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員長不是在日常中罵我無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實覺無人格。然委員長以前對部下亦太簡默，如余以前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

蔣委員長自從成年以來，不斷地記載日記，以養成言行一致的習慣。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斷過一天的日記。不幸，在廣東東江兵變的時候，他遺失了幾卷。除了重要的每日的事件和他的讀書摘記以外，他的日記上也記載他對他自己的質問，關於他的脾氣是否過於急躁，關於他對他的部屬是否過於嚴厲，並且還記載作為自我批評那樣的說話。

在張學良發現蔣委員長對他以及他的部下是寬大而仁慈的時候，他覺得他對於蔣委員長的安全的責任負得比以前更大。他逐漸地感到蔣委員長留居在那兒的綏靖公署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關於這個

居住的問題，他在前一天就對蔣委員長說過了。但蔣委員長拒絕遷移到新的地方去，他說與其搬到他處去，寧可死在行轅裏，以保持他的長官的地位。

同時，蔣委員長和張學良的密友端納經過洛陽飛西安。在十二月十三日的夜，晚他接到張學良歡迎他去的一個電報。第二天早晨，他乘飛機赴西安，在午後五點三十分，南京接到他的電報，說是他看見了身體無恙的蔣委員長。

在十二月十四日的午後，張學良和端納一同去謁蔣委員長，得端納的幫助，才使蔣委員長不拒絕遷移到靠近張學良的住宅的新的居所去。在這裏，蔣委員長有張學良的親信的部隊保護，而不是被認作不可靠的楊虎城的軍隊。直到那時為止，他都沒有和張學良談起八項主張，但是在新居的地方，在蔣委員長和張學良之間發生下面的談話。蔣委員長告訴張學良：不管他們有什麼主張，不管他們的主張如何響亮，但是他們參加事變的行爲總是錯誤的，沒有人會相信他們的誠意，更沒有人會擁護他們的主張。日記上寫道：

『張又繼續陳說其八項主張之理由，欲余酌加考慮。余謂：『已決心犧牲此身，以維持國家之正氣，成仁取義，籌之至審。在新城言之已詳，何終不省？須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萬難劫奪，余決不稍有遷就。非余劫京，不欲聽爾對此事有隻字之陳述，多言無益也。』』



張謂：『爾亦太專制，余即爲一人民，亦應讓人民有陳述國事意見之機會。』

余謂：『今日余即擔負國家存亡之責，凡效忠民國之國民，此時皆應聽中樞與領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領袖，強迫領袖，豈尙得自稱爲人民？』

況爾爲統率軍隊之軍人，更何得自居於人民？今日凡危害國家者，即爲余之敵人，亦即爲國民之公敵。即使爾自居於人民，如欲說話，亦應在國民大會或地方議會中去說；至就政治及黨的組織系統言，如有意見，亦應向中央依法陳請，爾等躬爲叛變，不速自悛悟，尙託於陳述國事意見以自解，其謬孰甚！總之，余不回京，爾無論有何條件或主張，均不能談。

張問：『回京以後，則可向中央提出歟？』

余謂：『余可見爾等提出於中央，但余必聲明：余不能贊成爾等之主張。』

張謂：『你不贊成，則雖提何益乎？』

余曰：『黨有紀律與議事規則，余不能獨斷，可否應決之於多數也。』

張半晌不語，旋謂：『委員長人格實太偉大。但有一點不無令人遺憾，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實太古太舊！』

余問：『何謂古？何謂舊？又何意太古？』

張茫然不知所答，繼乃言：『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

余曰：『余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之所謂新書者係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爲新。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余可爲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爲新書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穿幾次矣。』

久之，張又謂：『舉一例以言，委員長滿腦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總覺趕不上時代。爲何不從成功着想，而祇求成仁？且我數當代人物只有你一人，爲何你不稍假借，容納我等請求領導我等革命？豈非就可成功，爲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見，成仁決不是辦法，亦決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

余訝其思想錯謬至此，乃告之曰：『爾此言余實覺奇異，爾須知革命乃是犧牲，而非投機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總理所謂『不成功。卽成仁』其意並未將成功成仁看做兩件事也。』

實告爾：我之成仁卽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卽革命何日成功矣。爾未讀總理『軍人精神教

育」講演中有「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之二語乎？」

彼謂：「余未閱讀及此。但我生國死，此語尚不難解；若『我死國生，』則作何解？」

余嘆曰：「汝真未聞革命大道，難怪錯誤至此也。『我生國死』云者，譬如余今日若祇求偷生視息，置國家利害民族存亡於不問；或偶遇艱險，便生畏怯，身爲軍人，人格掃地，國家將何以免於危亡，豈非『我生則國死』歟？反之，義之所在，不奪不搖，生命可犧牲，而正氣與主義不可犧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則精神永遠不死，自有無窮之繼起者，秉此正氣以擔當國事，此卽所謂『我死則國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爲劫持我或危害我卽可使中國無辦法者，徒見其愚昧而已。」

彼見余不可強干，乃無言而退。」

同時，隴海路備有一百輛火車，以供軍事當局調遣軍隊到西安去營救蔣委員長，而津浦路備有六十輛車。在事實上，軍事方面已表示出最驚人的行動；在接到那個嚴重的消息的幾個鐘頭以內，大部份駐防在軍事要隘潼關的東面的政府軍隊，已從那裏開赴潼關的西面，並且同時沒有遭到抵抗地在洛陽解除了張學良的重砲團的武裝。在當天，楊虎城的一個部下馮欽哉發了一個通電，表示對政府效命。他的行動，結果使楊虎城失去了兩萬軍隊。

等待三天以後，胡宗南以及一百七十個軍事人員，因為沒有聽到任何關於釋放蔣委員長的消息，所以發了一個通電，督促不要遲延地出師討罰張學良以及他的聯合者。他的敬愛蔣委員長像孩子們愛他們的家長一樣。在這些軍事人員之中，有許多是他以前在廣東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人民也同樣地關懷蔣委員長的釋放。全國的教堂都禱求蔣委員長早日回南京。喇嘛教以及佛教也爲他禱告上天。人們全部沮喪而憂鬱，學生們談到蔣委員長的危險的時候，都痛哭流涕起來。

爲了減低人民因感到政府可能變更政策而起的恐怖，在十二月十五日的早晨，行政院舉行了一個會議並且通過了一個決議，關於外交的事件，政府繼續實行爲蔣委員長以前所決定的政策，綏遠以及其他地方的剿匪工作也繼續照常履行而不鬆懈。這個決議，以及前兩天行政院議決通告各省的當局應當照常履行職務另外的決議，便使全國民的騷擾的心境平靜下去。

當第四天，蔣委員長的幽禁行將結束的時候，端納在西安這到洛陽，由長途電話對蔣夫人宋美齡以及孔祥熙報告蔣委員長的平安。由不信賴電報的報告而引起的恐怖是完全地消釋了。蔣夫人接到張學良的一個電報，在這電報上，他說西安方面歡迎他去。雖經親朋竭力的阻止，但是她還是想立刻飛到西安去。同時，蔣委員長的妻舅宋子文正剛從廣東來，表示他願意在政府的領導之下，盡他的力量去斡旋一切，以營救蔣委員長的出險。

當蔣委員長留居在蘇居的時候，他的周圍有全付武裝的衛隊保護他，因為張學良恐怕楊虎城的軍隊會從監禁蔣委員長的地方把他奪走，這個形勢是極端地嚴重。張學良只有四百個兵在城裏做他的衛隊，及差不多六千兵在城外，而楊虎城有八團人在城裏。所以如其這兩個軍事領袖一有衝突的話，蔣學良一定是被打敗的，蔣委員長也就會落到更仇視他的人的手裏。

當這個從速釋放蔣委員長的消息還沒有達到的時候，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在十二月十六日早晨，召集了一個特別的會議，議決任何應欽爲討逆軍的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及發討伐的命令。這個命令是照這樣的意思公佈了。在同一個早晨，政府軍對叛軍的地勢作一個大包圍的運動。同時，政府的偵察機帶回的消息，說是張學良已派重兵前進。在南京發生一個恐怖的謠言，就是：張學良會把他那裏的政治犯帶到人跡稀少的陝西以及甘肅的平原上去，因爲他覺得對政府作戰，沒有獲勝的可能。

爲了表示他急於求這個難關的解決，以及就心政府不派代表去和他交涉，張學良拍了另外一個電報致何應欽，這樣說：『你們只是異常地關心個人的安全，而你們全不會顧到我們所擁護的主張。』同時，上海路透社接到張學良的一個電報，在這個電報上，他竭力解釋他的地位以及安定國人的惶恐：蔣委員長是安全而健康的。他致路透社的電報是這樣的：

『積極的抗日是中國的唯一出路，這是人民所一致要求的。爲了實現這個主張，我們不斷地對蔣委員長勸告，但是他堅決地拒絕。我們是這樣逼不得已留他在這兒，給他最後醒悟的機會。只要蔣委員長一把他的荒謬的政策放棄而積極地動員抗日，我們就立刻再會變成他的忠心的隨從者，而願打前鋒去作戰。我們的唯一的目的是在救國，絕對沒有個人的私心。這樣決計不是叛變，而是爲了便全國的各黨派團結起來，共同負起救國的責任所必需採取的步驟。蔣委員長在這裏的情形甚好，而且受到很好的待遇。』

政府發表了討伐的命令以後，南京的飛機開始轟炸華縣，在洛陽和西安間的鐵路線上，並且炸死了許多張學良的士兵。張學良第一次才覺到形勢的嚴重。爲了八項主張得不到蔣委員長的贊成，張學良是躊躇莫決了。當十二月十七日的早上，政府方面一致相信繼續延遲是會沒有結果的，交涉是有危險的，可是在傍晚時分，南京有幾方面，覺得形勢有希望了。這個希望的根據，是由於這個事實來的：在前一天，張學良不斷地用無線電向南京請求討論可能解決的條件。另外的證明是根據釋放他的一個重要的政治俘虜蔣鼎文，派他到南京去開始談判。蔣鼎文在十二月十七日乘飛機離開西安。當日傍晚，抵達了洛陽，次日，他到了南京。

另外更有證明形勢的好轉的事實，就是張學良渴望使這個對各方面不和的局面得到一個解決，他

於是致電山西綏靖主任閻錫山請求援助解決困難。他派他的秘書於十二月十七日乘飛機去太原，向錫山提出下面的保證：（一）事變全由愛國動機而起；（二）他負全責以保蔣委員長的安全；（三）如果於國家有利，他願犧牲他個人，甚至他可以伴送蔣委員長返南京，以待人民裁判他的行動。

閻錫山致電張學良表示願意協助，在他的代表沒有到西安以前，張學良必須保證他的代表能單獨謁見蔣委員長，而後有第三者參加。張學良稽延，未予覆電，致使他的秘書在太原等候了二十四小時。結果，他的秘書返回西安，未能借閻氏的代表同來。

蔣鼎文於十二月十八日午夜抵達南京，帶來蔣委員長致軍政部長何應欽的一封親筆信，這一封信說：『我聽到昨天我們的空軍轟炸渭南的消息。我希望你須立命停止轟炸。依照目前的情形看來，我或者可於本星期六以前返回南京。因此，在星期六以前，不能有任何軍事行動，空軍轟炸更應立即停止。』

蔣鼎文更帶來蔣委員長致蔣夫人的信，他在信內告訴她，他極安全而且健康。張學良請求蔣委員長轉一封給政府請求停止敵對行動並且維持現狀的信。於是蔣鼎文被選負這個使命——這在南京方面是不知道的，蔣鼎文關於此事的經過向政府說明了。十二月十七日，張學良當每日去晤談的時候，見到了前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方震，蔣方震於是告訴張學良，認為空待南京方面的消息，必無結果，搆

議派代表到南京和政府開始談判，以求釋放蔣委員長。張學良認爲很對，於是蔣鼎文——被幽禁的政治犯之一——便被派任這個職位。於是蔣方震，張學良，蔣鼎文三人同謁蔣委員長。獲得他的允許。在離西安以前，蔣鼎文問蔣委員長是否要蔣夫人同來西安。他的回答是不要來。當蔣鼎文辭別蔣委員長以後，張學良告訴蔣鼎文，如果南京願意和平解決，他就歡迎蔣夫人來，不然的話，不如不來。

自聽取蔣鼎文的報告後，政府方面立即召集會議，議決通知張學良，政府決不停止軍事行動或是和他談判，但將命令空軍司令在十二月十九日即星期六下午六時以前停止轟炸。這個會議更決定將不派遣代表去和張學良以及他的同盟者談判，但是如果蔣委員長的私人親戚願意用私人名義前去西安，政府則不加干涉。

在前方的將領當時立刻接到命令，轟炸暫行停止，至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六時止。中國的軍政人員並不認爲蔣委員長所提及他將於星期六前返回南京是有希望的或是可能的，而且認爲蔣委員長的意思是：如果叛軍方面到時候不遵守約言，就希望政府方面不管他的個人生命，採用武力處置，以維持政府的威信。

全國普遍的對於蔣委員長個人的被禁之表示，莫過於事變後的第七日，蒙古王公德王及中國土匪首領，久授內蒙邊境而後來聯合德王進攻綏遠的卓世海，從北平發來致中央政府的一個通電，在這個



電報上，他們宣佈已經停止進攻綏遠的戰事，因為他們不願中國發生『內戰。』不管當西安事變後四日，日本關東軍派遣代表見綏遠省主席傅作義，要求退出綏遠讓與日軍，並向傅作義說：蔣委員長已死，他將不能獲得政府的持或援助等，但是德王和卓世海的態度却是那樣的表明着了。

當蔣委員長被劫持於西安的最早的日子內，日本官方的態度是很不好的，因為，與蔣鼎文於十二月十八日來到南京同時，日本大使的發言人，曾對某訪員作如下的聲明：『假如中國對日態度強化而使蔣委員長釋放，則形勢必將趨於十分嚴重。自然，這一形勢，對於日本是最嚴重的問題。無論是反日協定的任何證據，或是走向聯共路線的諾言，日本俱將予以密切的注意。張少帥正利用着反日口號，以作團結的號召，因此，我們決不能把國民政府與張學良之間的任何妥協置之不理。』



### 第三十章

- 一：宋子文出面談判……………二：日方態度之批判……………三：全國的惶慮……………四：蔣夫人飛往西安……………五：延長停戰……………六：楊虎城的恐懼……………七：事變的解決……………八：蔣委員長被釋……………九：全國表示慶祝……………○：張學良到南京……………一一：蔣委員長發表聲明……………一二：他對於張楊的觀感……………一三：蔣委員長辭職不准……………一四：張學良受軍事裁判……………一五：陝變的幾個疑點

蔣委員長在被劫持的第七日上，讀着中國的文學名著，並且據在南京和上海所接到的無線電報告，他的精神已好得多了。他甚至有一次微笑過，但他仍因他受傷的脊骨而感到非常痛苦。

宋子文不依着南京幾個大員的意見，而在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從南京乘飛機到西安去；給張學良的最後通牒，也將在這天發出，以求在這最困難的環境中尋求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這最後通牒的實行，又因蔣委員長夫人的阻力而遲延着，因為她竭力反對着進攻西安的正式計劃。宋氏沿途祇在洛

陽曾歇了一會兒，並在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五十五分到達了西安。張學良和楊虎城都去迎接他，並且一同乘車進城。張氏和端納陪着宋子文一同去看蔣委員長，並且不多時就退去，以使宋子文能和蔣委員長有一個長時間的會談。

離開西安沒有多少路，在張學良的先頭部隊和華縣附近的中央軍間發生了衝突。中央軍完成包圍張學良部隊的二營，並將他們繳械。據中央飛機報告，張部一百零六師，一百零七師，一百十七師，和一百廿九師，都正在向東挺進。除了偵察外，他們還在西安城中散發大量的宣傳小冊。

日本外相廣田宣示，說日本政府將反對西安事變的任何友好解決，因為這會造成一道堅強的抗日陣線，而在南京，對他這宣言正有着無限的憤怒。中國政府發言人開始對他的宣言作覆：申說着中央政府將絕對不願和張學良和他的同伴談判任何政治問題，並解釋着說那些流傳着的談判都完全在個人間非正式地進行着，而這些人的目的祇在使蔣委員長能早些獲得自由。

似乎對廣田不合理的宣言還不足吧，日本通訊社和日本大使發言人，都暗指西安事變是完全由蘇維埃聯邦的密使所主持着。蘇俄代辦公使史弼爾華奈克 (I. Spilvane)，痛駁日本說關東軍已知道，張學良和莫斯科間進行談判已有六月的宣言，並且在蘇俄駐華大使不在中國時，在十二月二十日向中國外交部長張群保證，說在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以後，蘇俄政府和張學良一直沒有任何直

接或間接的關係。他反覆地說着蘇俄政府的宣言：張學良的叛變損及中國的團結和實力。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拜訪中國外交部長張群，並互相會談了二小時。這次的會議絲毫不顯示着任何日本向中國的新壓迫，而大半注重於西安事變。在回到日本使館時，川越就發出一張報告書，其中他宣示着，張群曾對日本在這次中國內亂時同情的態度，表示感謝。這報告書偶然洩露了這樣一個事實：日本政府曾聽從着東京穩健派領袖們的忠告，因為他們一直堅持着，在這個中國孤立無助的時候，一個日本橫暴的態度，祇將增闊二國間的裂痕，東北關東軍和其他華北日軍將領的態度，却完全不同了。他們正想乘着有陽光的時候，來做乾草啊！

宋子文和端納一同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回到了南京。他告訴宋美齡和孔祥熙說，那件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很可能的。但當時的形勢仍很危險，因為政府軍隊是更逼近西安了。南京仍不願派代表到西安去，因為他們說這等於和叛逆妥協。在陝西的省會中，有可驚之事存在着，因為當叛變開始時，那裏祇有着少數的張學良軍隊，而大部分都是張學良的同盟者——楊虎城的軍隊。楊氏部隊似乎是一支沒受過嚴格訓練的匪軍，而顯示這一點的事實，是他們在叛變的起先三天中，曾搶劫過城中的一部。決沒有人能相信，張學良會願意地准許他人傷害蔣委員長，但大家却都極其擔憂着，他是否能統制着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激烈份子的行動。

在十二月廿二日，發生了宋美齡乘機自南京道經洛陽而赴西安的聳人聽聞的七百里長途飛行，與她同行的還有她兄弟宋子文，端納和蔣鼎文，她爲着救她丈夫的勇敢的努力，並不值怎樣驚異，因爲甚至當蔣委員長在統率着政府軍，向中國共產軍或者向頑強的軍閥軍隊作戰時，她也曾陪他一同到各處戰線去。大家以爲蔣委員長的安和中國的命運，都決之於這三個人的努力。假使他們的使命不能成功，不單是蔣委員長和他在西安被監禁着的隨從們將都被殺却，並且必定會使中國遭遇到十年或廿年內戰的混亂。因此，正有着許多比蔣委員長的生命，和被那些叛逆者所監禁着的許多著名官員的生命，更危險的事呢！一切蔣委員長在最近十年中努力於全國統一和加強中央政府權威所得的結果，都受到全被破壞的威脅。全國都猶疑不決地屏住着呼吸，並神情緊張地等待着這事的結果。一重憂鬱的暗雲籠罩着南京，和其他中國的城市。由於官方和民衆的一致同意，各種娛樂和公務機關是暫停工作了，在這個緊張張望着的空氣中，這西安活劇的最後一幕便開始展開了。

這三個顯要的人在上午十時半離開南京，在下午二時抵達洛陽，並在下午五時半到達西安。在飛離南京前，他們表示希望他們能在十二月廿五日下午六時以前，和蔣委員長一同回到南京來，在宋美齡、宋子文，和端納到達時，張學良到飛行場去迎接他們。雖然她是政府中一個有權的人物——她有着管理空軍的全權，並且常和她的丈夫討論着一切國內和國際間的問題——蔣夫人的此次到西安去，

却並不負着政府要人的任務，而是專爲給予蔣委員長道德和精神上之援助的摯愛妻子，她對那個任務很是成功。她仍和張學良握手，以免使他難堪。一小時後，她看見了蔣委員長。他問她爲何來此，並且說那裏是一個死亡的陷穽。他接着說他在早晨已知她要來了，因爲他在讀聖經時，看到『耶利米哀歌』的第三十一章，其中記載着：耶和華想用一個婦人的隻手來作一奇蹟。（我們這時還能提及：蔣委員長每天總要看好幾次聖經，並且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大家都不知道基督教，在蔣委員長婚後不久改奉耶教後，對蔣委員長的品性和政治生活所發生的重要力量。那些最接近蔣委員長和蔣夫人的人們，知道他們當一個重大的危難到來時，總是一同祈禱着，以求上帝指示。蔣委員長和他妻子對他們每天早晨一同跪下，一起祈禱着，和祈求着上帝在他們處理私人 and 官方事務時給他們智慧和公平的事，並不守秘。餐前，他們也總致一短禱詞。一切政府人員，甚至那些還信着佛教或儒教，或者信奉他教的人們，都知道並尊重着他們這深深的虔誠，細心研究他生平的人們，覺得自從蔣委員長信奉基督教後，他的方法和政策都有一個顯著的改變了。在起先的幾年中，他深信着武力之有用，但後來却非常贊成着和解和避免爭戰，並且在政治生活中，極其嚴厲地彈劾着貪污，主張守廉節。他的虔敬已到一個非常深摯的程度，因爲他無論乘火車或是飛機來往時，他總一直帶着他纔故的岳母宋夫人所送給他的那本聖經。）

中央政府幾個牽挂着他們的官員，一直不能得到宋美齡和她同行者平安抵達的消息，直到將近午夜，才從西安接到下午八時半所發的無綫電。宋子文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拍電給南京，請求將休戰再延長三天。但這請求已來得太遲了些，因為在同日上，討伐軍東路軍事集團在一個殺死二百叛軍的戰役後，已佔領了西安以東四十七里的孝義鎮，在赤水附近的中央軍也受到張學良部隊無效的襲擊。他們在中午佔領了赤水，並且接着就繼續進行包圍行動，企圖將西安圍困。然而同時雙方却都約定暫時休戰。而中央飛機仍不斷地在西安上空偵察着。同時，在中國的外國官員都在計劃着怎樣才能立刻撤退西安的外僑。

從她和蔣委員長一同留在屋內的第一天起，宋美齡就和張學良進行長時間的談話。十二月廿四日，張學良很有願讓蔣委員長回到南京去的表示，但楊虎城却非常反對，因為他說張學良在釋放蔣委員長後，能够靠宋美齡和宋子文來保護他，而他却不能得到這種有力的援助。張學良有一時想使蔣委員長化裝後，私逃出西安去但蔣委員長堅決地說，他祇願和宋美齡一同公開地離開西安。

同日，南京政府發出明令，宣佈討伐張學良和他同伴的總司令部組織的規律和法則，各方面都顯然有着準備一次真正大戰的緊急工作。離開洛陽到潼關去的滿載着兵隊和軍火的火車，數目更增加了。瀋海鐵路上的運輸工作，極為繁忙，因為生力軍一師師地都從他省調到陝西省去。



當聖誕節早晨來到時，還沒有什麼消息。蔣委員長和宋美齡那天仍不能有絲毫的安樂。但當他們醒來時，他們都感到非常驚奇，因為他們從端納處所收到的禮物，是蔣委員長一條旅行的氈毯，和宋美齡一隻輕便的打字機。這些意外的禮物使他們非常的高興。同時，在張學良和宋子文間，在宋子文和楊虎城間，和在他們和宋美齡間，進行着長時間的會談。這些接連着的重要會談，最後得到了圓滿的解決，而大家準備乘張學良的飛機離開西安。

蔣委員長的獲得自由，對外界正像他的被擒一般地出乎意外，並像戲劇一樣。當他知道了他離開西安的處置時，他命張學良和楊虎城到他房內去受指示。在一篇關於道德問題的很長的談話後，蔣委員長同宋美齡，宋子文和端納，一同乘汽車到那由楊虎城部隊嚴密守護着的飛行場去。楊虎城也到飛行場去送他們啓行。張學良爲了要履行他的諾言，所以也乘着飛機護送蔣委員長回南京去。他做這事，並不依照着蔣委員長的願望，因為他認爲他這次履行諾言是不必要的。他的飛機在下午四時離開西安，其餘的飛機不久也都隨着起飛。正巧在天暗前，這飛機到達了洛陽，而在那裏，欣喜若狂的群眾都去歡迎這全國的領袖。

蔣委員長從洛陽飛機上下來後的第一件事，是發命令一切西安前線的中央軍，立刻停止行動，以避免偶然的衝突。在發出這命令後，蔣委員長就必要地去休息多時，而這時，他所受的重傷也有着可

驚的病勢。他當時衰弱的身體，一半由於他在政變的第一日跌倒時所受到的背上腿上的損傷。

這愉快的消息在下午六時十五分開始傳到上海，而接着，在閘北，南頭，和英法兩租界內，便響着嘈雜地開始了一個規模偉大的內心慶祝。在蔣委員長被擄時生意受到嚴重打擊的各娛樂場所，突然充溢着活躍的生氣。各處都是歡宴和戲樂。臨時的遊行隊伍在各街道上進行着，手中都高舉着寫着「蔣委員長萬歲！」和「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的旗幟。愉快的民眾熙攘地來往着，歡迎着，歌唱着，並盡力傳揚着中國最重要的人物再度安全的佳音。每人都傳誦着他無限感謝的情緒。

最便捷和最熱鬧的慶祝方法，是放爆竹。而不多時，爆竹的聲音正好像這整個的大城市是在密集的機關槍火線下一樣。爆竹店因這意外的需要而對貨物感到不夠供應。在上海的主要大道南京路上，所堆積着的燃放過的爆竹紙，的確大得足夠阻止街上的車輛往來。再者，在各重要大道上各處湧湧着的民眾，也不能終止，並且完全阻塞了交通。當這佳音很快地傳播到全國時，在其他中國大城市內也可見到同樣的情形。

這時既已將近聖誕節的午夜，而這慶祝如再同樣熱烈地繼續下去，似乎一定會繼續到星期六了。除了燃放爆竹和街上的群眾外，每家人家還都懸掛起國旗來，並且燃亮了一切的電燈；這樣，就將前幾天黑音而且裹約上海城，變成了一個亮如白晝，人聲嘈雜，和活躍的大都會。

蔣委員長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十二時十五分抵達南京，到場歡迎他的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許多其他官員，和大群的歡愉民衆。宋子文和張學良在二小時後也到達了。張學良留在重兵衛護着的宋子文私邸內。在見到朋友時，他告訴他們說，他陪蔣委員長到南京來的目的，是想提高中國在世界各國的地位，表示他的擁護蔣委員長，和等待着國民的裁判。不久以後，他就送一封信給蔣委員長，在其中向他正式請罪。信上寫着：

『我生性粗魯，鹵莽和直率，所以我已造成了一件粗忽和犯法的事變。我已犯下了一件莫大的罪孽。

我已慚愧地隨着你到了南京來，並且忠誠地等待着對我的懲罰——一個適合於我重罪的嚴厲處罰，以使這處罰不單能維持國法和紀律，並且還能作爲對他人將來再犯同樣罪孽的一個儆戒。

無論什麼，祇要是對我國有利的，王至是死刑，我都不會不願意接受。我請你放棄一切私人交誼的感情，並且不要讓任何東西來阻止你給予我的應受的處罰。』

同日，爲了回答南京新聞記者們謁見的要求，蔣委員長送出下列的書面聲明書：

『我因爲在長途飛行後，覺得非常疲倦，所以我不願親自接見任何新聞記者。然而我在離

開西安前的時候向張學良和楊虎城所說的話，已代表了我對西安事變所要說的一切。現在，一切問題都得由中央政府解決。

我既居着最高軍事領袖的地位，我就得對這次改變負責，因為我不能維持軍中適當的紀律；而我對這極表遺憾，幸而中央政府能堅持他的權威，和全國的文武官吏都能盡力地維持和平與秩序，這是一件很令人滿意的事。我又應對我國內外的同胞，我各友邦政府，民衆，和報紙的深深的關切，表示萬分的感謝。」

蔣委員長會對那些在他回到南京後，想去謁見他的新聞記者們提及他在離開西安前不久，向張學良和楊虎城所說的關於那次政變的陳述。幸而這些陳述曾被宋美齡記錄了下來，現在這裏就全部重錄一遍，因為這些陳述有着深切的歷史興味，並且還是重要，這裏正是啓示着蔣委員長的忍耐力，鎮定，和洞察一切：

「此次西安事變，實爲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爲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爲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爲安之良機，實爲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

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爲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爲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尙不嫌爲我之下。爾等所受之感應，尙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矣。

爾等過去受反勸派之煽惑，以爲余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余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餘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種變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餘萬言中，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爲國家而爲自私？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

余自興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講話時，嘗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爲國家與大眾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爲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

（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僞欺妄，而不爲革命與主義着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爲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爲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

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爲余革命罪狀者？如果

有之，則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示之言，將余槍決。余於今益憶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覺無絲毫媿怍也。

以言此次事變之責任，當然爾等二人應負其責；但論究其原因，余自己亦應當負責。余平日一心爲國，一心以爲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構害之禍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變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發生如此毀法蕩紀之事，使中樞憂勞人民不安，國家受其損失。余撫躬自問，實無以對黨國無以對人民，不能不向中央與國民引咎請罪。

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綱紀，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余已明瞭爾等實係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余之誠意爲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爾等在此事變之始，即已自認爲魯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表懺悔；現在爾等已自知受反動派之宣傳，知我對爾等不僅無惡意，而且時加愛護，業已確實覺悟，而願送余回京。

余平日教誨部隊，常謂部下不好，即係上官不好，要罰部下，應先罰上官。余一爲統帥，教育不力，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爾等此次覺悟尚早，事變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能逾格寬大也。

爾等對於部下廣告此次事變受反動派煽惑之經過，以及余祇知有國不知其他之態度，切實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處置而有所恐慌。

余平日教人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上官對部下效率無方即應負責。故此次事變，余願以上官資格負責；爾等應聽中央之裁處，而爾等之部下則不必恐慌也。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余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余一息尚存，決不敢絲毫推諉或放棄。爾等屢次要求余簽字與下令，余始終拒絕，以人格事大，死生事小也。

余之言行不僅要留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實示爾等，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余時屢言：如余在西安允許爾等，簽署隻字於爾等之要求，則國家等於滅亡；蓋余為代表中華民族四萬萬人之人格，如余為部下威力所屈，臨難求免，則余之人格掃地，即等於中華民族之人格掃地以盡。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雖生猶死，雖存必亡。余平時既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宣告國民，視為救國唯一之要道，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維持人格與發揚正氣；斷不能行不顧言，使我部下與民衆無所適從，而陷國家於滅亡。

自經此次事變，爾等應得到一確實之教訓，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國家利益重於一切。錯誤應坦白承認，過失應切實悔改，責任應明白擔負，並應以此意告知部下也。

總理昔日訓示吾人，必須恢復民族道德，方可以挽救民族；所謂信義和平，均係民族至要道德。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爲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

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變，爾等將余留居西安，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現在爾等既表示悔悟，則余可請求中央；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置，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

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爲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親受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爲處世之道，絕不爲過分之追求。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尙知以國家爲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



所謂轉禍爲福之道也。

其餘被監禁在西安的政府要員，也都在十二月二十七日飛回南京，但在慶智聲中，却接到了蔣委員長長的哥哥在他們的故鄉奉化逝世的不幸消息。他的哥哥在聽到蔣委員長長被劫持於西安時，立刻就患病，並且在他的兄弟釋放後二日就逝世了，這消息使蔣委員長長非常悲傷。

次日，中央政府決定於二月十五日舉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以解決西安事件所引起的許多問題。

蔣委員長長按照着他應至少負起西安事變一部分責任的諾言，在十二月廿九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呈請辭去他行政院院長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下面是蔣委員長長向常務委員會所呈辭職書的原文：

「此次西行視軍，不意突有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變；上煩中央之憂懼，下啓國民之惶慮，綱維瀕於崩解，舉世爲之震驚。

幸中央處危定變，決策允宜，威信既昭，事變迅止。而綱紀統緒所損已多，關中軍民更罹變痛。中正親總戎機，責在身故，乃精誠未克感通，督教遂鮮明效，以致有此毀法罔紀之舉。影響所及，幾搖國本，推原究概，萬不能辭牽導無方之罪。

竊以國家所賴以樹立，首軍紀綱，賞罰之得以推行，宜明責任。

此次事變，雖發生於俄頃，而中正不能燭察機先，又不克及時弭止，致使部下蹈於不義，以負中央委畀之專一，援罰自上始之義，更不能自道其咎責。

務請鈞會明課中正以責任，嚴加以處分，以懲失職之愆。

中正年來身心勞疲，對所負職責，貽誤滋多，本不堪久膺重寄，經此事變，負疚深重，更不宜再叨國家之名位。

應請俯准先予免去行政院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本兼各職，迅派賢能接替，俾即日引退，靜候處分。

在國家可彰法紀之森嚴，在中正稍減神明之戾咎。』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委員，立刻一致不允蔣委員長辭職。他再度要求辭職，但又被拒絕不准。然而他却得到一月的假期，軍事委員會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組織特別軍事法庭來審判張學良，因為他早西安事變的領袖。當然他沒有什麼辯護的餘地，而審判的手續也很簡單。這軍事法庭判決張學良監禁十年，並褫奪公權五年。二小時後，蔣委員長便向政府為張學良請求寬赦，他的理由是張學良迅速的悔悟，已使中國避免了實力的損失——一個內戰的必然結果。『中國正遇到嚴重的國難，』蔣

委員長在他的請求書中這樣說，『並且極其需要着合宜的人物。這將領（張學良）對軍事很有經驗。他現在既已悔悟，他的英才不應被埋沒，而應在嚴密監視下完全加以運用。』

當中央政府正在考慮着蔣委員長寬赦張學良的請願書時，張學良是被正式解到孔祥熙住宅內去監禁起來。時候已來到年終了。對西安事變的一個詳細的研究，會顯示出這次事變已清楚地產生了某幾件事變。中央政府已獲得了更進一步的團結，中央政府能在孔祥熙的領導下照常履行十四天的職務；中央能和外國銀行一同聯合起來維持中國貨幣制的穩定；同時，軍閥們並不乘着這時機，和張學良和他的同伴一同反對南京；一切都茁茁着，現存的行政組織已比去年的堅強有力得多了。

我們能決斷地指出，中國的確已很是團結一致，因為南京中央政府在全國領袖不在時，曾毫不遲疑地擔負起政府的重任來。中國各部的地方領袖們對南京團結一致的熱烈擁護，使他的工作要容易得多。由於西安事變的結果所給下的教訓，西安事變還能被認為是一個苦子裏的幸福。西安事變引起了中國人自己無限的憤意，和外國友人的安慰，因為他不單證明着中國人有着自治的能力，並且還證明着中國足夠對付一個很有可能搖動整個國家基礎的突發事變。

西安事變所引起的另一事變，就是蔣委員長的威信，又提高了不少。這次事變不單在中國，且還在國外，促發了對於蔣委員長表示愛敬的情緒。蔣委員長到處被國民尊為最適於統一中國的人物。尤

其重要的是：這次事變表現着蔣委員長已在他的生活史上奠定了民族和民衆的法制，而這法制很有希望地對中國的前途投下了國運日隆的影子。國民方面對蔣委員長的被釋所顯現的自動的慶祝，就明顯地表示着蔣委員長的特性和人格是怎樣有力地獲得了全國國民的信仰了。

對於蔣夫人的敬意，也在這時反映了出來。端納曾用了這些適切的話指出了她在和平談判中所任的任務：『蔣委員長的獲得自由，多半應該感謝蔣夫人，當她飛到西安去時，她並不以個人的安全爲慮。在人們也許要遭到失敗的地方，她却勝利了，她的人格把一切的困難都克服了。她是替全民族獻出了一樁最值得紀念的工作。』

大家都承認，當西安事變期間，蔣夫人是不辭疲勞而又完全不顧自己的。她每日要接見各政黨所派來的訪客與密使五十餘人以上，並用着卓越的機智與耐心主持各種會議。

蔣委員長的安然返京，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非惟避免了政府元氣的挫傷，並毀滅了華北的日本軍閥企圖施用壓力促成華北五省自治的機會。因爲他們在滿洲給與張學良一個打擊以後，已經盡其所能從事這個陰謀了。欲免方要求其宣佈獨立起見，宋哲元便宣佈他本人臥病不克視事而閉門不出。當時北平普遍的恐慌是：假如蔣委員長在西安被害，則華北結果必將被迫宣佈獨立的。宋哲元因此是最先向蔣委員長拍電致費的一人。

